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崮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陈永杰 牛铁航 王晓红

新年寄语

冰雪悄悄融化，大地万物更新，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期待的2013年。

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全球经济依然充满阴霾，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各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滑，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坚持扩大内需，坚持结构调整，坚持创新驱动，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了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展望2013年，国际经济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在曲折中深化发展。《全球化》杂志将聚焦热点问题，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询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

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编辑部全体同仁和广大读者、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力争将《全球化》杂志办成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经济类期刊，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最后，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祝朋友们阖家欢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曹培炎

2013年1月

• 宏观经济 •

- 影响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若干因素 许宪春 (005)
-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定位与策略选择 课题组 (016)
- 中国经济今后10年可以实现怎样的增长率? 蔡 昉 陆 旸 (027)

• 世界经济 •

- 2012-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陈文玲 (038)
- 世界经济: 2012年基本态势与2013年面临的风险 谷源洋 (048)
- 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中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裴长洪 (059)

• 理论前沿 •

- 谈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李京文 (068)

• 国际投资 •

- 加强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
范黎波 施屹舟 郑伟 (073)

• 国际贸易 •

- 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分析 杜振华 赵宏涛 (080)

• 产业发展 •

我国服务经济发展趋势和战略 课题组 (089)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
黄群慧 贺俊 (097)

• 企业发展 •

小企业融资：国际比较、经验借鉴及我国对策 景春梅 (105)

• 全球化人物 •

从全球化视角谈中国崛起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 本刊记者 牛铁航 (114)

• 智库言论 •

美国的财政挑战与财政蠢举 劳拉·泰森 (118)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 斯蒂格利茨 (119)

安倍的货币政策幻觉 斯蒂芬·罗奇 (120)

美国战略重心再度转向欧洲 菲利普·斯蒂芬斯 (121)

中国必须直面失业的挑战 Simon Commander 王研 (122)

• 英文提要 (ABSTRACTS) • (123)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运营单位：国经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出版：《全球化》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2号楼503室）

邮编：100017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

影响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若干因素

许宪春

摘要： 本文探讨影响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若干因素，分析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影响，阐述保持国民财富稳定增长和提高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合理性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国民财富 分配结构 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若干因素。

一、什么是国民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构

一个国家的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包括住户、法人企业和政府单位）可以按照其经济活动的特征划分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常住机构部门，这三大常住机构部门构成这个国家的经济总体。一个机构单位的财富指的是其拥有的所有资产价值减去所有未偿还的负债价值，即所谓资产净值。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①的规定，所有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其中，非金融资产包括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产两大

① 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指的是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最新标准是2008年颁布的，即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World Bank,

类。生产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和贵重物品三类；非生产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合约租约和许可、商誉和营销资产三类（UN SNA, 2008, 10.9, 10.10, 10.14）。固定资产指的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被反复或连续使用一年以上的货物和服务（UN SNA, 2008, 10.11、10.33），包括住房、厂房、商业营业用房、办公用房、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等建筑物，交通工具、机床设备等机器和设备，生产水果、奶制品等产品的树木和牲畜等培育性资产，计算机软件、数据库、文学艺术品原件等知识产权产品。存货指的是在当期或较早时期生产，用于销售、生产中使用或者用于其他用途而持有的货物和服务（UN SNA, 2008, 10.12），包括产成品存货、在制品存货、原材料存货等。其中，政府持有的存货包括战略物资、粮食，以及对国家特别重要的其他商品存货。贵重物品指的是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作为价值储藏手段持有的生产性货物。正常情况下，贵重物品的实际价值会随着时间而上升或至少不会下降，其质量也不会改变。贵重物品包括金银、珠宝和艺术品等（UN SNA, 2008, 10.13）。自然资源包括自然形成的资产，如具有经济价值的土地、水资源、非培育性森林和矿藏（UN SNA, 2008, 10.15）。

一个机构部门的财富等于该机构部门所有机构单位财富的合计。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财富称为国民财富，等于所有常住机构部门财富的合计，也等于该经济总体拥有的所有非金融资产与对国外的净金融债权之和。对国外的净金融债权等于对国外的金融债权与对国外的未偿还负债之间的差额。

国民财富与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拥有的财富之间具有以下关系：

$$\begin{aligned} \text{国民财富} &= \text{经济总体非金融资产} + \text{经济总体对国外的净金融债权} \\ &= \text{经济总体非金融资产} + (\text{经济总体对外金融债权} - \text{经济总体对外负债}) \\ &= (\text{居民部门非金融资产} + \text{企业部门非金融资产} + \text{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 \\ &\quad + [(\text{居民部门金融资产} + \text{企业部门金融资产} + \text{政府部门金融资产}) \\ &\quad - (\text{居民部门负债} + \text{企业部门负债} + \text{政府部门负债})] \\ &= (\text{居民部门非金融资产} + \text{居民部门金融资产} - \text{居民部门负债}) \\ &\quad + (\text{企业部门非金融资产} + \text{企业部门金融资产} - \text{企业部门负债}) \\ &\quad + (\text{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 + \text{政府部门金融资产} - \text{政府部门负债}) \\ &= \text{居民部门财富} + \text{企业部门财富} + \text{政府部门财富} \end{aligned}$$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UN SNA, 2008). G. E. Mingay,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Countrysid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 Press, 1990, pp. 92—93.

$$= \text{国民财富} (\text{居民部门财富}/\text{国民财富} + \text{企业部门财富}/\text{国民财富} + \text{政府部门财富}/\text{国民财富}) \quad (1)$$

公式(1)最后一个等号后面括弧里的部分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也就是反映了国民财富的基本分配结构。

国民财富的分配既包括上面所讲的国民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也包括国民财富在上述各机构部门内部的分配。例如，在居民部门内部不同类型居民（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在企业部门内部不同类型企业（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分配，在政府部门内部不同类型政府子部门（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等等。国民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各自内部的分配结构也是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民财富在居民部门内部的分配结构，体现着国民财富在不同类型居民之间的分配差距。

二、影响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财富变化的若干因素

财富的变化包括财富的增加和财富的减少。从定义可以看出，任何影响一个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拥有的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动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相应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财富的变化。概括起来，影响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财富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储蓄；二是资本转移净收入；三是固定资本消耗；四是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五是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其中，储蓄是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由于影响机构单位财富变化的因素与影响机构部门财富变化的因素相同，为了简便起见，除必要的地方外，下面只探讨影响机构部门财富变化的因素。

（一）储蓄

储蓄是机构部门可支配收入用于最终消费支出之后的结余部分。居民部门储蓄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扣除居民消费支出后的结余部分；政府部门储蓄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扣除政府消费支出后的结余部分；企业部门由于没有最终消费支出，企业部门储蓄等于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一般情况下，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为正值，特殊情况下或特殊时期，也可能出现负值。当储蓄为正值时，表明相应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没有被完全消费掉，剩余部分将用于购置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用于偿还负债，从而增加相应部门的资产净值；当储蓄为负值时，表明相应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不足以支付最终消费支出，只能通过处置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承担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从而减少相应部门的资产净值。企业部门储蓄一般也为正值，它也一般用于购置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用于偿还负债，从而增加企业部门的资产净值。事实上，

如前所述，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是相应部门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是影响相应部门财富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二）资本转移净收入

资本转移是无回报的转移，在资本转移中，给予转移的一方通过处置资产（不包括现金或存货）、放弃金融债权（不包括应收账款）来筹集资金；或者接受转移的一方必须获得资产（不包括现金）；或者两个条件同时满足（UN SNA，2008，10.200）。

一个机构部门的资本转移净收入等于该部门的资本转移收入与资本转移支出的差额。当一个部门的资本转移收入大于资本转移支出时，资本转移净收入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当一个部门的资本转移净收入为正值时，它增加该部门的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者减少该部门的负债，从而增加该部门的资产净值；当一个部门的资本转移净收入为负值时，它减少该部门的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者增加该部门的负债，从而减少该部门的资产净值。因此，资本转移净收入对机构部门的财富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三）固定资本消耗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拥有的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往往会缩短，使用效率往往会降低，因此固定资产的存量价值会下降，表现这种固定资产存量价值下降的指标称之为固定资本消耗。它指的是在核算期内，由于自然退化、正常淘汰或正常事故损坏而导致的固定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UN SNA，2008，6.240）。生产者拥有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这些预期使用寿命可能很长的建筑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其价值量下降，因而都需要计算固定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减少固定资本存量价值，从而减少机构部门的财富。

（四）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

持有收益指的是资产和负债价格随着时间的变化给资产的持有者和负债的承担者带来的收益价值。持有收益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负的持有收益也叫持有损失。

各种类型资产，包括各种类型的非金融资产和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都有可能给其拥有者带来持有收益。同样，各种类型负债都有可能给其承担者带来持有收益。

正的持有收益，包括资产价格上升引起的和负债价格下降引起的，会增加拥有相应资产的机构部门和承担相应负债的机构部门的资产净值；负的持有收益，包括资产价格下降引起的和负债价格上升引起的，会减少拥有相应资产的机构部门和承担相应负债的机构部门的资产净值。从而持有收益对机构部门的财富产生影响。

持有收益可能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例如，住房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持有收益

就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富人可能拥有多套住房，穷人可能连一套住房都没有，住房价格的上涨会给拥有多套住房的富人带来大量的持有收益，从而使其拥有的财富大幅度增值；而没有住房的穷人不得不支付更多的房租，从而进一步减少其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财富，甚至增加净负债，使其生活得更加困难。

（五）资产物量其他变化

既不是由于机构单位之间交易引起的，也不是由于持有收益引起的资产、负债和资产净值的变化，在国际标准中称之为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多种类型，例如发现新的可开采矿藏；由于开采导致的地下资产储量减少；大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特大飓风等自然灾害，战争、骚乱等政治事件导致的资产损失等。

由于经济活动引起的土地、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退化，也属于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这种自然资源的退化既包括正常的经济活动引起的，也包括不正常的经济活动引起的，例如滥伐森林，导致森林资源的退化；过度地使用化肥和利用被污染的水进行灌溉侵蚀和损害土地，导致土地资源的退化，等等。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还包括由于破产、清算或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债权债务的注销等。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导致机构部门资产净值发生变化，即导致机构部门财富发生变化。

上面阐述的储蓄、资本转移净收入、固定资本消耗、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和资产物量其他变化等因素，既影响到机构部门财富的变化，也可能影响机构部门拥有的财富在国民财富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因此这些因素同时也就是影响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变化的因素。

三、影响国民财富变化的若干因素

影响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财富变化的因素也是影响国民财富变化的因素。不过，由于国民财富涉及的是经济总体，相应的影响因素在范围上也有所变化。具体地说，储蓄不再是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的储蓄而是国民储蓄，资本转移净收入变为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变为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金融债权的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变为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金融债权的物量其他变化。

（一）国民储蓄

国民储蓄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储蓄，它是一个国家国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后的结余部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小于它的国民可支

配收入，所以国民储蓄是一个正值，它被用来购买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用来偿还负债，从而增加该国的非金融资产或者增加该国对国外的净金融债权，因此，它是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增量的重要来源。事实上，正如储蓄是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一样，国民储蓄是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是影响国民财富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二）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

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本转移净收入等于这个国家所有常住机构部门的资本转移收入与资本转移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于所有常住机构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收入与资本转移支出被相互抵消，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本转移净收入等于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即该国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收入与对国外的资本转移支出的差额。当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收入大于对国外的资本转移支出时，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当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为正值时，它增加该国的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减少该国对国外的负债，从而增加该国的非金融资产或对国外的净金融债权；当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为负值时，它减少该国的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者增加该国对国外的负债，从而减少该国的非金融资产或对国外的净金融债权。因此，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对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的变化产生影响。

（三）固定资本消耗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阐明，各常住机构部门的固定资本消耗减少相应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固定资本消耗等于所有常住机构部门固定资本消耗之和，它减少经济总体的固定资本存量，因而减少国民财富。

（四）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金融债权的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

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等于这个国家所有常住机构部门的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之和。由于所有常住机构部门之间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被相互抵消，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等于这个国家经济总体的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金融债权的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这个持有收益影响到这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产净值的变化，即国民财富的变化。

（五）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金融债权的物量其他变化

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产物量其他变化等于这个国家所有常住机构部门的资产物量其他变化之和。由于所有常住机构部门之间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物量其他变化被相互抵消，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的资产物量其他变化等于这个国家经济总体的非金融资产和

对国外净金融债权的物量其他变化，这个物量变化直接影响到国民财富的变化。

四、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影响

（一）什么是国民收入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指的是对投入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支付和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缴纳的税金及从政府得到的补贴。对生产要素的支付包括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和营业盈余，向政府缴纳的税金和从政府得到的补贴分别是生产税和生产补贴。初次分配之后形成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国家统计局，2003，第63页）。再分配指的是经常转移支付，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等。再分配之后形成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之和就是国民可支配收入^①，（国家统计局，2003，第63页）用公式表示就是：

$$\begin{aligned}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text{居民可支配收入} + \text{企业可支配收入} + \text{政府可支配收入} \\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text{居民可支配收入}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quad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text{企业可支配收入}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quad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text{政府可支配收入}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quad (2) \end{aligned}$$

从公式（2）可以看出，每一个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国民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本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些比重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基本分配结构，即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结构。

（二）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结构变化的影响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国民储蓄是一个国家国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后的结余部分，它是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通过下述公式的推导，可以看出国民可支配收入对国民储蓄的重要作用：

$$\begin{aligned} \text{国民储蓄}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text{最终消费支出} \\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1 - \text{最终消费支出}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1 - \text{消费率}) \quad (3) \end{aligned}$$

从公式（3）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该国创造的

① 在资金流量表中，居民、企业、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国民可支配收入都包括可支配总收入和可支配净收入，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固定资本消耗，后者不包括固定资本消耗。除特别注明的地方外，本文中涉及的所有可支配收入均指的是可支配净收入。

国民可支配收入，二是最终消费支出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即最终消费率，简称消费率。当消费率一定时，国民可支配收入越大，国民储蓄越大；反之则相反。当国民可支配收入一定时，消费率越低，国民储蓄越大；反之则相反。可见，国民可支配收入对国民储蓄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对国民财富增量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消费率对国民储蓄，从而对国民财富增量也具有重要作用。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是相应部门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国民储蓄的基本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增量的基本分配结构，从而对国民财富基本分配结构的变化产生最重要的影响。

国民储蓄等于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之和。通过以下公式的推导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结构对国民储蓄的基本分配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begin{aligned}
 \text{国民储蓄} &= \text{居民部门储蓄} + \text{企业部门储蓄} + \text{政府部门储蓄} \\
 &= (\text{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 - \text{居民消费支出}) + \text{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 \\
 &\quad + (\text{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 - \text{政府消费支出}) \\
 &= \text{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 (1 - \text{居民消费支出}/\text{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 \\
 &\quad + \text{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 + \text{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 (1 - \text{政府消费支出}/ \\
 &\quad \text{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 \\
 &= \text{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 (1 - \text{居民消费率}) + \text{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 \\
 &\quad + \text{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 (1 - \text{政府消费率}) \\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text{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1 - \text{居民} \\
 &\quad \text{消费率}))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text{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
 &\quad + \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text{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text{国民可支配收入} (1 - \text{政府} \\
 &\quad \text{消费率})) \} \tag{4}
 \end{aligned}$$

公式(4)中最后一个等号后面的第一部分是居民部门储蓄，第二部分是企业部门储蓄，第三部分是政府部门储蓄。从公式可以看出，居民部门储蓄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是国民可支配收入，二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是居民消费率；企业部门储蓄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可支配收入，二是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政府部门储蓄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是国民可支配收入，二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是政府消费率。

在决定居民部门储蓄的三个因素中，国民可支配收入、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正向因素，居民消费率是负向因素。也就是说，在其他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民可支配收入越大，居民储蓄越大；在其他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大，居民储蓄越大；在其他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越高，居民储蓄越小。在决定企业部门储蓄的两个

因素中，国民可支配收入、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都是正向因素。在决定政府部门储蓄的三个因素中，国民可支配收入、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正向因素，政府消费率是负向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的共同决定因素，因此，它只影响国民储蓄总量，对国民储蓄的基本分配结构没有影响。而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结构对国民储蓄的基本分配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对国民财富的基本分配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也对国民储蓄的基本分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对国民财富的基本分配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从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可知，除了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的基本分配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外，消费率、资本转移净收入、固定资本消耗、资产和负债价格变化产生的持有收益以及资产物量其他变化也对国民财富基本分配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所以说，影响国民财富基本分配结构变化的因素远不止国民收入基本分配结构一种。

五、努力保持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提高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合理性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更取决于它拥有的国民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更取决于他们拥有的财富，例如，居民居住条件的好坏，往往是由居民多年收入水平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当年收入水平决定的。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合理性非常重要，它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保持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和提高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合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公式（3）可以看出，国民可支配收入是国民储蓄的决定因素之一，国民储蓄是国民财富增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国民可支配收入对国民财富增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来说，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

$$\begin{aligned} \text{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 \text{国内生产总值} + \text{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 \\ &+ \text{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净收入} \end{aligned} \quad (5)$$

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我国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和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净收入要小得多。例如，2011年，我国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6%；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净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5%。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决定着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能保持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对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保持合理的消费率

从公式（3）还可以看出，消费率也是国民储蓄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对国民财富增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消费率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与国民可支配收入是反向的，因为消费率越高，国民可支配收入用于国民储蓄的部分越少。从短期看，消费率不能过低，因为消费率过低，国民可支配收入过多地用于储蓄，虽然有利于增加国民财富，却抑制了当期消费，影响人民的当期生活水平，忽略了财富积累的目的。从长期看，消费率又不能过高，因为消费率过高，国民可支配收入过多地用于消费，抑制了储蓄，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正常积累，从而降低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影响人民长期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保持合理的消费率。

（三）保持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从前一部分的阐述可以看出，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储蓄的分配结构，而国民储蓄的分配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财富增量的分配结构。因此当年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增量的分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历年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要想保持合理的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必须长期保持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保持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包括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之间的储蓄差距，而居民之间的储蓄差距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之间财富增量分配差距。因此，要想缩小居民之间财富分配差距，必须首先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四）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根据国民财富的定义及其口径范围，保持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需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是要努力提高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加固定资产存量中的知识产权产品，从而增加国民财富中的科技含量；二是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发现新的自然资源，例如利用先进的技术发现矿藏，增加矿藏资产存量，从而增加国民财富；三是要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从而降低国民财富的损失；四是要努力提高固定资产的质量，包括提高住房、厂房、商业营业用房、办公用房、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等建筑物和交通工具、机床设备等机器和设备的质量，从而延长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降低固定资产消耗，进而降低固定资产存量的减少幅度，从而降低国民财富的减少幅度。

（五）努力避免资产和负债价格水平及价格结构的变化导致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变化和居民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

资产和负债价格水平及价格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因为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的数量及结构不同，资产和负债价

格水平及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资产和负债价值及其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国民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分配结构的变化。因此，要努力通过市场手段和适当的政策工具避免资产和负债价格水平及价格结构的变化导致国民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变化

同样，由于不同类型居民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的数量及结构差距较大，资产和负债价格水平及价格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不同类型居民的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发生较大变化，进而可能会导致国民财富在不同类型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扩大。因此，要努力通过市场手段和适当的政策工具避免资产和负债价格水平及价格结构的变化导致国民财富在不同类型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扩大。例如，应当通过合理的税收或者其他政策措施抑制拥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阶层因房价的上涨获得大量的持有收益，从而避免因房价的上涨导致国民财富在不同类型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扩大。

（六）努力避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引起的自然资源的退化

如前所述，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会导致自然资源的退化，例如滥伐森林，导致森林资源的退化；过度地使用化肥和利用被污染的水进行灌溉侵蚀和损害土地，导致土地资源的退化；过度地开发利用水资源和不注意水资源的环境保护，导致水资源的退化。自然资源的退化会直接导致国民财富数量的减少和质量下降，从而降低国民财富的价值。因此要努力避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引起的自然资源的退化。

（七）努力降低和避免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造成的国民财富损失

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政治事件会对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造成重大损失。有些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地震和外敌强加的战争。但要尽最大努力避免人为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政治事件的发生，一旦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发生，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其对国民财富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0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2.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World Bank,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UN SNA, 2008).

责任编辑：晨乔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 定位与策略选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国际货币体系近期看，仍是一个美元继续主导但趋于多元化的体系；中期看，将逐步形成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亚元）等相对均衡的多元体系；长远看，应创造一种独立于国家货币的、具有一定“锚”特性的世界货币。

稳定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现阶段还存在有利成分，中国尚不具备实力牵头主张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应着重发挥好“平衡器”作用，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取有利地位。路径选择可以人民币加入SDR和扩大SDR使用为突破口，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应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推进，采取“润物细无声”的低调国际化战略。着眼于构建以中国为局部中心的全球化体系，以清迈协议多边化、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为重点，力争在亚洲货币金融务实合作上有所作为。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多元货币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吴越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助理；

王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崔莹，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助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进行积极的政策协调，较好地应对了危机造成的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初步企稳。但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情况，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以美元为代表的庞大流动性，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之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无序流动，容易引发巨大金融风险。这些令人担

忧的情况，从根本上说是由世界经济多重不平衡造成的，而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加快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从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由于转换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综合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如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用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综合实力早在此前几十年就已超过英国。同时，在大变迁的过程当中，核心货币国家卷入世界性战争，或者是长期实施以自我为中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其他外围国家最终决定脱离其货币体系，成为引发货币体系变革的触发点。

尽管近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但近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仍将是一个美元继续主导但趋于更加多元化的体系。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在全球仍有较大领先优势，一家独大，其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无可匹敌。本次危机后，虽然美元信心受到冲击，但尚没有哪国货币能与美元匹敌。目前各方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限于讨论，虽然多数国家认为应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要求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呼声也高涨，但美元主导地位短期不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道路漫长且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中期来看，将逐步形成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亚元）等相对均衡的多元货币体系。随着欧元区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亚洲经济的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步改变美元主导的格局。欧元和人民币（或者亚元）的国际影响力将逐步增加，国际货币体系将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相互制衡的多元货币体系。

长远来看，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方向完善的努力中，应创造独立于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任何一种主权信用货币，都逃脱不了两个基本的矛盾：一是发行约束问题，二是国内目标和国际目标之间的冲突。解决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根本出路，在于创造一种不以国家货币为中心的、具有一定“锚”特性的世界货币。美国不能一直享受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带来的特权收益，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长期的努力。

二、近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内容

从现实可行性看，短期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在于基本维持现有国际货币体

系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对其协调机制和机构进行改革，以克服其内在缺陷带来的负面效果。与此同时，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发展区域性货币和金融合作机制，以期逐步培育能与美元公平竞争、功能补充的货币，形成均衡竞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当然，各国也不放弃构建超主权货币体系的努力，特别是以SDR为改造对象的超主权货币。具体来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加强主要经济体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协调。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合理、有效，取决于其是否能为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能否使他们从中受益。当前的国际协调与决策机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际政策协调中更多地反映不断壮大中的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

具体地：一是必须建立起主要储备货币如美元、欧元等之间汇率相对稳定、但不失灵活的机制。二是强化对主要国际货币发行者的监督，防止美国和欧洲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通过滥发货币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三是对于其他相对弱势货币，可以允许这些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如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通胀水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决策者的信誉以及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在盯住、管理浮动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进行选择。

从目前来看，国际汇率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已从发达国家俱乐部（G7），转向更加合理反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利益的G20集团。

第二，拓展SDR并增加其在私人和官方领域的使用。目前来看，SDR具有成为保持币值长期稳定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可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补充。一是SDR当年由美国主导提出，相关制度安排、法律约束均已成型，法理上易于被各国接受，美国从中作梗的可能性较低。二是SDR具有非主权或超主权性，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三是SDR是一种篮子货币，其构成可以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予以调整。四是SDR的汇率和利率由市场决定，其稳定性优于单一货币。五是SDR的供给是可控的，可对全球流动性进行调节。

基于这些原因，调整SDR中的货币篮子，并积极推动SDR在私人和官方领域的使用，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各方普遍关注的内容。扩大SDR使用范围可以采取多重措施：扩大SDR发行；鼓励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鼓励私人部门在更多场合以SDR作为合同和交易的定值单位；尽快推出替代账户；由IMF按照“SDR货币局规则”，直接发行真实SDR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用商品篮子取代货币篮子组成SDR。

第三，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根据世界经济格局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断改造国际金融组织，使其更加合理、公平地反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通过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所造成的缺陷。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机构，对其改革有三方面重点内容：一是重新确定并适当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稳定汇率并维持国际物价的基本稳定、防范全球通货膨胀风险、监督管理等方面强化其职能。二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源和工具。目前，在国际流动性大幅增加、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和工具，并不足以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危机，更无法有效缓解主要发达国家的危机。大幅增加可用资源，创造适当工具，可以有效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防范和救助方面的能力。三是推进治理结构改革。根据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更加公平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投票权、基金份额和董事会组成，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

改革世界银行（World Bank）。改革方向是协调国际型、区域性和双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推动全球和谐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世界银行应创新融资机制，扩大资金规模，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二是世界银行应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向某个领域，在一段时间内真正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如非洲的交通状况等。三是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加强沟通，确立各自的战略目标和业务领域，实现援助资金的合理分配和开发领域的全覆盖。世界银行应集中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为发展中国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四是开发性金融机构应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主，减少非经济目标的权重。五是改革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的作用。

第四，强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和监督约束。应更加重视储备发行国的国际责任，强调需要对储备发行国施加必要的监管约束。通过G20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和IMF，协调确定各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例，并将其作为各国政策目标。考虑到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对其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盈余应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第五，加大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浪潮源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当在国际层面建立对资本流动的监管

协调机制。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容忍度有所提高。应该说，当前是推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国际规则的有利时机。

国际跨境资本流动要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前提。一是尽快制定针对对冲基金等主要投资者的监管框架，加强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管协调，制订监管标准，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二是建立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强化对全球资本流向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正常运转。三是从制度上增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协调能力，推动20国集团政府和相关机构共同推动监管标准的统一，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流程。

第六，强化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方兴未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可以说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加快。经过几轮金融危机，虽然各国已充分认识到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但是由于单个国家还缺乏足够的实力，扭转以美元为主要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构建超主权货币的难度又过于庞大，各国只能将重点放在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上。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区域已开始加强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这是走向相对均衡的、多元储备货币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准备。后危机时代的主要货币合作区有五个，分别是欧洲（欧元区）、加勒比地区（加勒比共同体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非洲（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西非货币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海湾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亚洲。各个货币合作区的范围逐步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

三、国际社会对改革应凝聚基本共识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中，存在许多争议和分歧。但最为重要的是，各方应看到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符合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共同利益，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所有各方应努力凝聚以下五点基本共识。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经济存在结构性矛盾，现实全球治理结构与经济运行不相适应，这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应是结构性的。改革方案设计的出发点，应以有利于解决世界经济中深层次不平衡为出发点。短期内，可着重于现有体系的完善；长期内，应以更广阔的视野，多管齐下地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构建，应考虑全球经济结构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状况。同时，应在治理结构、制度安排、组织体系等方面做出积极调整，打破现有的路径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已经发生的结构性变化，适应今后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展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性改革也是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改革应体现包容性特征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和均衡兼顾不同利益诉求。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他们为世界做出的越来越重要的贡献，应当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得以体现。如果忽略这一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群体的呼声和要求，必将造成新的更大的全球结构不平衡，最终危害的是所有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已经有所提升，为未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但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仍不相符。在未来改革中，应进一步推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不断提高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

（三）改革应坚持渐进性原则

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储备货币是国际政治体系长期演变和市场选择的结果。今后一段时期，美元作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还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现实的需要。旧货币体系的变革与新货币体系的确立还需要一个过程。不仅如此，这种变革涉及各方权利与责任、利益与风险的再设计、再分配。因此，改革必须以稳妥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不能操之过急。改革过程中应保持必要的灵活性，这包括一些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区域性的货币机制和安排。

（四）对改革应持建设性态度

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也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纠正自身失衡、促进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契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化解当前矛盾、防范危机再次爆发的一项重要手段，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各方应以发展的眼光更好地理解这一趋势，以正面、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共同寻找改革的方向和出路。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已经缓解，但各国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放慢改革的步伐，甚至将改革抛之脑后。只要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将依然存在。各主要国家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切实拿出诚意，加强对话和沟通，共同设计、创建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有效体系，实现共赢。改革方案要切合实际、具有较强可操作性。同时，各方也要加强责任和纪律性，保证本国政策、金融的稳健，努力减低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负面溢出效应。

（五）改革应充分注重协同性

推进改革与保持经济增长并行不悖，不可偏废一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高货币

制度的稳定性，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稳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保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各国要合理兼顾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和长远的结构性矛盾，把保增长、促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各方应充分重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和重要意义，不断完善和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为各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及时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和系统性风险。

改革的顺利推进也离不开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当实施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稳步推进并最终完成改革的进程中，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应该承诺和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相对稳定，合理控制流动性总量，防止产生负面的外溢效应。

四、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定位判断

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需要冷静观察、理性分析，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作出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定位和策略选择。

第一，稳定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和外汇储备结构，还存在有利成分，还能接受。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市场，对于中国仍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高消费模式是与以美元本位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但经济模式的转变需要时间。中国目前仍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是拥有美国资产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最主要的债权国。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美元的无序调整，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现实的损失。当然，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提高，特别是如果实现转向内需型经济增长，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凸显。总之，短期内相对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对中国总体上还是有利。

第二，中国不具备实力牵头主张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尚未发展到能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转换中获取最大利益的阶段。虽然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2位，但中国经济金融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尚不具备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条件。中国的宏观管理能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还不支持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进而无法支撑人民币的快速国际化，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无法成为美元的可选替代货币。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国际货币特权（低息融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意义并不显著。

第三，中国应着重发挥好“平衡器”作用，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取有利地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还将起主导作用。中国可以采取“跟随”策略，不唱主角，不背包袱，相机抉择。在多元货币体系的相互

竞争中，充分发挥“平衡器”作用，将使中国未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第四，可以以人民币加入SDR和扩大SDR使用为突破口，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变革。提高SDR作用，并将美元转化为SDR，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看，对中国都有利。短期看，如果世界转移到SDR，则中国可以减少一些美元贬值的损失。中期看，中国将获得一些发行权收益。长期看，有利于推进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应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推进，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目前人民币已经被一些国家纳入国际储备，也被视为最有希望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货币。但是，就目前来看，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交易和使用还十分有限，甚至低于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如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等。人民币应采取“润物细无声”的低调国际化战略，根据经济发展以及与周边经贸往来的需求自然而然、循序渐进地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金融改革的推进，人民币的吸引力将会不断提高，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五、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行动对策

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可在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上采取不同的行动对策，工作力度应次第加大。

（一）在国际层面上：以发展中国家身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增加知情权和话语权，推动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在国际金融新布局中维护自身利益

第一，参与国际规则研究制定。目前的国际金融规则是几十年前由发达国家制定的，长期以来被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去适应。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无法对原有体系进行根本改革，但是对现行很多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事务的对话、磋商中去，联合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提高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知情权和话语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也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同时，防范并积极应对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框架下，对中国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施压。

第二，发挥G20在推进改革中的主导作用。G20已经召开了七次峰会，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国际机制，具有不可比拟的政治资源和一定的代表性、权威性。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应充分依靠G20峰会机制，进一步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为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应设计出公正合理、切实可行的改革路线图。路线图应当符合经济规律，反映各方合理诉求，最大程度凝聚共识，获得各国认

可。2012年，峰会主席国法国在中国南京举办论坛，邀请政、商、学界代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各方提出了很多有益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考虑将此做法机制化，在G20框架下，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咨询研究团队，在峰会主席国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广泛听取全球各方意见，设计出客观公正的改革路线图。

第三，推进SDR的改革和使用。推动IMF修改SDR货币构成的标准，争取人民币加入到SDR。推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SDR替代账户，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将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的美国国债转移到替代账户，由美元资产持有者变成SDR持有者。推动SDR在私人领域和主权债券上的使用。

第四，参与并影响IMF改革。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IMF救助机制的缺陷已经显现。东亚国家以自我积累外汇储备，并通过清迈协议建立区域货币合作，开始了建立本地区“防火墙”的探索实践。在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IMF的资源不足以提供必要流动性和救助。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IMF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将趋于下降。为此，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IMF改革，使IMF更具有代表性，并在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不付出巨大成本的情况下，中国可根据自身的实力和能力，积极争取提高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在扩大SDR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的前提下，推动IMF向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转变。在必要时，可以多种形式为IMF增资做出自己的贡献，争取在国际货币体系运作机制改进、在规则制定和机构改革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二）在地区层面上：着眼于构建以自身为局部中心的全球化体系，力争在推进亚洲货币金融务实合作上有所作为，扩大自身在周边地区积极影响力，以期获得更为有利的长远发展环境和空间

中国已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到目前为止，还主要停留在参与主要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化体系中。虽然中国从中获得了利益，但展望未来发展，有必要构建以自身为局部中心的全球化体系。亚洲周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在本地区的实际利益与日俱增。应把加快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放在重要位置，争取有所作为，推进于中国有利的亚洲雁式发展。

第一，进一步推动清迈协议多边化。近年来，东亚财金合作快速发展，取得了包括清迈倡议多边化在内的一系列成果。但是，清迈倡议多边化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尚未做实运行机构，危机预防和应对机制等也没有完全细化，技术能力和人才配备还未达到对本区域开展全面独立监管的水平。为此，中国应推动以清迈协议为基础，深化亚洲储备库的多边化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亚洲货币金融的研究，降低与IMF救助条件挂钩的援助资金比重。特别是推动落实“清迈倡议”中除货币互换和储备库机制外的其他三个支柱建设，包括监控资本流动、区域金融监管和人员培训三个方面。加强这三个支柱建

设，有利于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东亚各国的经济运行效率、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资本账户的管理。可借鉴欧洲稳定机制（ESM）的做法，进一步做实运行机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建立亚洲版IMF的可能性。

第二，设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亚洲相当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初期，对基础设施有很大需求，但建设资金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同时，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亚洲国家在资金、技术上有很大优势。中国拥有大量低回报率的外汇储备，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较强竞争力。因此，亚洲国家完全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这不仅是拉紧亚洲地区经济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而且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冲抵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气氛。在支持现有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可考虑中国发起，其他国家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用美元等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各参与国的本币，设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重点投向能源、交通、电信、市政建设等领域。

第三，支持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系统，是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形成健全完善的亚洲资本市场，应积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我应积极推动亚洲各经济体：统一跨境债券的税收、交易清算等安排，加强金融监管合作；设立亚洲债券发行担保基金，中国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发展能获得亚洲各国信任的、亚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标准；在制定规则、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私人部门成为债券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进一步开放本国债券市场。

第四，鼓励亚洲国家扩大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亚洲国家的贸易中超过一半为区内贸易，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但这些交易往来大都使用区外货币。如果亚洲各国更多地使用区内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和储值，可以有效减少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区内贸易和投资。这些形式可以包括：各国央行之间进行货币互换，增加相互持有国债的规模，本币之间不通过第三国货币汇率套算而开展直接交易等。应鼓励亚洲各国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更多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定，扩大货币互换规模，鼓励金融机构为本币结算提供便利和服务。

（三）在国内层面上：以市场化为导向，加快金融改革与开放步伐，尽快形成竞争有序、运行高效、稳健成熟、现代开放的金融体系，为国内经济发展、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的影响力创造条件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政策有序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当前需要为未来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创造条件，但应循序渐进，把握好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当前最为迫切和重要的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加速国内金融体

系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和汇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价格机制和杠杆。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应由市场供求决定，以使资金得到有效配置。随着汇率浮动幅度加大，资本项目开放范围的扩大以及金融准入限制的放松，金融市场也要求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在路径选择上，应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和各类资产管理市场，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加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增强风险定价能力。

第二，推动资本账户的渐进开放。在中国贸易投资与国际互动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主体对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需求越发迫切。资本账户现在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如何稳步开放的问题。当前，应改善资本账户管理框架，对资本流动必要的资质、规模等的管道管理模式，根据市场发展和管理能力渐进扩大管道规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机制，逐步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制。以便利跨境融资为重点，加快改革信贷业务外汇管理，规范对外债权管理和监测。以扩大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进一步放开个人其他资本项目跨境交易。

第三，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需要。同时，中国目前也尚不具备条件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宜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协调推进外汇市场发展，丰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建立人民币对重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货币的双边直接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推动双边货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

第四，拓宽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进一步提高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便利程度，稳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探索建立人民币对外债权债务管理框架，不断拓宽境外机构人民币资金运用渠道。稳步推动境内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完善人民币跨境及海外流动的统计和监测机制，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处置机制。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经济今后10年可以实现 怎样的增长率？

蔡昉 陆旸

摘要：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开始负增长，推动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和资本供给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条件，都趋于减缓经济增长。我们的估计表明，中国潜在产出年均增长率将下降为“十二五”期间的7.2%和“十三五”期间的6.1%。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本文模拟了两个最重要途径——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参与率 潜在增长率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陆旸，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引言

在中国过去的30多年中，人口红利推动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正是资本供给的重要条件。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进而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问题，而是人口结构问题。简单概括来说：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很少能够预见到，人口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人口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红利”总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债务”：即劳动力供给不足、资本报酬递减、储蓄率降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潜在增长率受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从增长核算方程来看，供给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核算方程中，在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降低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此外，劳动力无限

供给条件被打破，将直接引起资本边际报酬开始递减，与此同时，抚养比上升又会引起储蓄率下降，进而将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的高投资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投资率下降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势必降低。

事实上，中国人口结构转变进程要快于一般人们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特色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人口）减少的速度更快^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2》在“六普”数据基础上预测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报告显示：按照现有趋势，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从2010年已开始减少。即使从现在开始执行“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也无法改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递减的趋势。这一基础性变化进而改变储蓄率、资本报酬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趋势。

基于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动数据，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将降低到7.2%和6.1%。为此，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在给出具体政策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针对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潜在增长率不应人为超越。因为潜在增长率是现有的要素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如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远离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过度刺激导致通货膨胀、在产业政策支持下形成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保护落后的产业和企业，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超过“生态阈值”导致对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伤害。

第二，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改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是要改变这些因素，就会涉及到各种改革，而改革正是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工市民化，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更稳定，这本身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清除制度障碍，让他们能够持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就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源泉，而途径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根据变化了的人口结构，估计中国未来的GDP潜在增长率。在今后10年潜在

① 虽然我们通常采用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但是中国的退休年龄中，男性60岁，女性大部分55岁。而且中国最大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受教育年限低，而在于随着年龄的提高，其受教育程度是在迅速下降的。即我们的退休年龄是官方规定的，而由于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是很低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员继续就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15-59岁人口是中国特色劳动年龄人口。

增长率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如果寄希望于政府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则不可避免看到各种扭曲的结果，欲速则不达。因此，本文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阐述经济增长所应依托的源泉。

二、估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根据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对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出一定假设之后，估计了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及其变化趋势（图1）。我们采用的增长核算方程及其对中国潜在GDP增长率进行的估计，基于一定的外生假定条件，这些假设锁定了中国未来潜在GDP增长率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们分别论述这些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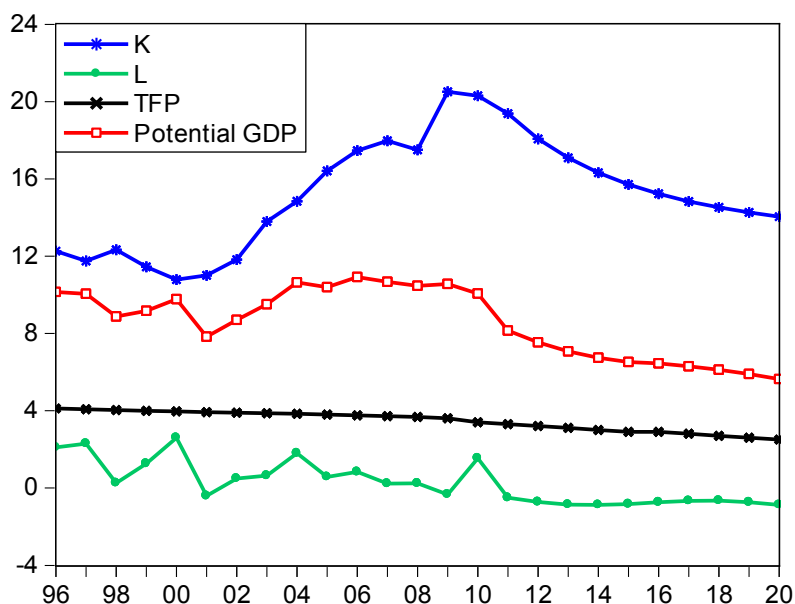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存量、潜在就业增长率、TFP、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1996—2020

注：图中K表示资本存量增长率，L为潜在就业增长率，TFP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Potential GDP为GDP潜在增长率。

假设 I：未来10年投资平均增长率将趋于降低

从历史数据中看到，1978—1994年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中国的平均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13.43%。1995—2009年这一指标增加到16.89%。其间，2003—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均超过了20%。特别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当年的资产投资增长达到了历史性的高位33.15%。如果不考虑

2009年的特殊因素，1995年之后中国投资增长率也高达15.64%。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投资增长率将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中国经济增长过程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再平衡。而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已经不是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而越来越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失衡。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应有所放缓。其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抚养比提高，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储蓄率也倾向于降低，投资率将随之下降。第三，由于投资增长率受资本回报率的影响，资本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将抑制中国投资增长率。

我们采用白重恩等（2006）对资本回报率的估计结果，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wK—“资本回报率”（%）；被解释变量I为“不包含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全社会投资增长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198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方程：

$$I = -6.13954099435 + 0.945869473894 * wK$$

(19.73116) (0.842181)

$$R^2 = 0.054227 \quad D.W. = 0.976468$$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将原始数据中1996-2005年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平均值20.22代入以上方程，可以得到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2.99（单位为%）。因此，在预测潜在增长率时，我们假定2012-2020年中国平均投资增长率约为13%。应该说，这样的假设主要还不是依据上述模拟，而是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做出的，同时不考虑政府对投资做出过度干预的可能性。根据上述投资增长率的假设前提，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未来的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率变动情况。

假设II：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我们假定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与2009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保持一致，即NAIRU=4.132%（都阳、陆旸，2011），劳动参与率等于趋势劳动参与率水平。从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峰值。此后，2011-2015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33%；2016—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31%。这也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的就业增长率为-0.76%；在“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的就业增长率为-0.74%。实际上，由于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十二五”初期就开始减少，在自然失业率和趋势劳动参与率一定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对中国未来潜在GDP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III：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高路易认为，在1994—2009年，中国TFP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企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制造业非常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Kuijs, 2009）。然而，在未来10年里，上述因素对TFP增长率的影响将会变小，因此高路易认为中国TFP增长率每年将下降0.5%—2.3%。通过我们对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HP滤波分解，得到了中国2011—2020年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发现，2011—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TFP增长率约为3.10%；2016—202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约为2.70%。

根据上述假设前提，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TFP增长率都是下降趋势；投资增长率保持在13%水平（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因此，在增长核算方程框架内，我们可以估算出2011—2020年中国潜在GDP增长率。我们发现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很可能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十二五”时期（2011—2015），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约为7.2%；“十三五”时期（2016—2020），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6.1%。我们的估计结果要远低于高路易（Kuijs, 2009）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估计结果。但是考虑到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不再发生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趋势并没有被我们低估（见表1）。

表1 基于增长核算方程的潜在产出结果（1978—2020）

指标	1978—1994	1995—2009	2011—2015	2016—2020
实际产出增长率(%)	10.06	9.90	—	—
潜在产出增长率(%)	10.29	9.83	7.19	6.08
实际就业增长率(%)	2.45	0.97	—	—
潜在就业增长率(%)	3.23	0.90	-0.76	-0.74
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6.55	8.84	—	—
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6.85	8.86	8.02	6.87
TFP增长率(%)	0.78	3.89	3.10	2.70
K/L增长率(%)	10.38	13.29	18.21	15.43

注：作者根据增长核算方程估计得出。

三、提高劳动参与率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80%；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7.26%。按照地区类型分，城市、镇和乡村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是：62.20%、67.32%、77.62%；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

与率分别为68.18%、73.27%、84.92%。与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参与率相比，中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此外，如果考虑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还会更低。

第一，我们按照通常口径计算的劳动参与率都包含了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务农就当作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有工作。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口径计算劳动参与率时将除掉农业的情况，则更能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因此，我们计算了非农劳动参与率指标，并发现以这一口径计算的结果显著低于通常口径计算的结果。以20-25岁年龄段来看，常规口径下计算的劳动参与率为72.55%，但是除去农业后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为62.76%。因此，考虑到指标计算问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六普”调查中显示出的结果并不乐观（表2）。

表2 按年龄组和性别划分的中国劳动参与率 (%)

年龄组	劳动参与率	非农劳动参与率				
	(包含农业)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16-20	32.44	33.06	30.72	21.78	22.53	21.31
20-25	72.55	76.66	69.70	62.76	68.91	58.95
25-30	88.88	95.73	82.10	84.33	94.01	74.61
30-35	90.30	97.01	83.47	85.98	95.73	75.79
35-40	90.62	96.92	84.18	85.53	95.36	75.02
40-45	90.73	96.63	84.74	84.43	94.50	73.41
45-50	87.73	95.06	79.58	78.49	91.64	62.87
50-55	76.31	89.90	62.62	56.99	81.62	32.19
55-60	67.29	80.41	53.71	37.57	60.88	15.04
60-65	49.59	58.14	40.11	13.80	22.41	5.8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1‰样本计算得到。

第二，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变化呈现出了典型的“倒U型”（见图2）。这一结果很容易得到解释：在低年龄组中，由于仍然有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学习状态，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随着年龄增加，当进入30-45岁之间的年龄组后，劳动参与率将大幅提高；当进入高年龄组时，又会因为年龄增加与工作岗位之间匹配程度的下降，以及养老意愿的增强，劳动参与率开始急速下降。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劳动参与率始终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农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传统口径的劳动参与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虽然目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人口结构变化将带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急速下降。随着人口老龄

化程度上升，劳动参与率将下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我们知道，在劳动年龄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决定了就业规模，进而决定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看到，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就业增长率将开始为负值，平均每年的潜在就业增长率为-0.76%；到“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为-0.74%。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左右开始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峰值出现的更早，在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从理论上来看，随着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会有所下降。因此综合以上因素，中国的潜在就业人数将呈现递减的趋势。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甚至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提高劳动参与率将成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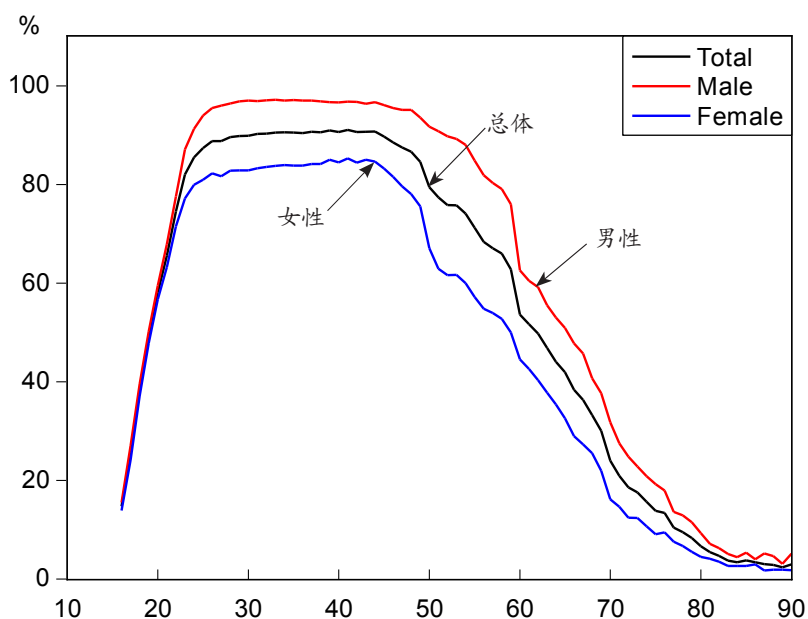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六普”数据

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我们在已有的模型基础上，假设在2011—2020年期间，在中国劳动参与率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8.09%；2016—2020年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6.94%。在图3中，实线表示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中国能够平均每年将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有多种途径，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具有最为显著效果的包括以下三种。第一是延长就业时间或提高退休年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政策手段，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扩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然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分布特征是，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年限显著降低，意味着临近退休的劳动者有着很大的就业难度。因此，至少在近期内这条路难以产生明显的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第二是推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较高，仍然有着较大的劳动力转移空间。进一步推动劳动力转移有赖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第三是提高就业率或降低失业率。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新古典特征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的挑战，需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城乡居民的最大化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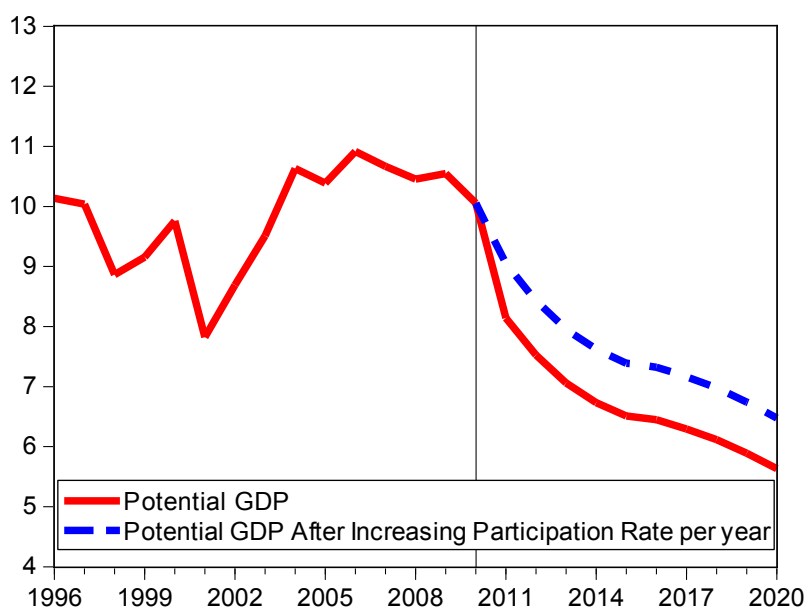


图3 劳动参与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注：实线表示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从2011—2020年在原有趋势劳动参与率基础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借助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追求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速度，既是一种简单易行的

政策手段，又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特质，容易被决策者接受，实施起来也比较直截了当，但是最终会伤害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办法，大多有赖于在诸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通常要求长期和艰巨的努力。但是，中国经济出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说明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进一步的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通常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创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致在3%左右。如前所述，中国改革措施促使生产要素得到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巨大。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即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也是一种“低垂的果子”。

随着剩余劳动力被逐渐吸纳，疾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置不再可得，此外，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因此，需要在更深的层次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作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至关重要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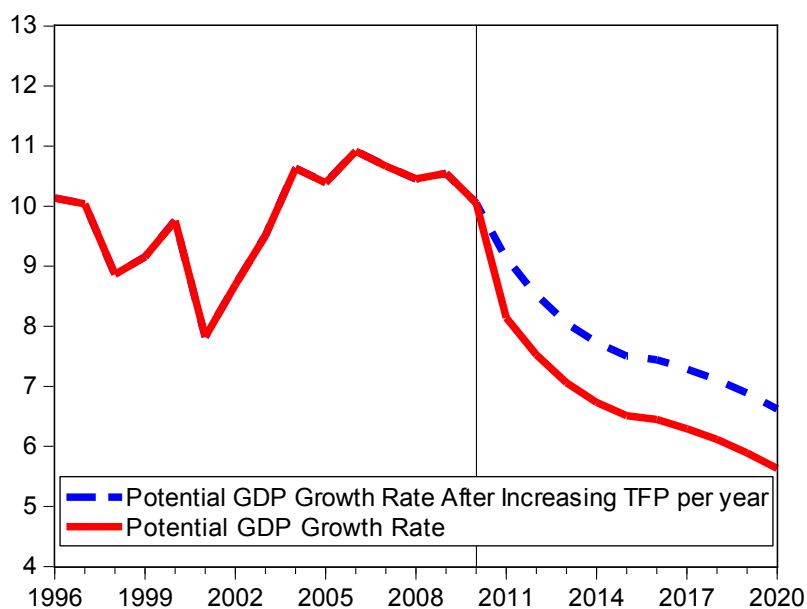


图4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注：实线表示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在2011—2020年期间，在原有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全要素生产率增加1个百分点后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在现有模型基础上，我们假设：在2011—202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例如，假设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3.01%，那么提高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为4.01%。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8.19%；2016—2020年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7.07%。在图4中，实线表示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从2011—2020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中国平均每年都能够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将提高0.99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的新古典增长时期的来临，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目标具有很大的难度，既要有坚定的决心，又需要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新的源泉。新加坡政府在对待经济学家对其增长模式的批评，就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Felipe, p. 27）。

对中国来说，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第一，由于非农产业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第二，各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地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

从这些源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求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特别是进一步界定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非公有经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五、关于政策取向的建议

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逐渐慢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乃至劳动力供给负增长，而同时经济增长继续创造劳动力需求，推动了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而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乃至消失，二元经济发展相应就转向了新古典类型的经济增长。这正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一个比较接近于典型的新古典增长的经济体中，即在目前成熟的发达国家中，GDP增长率并不可能达到赶超经济体所具有的那样高增长率。相应地，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在到达一定阶段之后终究要减速（Eichengreen et al., 2011）。因此，中国在从二元经济发展转向新古典增长的过程中，本文所预测

的潜在增长率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数量投入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可见，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从供给方提高潜在增长率。而如果错误地以为依靠对需求方因素的刺激，可以使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则会造成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各种扭曲，欲速则不达。

相反，正确的政策取向则坚持以下两点。首先，接受这个降低的潜在增长率，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着眼于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不要遇到需求冲击便惊慌失措，而要看经济增长是否会降到潜在增长率之下。如果不是，则出口疲软和投资需求不足等因素恰好可以成为转向消费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契机，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其次，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深层的方面，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或者至少在未来不至使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改革促发展的道理仍然成立，但是，今后的改革不再是低垂的果子，的确需要持之以恒，着眼于未来。

参考文献：

1. Felipe Jesu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 EDRC Report Series, No.65, 199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Philippines.

2. Louis Kuijs, (2009), "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9.

3. 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第2期（中文翻译稿）。

4. 蔡昉（主编），2008，《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5. 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都阳、陆旸，2011，《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及其含义》，《世界经济》第4期。

7. 郭庆旺、贾俊雪，2004，《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经济研究》第5期。

8. 张军、章元，2003，《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第7期。

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中国发展报告2012》，中国发展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世界经济 ·

2012—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 分析与展望

陈文玲

摘要：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长期创伤和欧美债务危机短期冲击的双重影响，欧洲经济身陷危机，美国经济收缩，日本经济长期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下行，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仍处在艰难复苏阶段。展望2013年，全球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主要经济体总需求仍然疲弱。同时，全球经济格局在动荡中加速变化，但新格局的建立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建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 全球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研究员。

一、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难以走出困境，债务危机困境加剧，总需求依然疲弱，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一）美国经济虽实现温和复苏，但呈现出“苦痛相伴”，低增长可能成为长期发展态势

1. 美国经济在矛盾中实现温和复苏。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季度增速分别为2.0%、1.3%和2.0%，全年预计平均增长率为2.2%。经济温和扩张主要受益于个人消费层面的积极影响。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开支分别增长2.4%、1.5%和2.0%，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贡献1.72、1.06和1.42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达到86%、82%和71%。但另一方面，美国市场失业率仍在7.7%的高位，投资需求依然疲弱，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十分有限。目前，美国私人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4%，2012年前三季度私人投资的增幅分别为6.1%、0.7%和0.5%，对GDP分别贡献0.78、0.09和0.07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39%、7%和4%。2012年以来美国企业一直在去库存，存货的变化在前三季度分别拖累GDP 0.39、0.46和0.12个百分点，这显示尽管最新的ISM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指数分

别居于51.7和54.2的扩张水平，但美国企业整体依然缺乏信心，企业层面的经济活动仍欠活跃。不过，从总体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70%以上靠个人消费开支来拉动，因此，个人消费的增长便为美国经济保持增长定下了基调。

2. 2013年美国的经济依然面临着国内外双重严峻挑战。从外部来看，未来一年欧洲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欧元区是美国最大出口目的地，美国出口的20%是输往欧洲；欧元区也是美国最大的直接投资输出地，美国企业海外的销售额有一半来自欧洲市场，美国企业和GDP难免会受其影响。从内部来看，美国两党虽然已经达成解决“财政悬崖”的协议，但只解决了短痛，美国政府已经在2012年12月31日触及16.4万亿美元法定债务上限，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将继续上演，对市场的威胁将更大。此外第四轮量化宽松（QE4）的效果如何，也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2013年美国企业层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大幅度改善，美国经济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实现温和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为2.1%，低于上年的2.2%；联合国预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1.7%。

从目前来看，美国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发生，新能源和低碳、信息技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尚不明朗，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滞胀，低增长或将成为常态。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的高新技术创新实力仍然强大，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扩大国家创新优势等战略，如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2012年欧洲经济陷入基本停滞状态，2013年仍将在低位徘徊，债务危机仍是“老大难”问题

1. 2012年欧元区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虽然免于解体，但危机深化。欧洲债务危机多次反复，尽管欧洲稳定机制（ESM）业已生效，欧洲银行业联盟也达成初步共识，但这些举措仍难以避免欧元区经济整体陷入衰退，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明显的恶化态势。2012年前三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率分别为持平、-0.2%和-0.1%，加上2011年四季度环比下滑0.3%，欧元区经济已连续4个季度萎缩，衰退已成事实。欧洲危机的持续反复，严重冲击了欧洲银行体系、消费和投资者信心，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下降。制造业PMI从2012年1月份48.8%下降至10月份45.4%，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工业生产已经跌至1990年水平。服务业PMI则从年初的50.4%持续下滑至10月份的46%。欧元区Sentix投资信心指数从2012年3月份的-8.2降至8月份的-30.3，11月回升至-18.8。欧元区17国经济景气指数从2012年初的93.4下降至10月份84.5。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IFO）发布的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标显示，相比于一季度，二季度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欧洲家庭以及企业的信心指数已经下滑至3年来的最低点，欧元区17国新增失业人口达到200万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失业人口增加了50%。

2. 2013年欧元区经济仍将在低位徘徊。虽然2012年欧洲各国配合下，欧元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旨在缓解欧洲债务危机：进行救赎欧元的行动，欧洲稳定机制（ESM）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的实际运转，以及财政联盟的推进等，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欧元区短期内面临的流动性问题。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债危机的紧张形势，在短期内趋于平稳，但是离根本解决欧债危机还有相当的距离，欧债危机的紧张形势还有可能发生反复。据IMF预计，201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2%，仍然处于基本停滞状态。从长期来看，欧洲债务风险将长期存在，欧债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欧洲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增长引擎缺失以及欧盟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短期内难见明显成效，摆脱高失业率（11.3%）、高通胀（2.7%）与零甚至负增长状态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欧洲经济局势短期内难以全面改善。据IMF预计，直到2017年欧元区经济才能恢复到1.7%的增幅，接近2001 - 2007年的平均增速，如果这样，债务危机将使得欧洲经济经历“失去的十年”。

（三）2012年日本经济有所放缓，2013年难有大的起色，经济发展前景仍然黯淡

1. 2012年日本经济呈现先增后降态势。受灾后重建带来的投资增长和国内需求带动，2012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环比增长1.3%（合年率5.5%）。但随着国外经济环境恶化和国内消费增长放缓的双重影响，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实际GDP环比增长0.3%（折算年率增长1.4%）。第三季度日本经济陷入衰退，GDP同比下降3.5%，首次出现负增长。11月，日本连续第四个月下调了对经济的评估，创下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长纪录。据IMF预计，2012年日本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2%。

2. 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可能再呈低迷态势。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日本灾后重建和电力供应恢复的拉动作用即将结束，一度依靠政府刺激措施带动的经济增长将缺乏后劲，日本高达230%多的公共债务率，也会直接危及财政可持续性；二是国内非贸易部门拉动经济增长能力有限，贸易部门则受外部形势影响严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调查数据显示，近四成日本人不看好2013年经济，称日本经济可能全面陷入衰退周期。IMF已下调对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下降至1.2%（2012年为2.2%）。

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仍将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劳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年11月发布报告预测，到2060年，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由2011年的6.7%下降为3.2%，滑落为“经济小国”。

（四）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债务危机困境加剧，国际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仍将长期存在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不断攀升，据OECD估计，截至2012年底，其成员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107.6%，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33.1个百分点。

1. 欧债危机是当前全球最大的金融风险。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欧债危机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体系蔓延，欧洲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信用

风险的担忧程度加深，影响了实体经济，欧元区经济进入衰退，加剧了本已十分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欧洲危机本质上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体现，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依赖于财政政策一体化、欧洲政治联盟的建立和欧盟内部经济结构重塑与调整，而这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2. 美国面临债务危机长期化的风险。“财政悬崖”的解决只能暂时缓解美国债务危机。美国债务危机长期化趋势十分明显，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66%上升到2011年的102%，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屡创新高。OECD预测2012年将达到110%，2013年和2014年将分别达到113%和114%。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地位，“财政悬崖”和美国债务危机不仅是美国，而且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道坎，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继续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风险。

3. 日本债务危机也不容乐观。截至2011年底，日本国债和借款余额总计959万亿日元，2011年度日本GDP为468万亿日元，日本的债务总额是GDP的2.05倍，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尽管日本债务主要以中长期为主，并由国内投资者持有，但受欧美债务危机、全球金融紧张局势、债务本身的恶性循环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的叠加影响，日本债务形势前景不容乐观。

（五）美日欧等经济体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2012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主要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已无空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致选择。欧盟推出一系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缓解欧债危机造成的短期流动性问题。2012年1月18日，欧洲央行宣布即日起将法定准备金率从2%降至1%；2012年2月，欧洲央行再次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LTRO）；2012年7月，欧央行下调基准利率（主要是再融资操作利率）25个基点至0.75%的历史最低水平；2012年9月6日，通过启动“货币直接交易（OMT）”欧洲央行推出无限量购债计划。

美国比欧盟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近几年推出三轮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实行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将进一步扩大该机构规模达2.8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转操作，加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每月400亿美元的宽松额度，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达到85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宣布，如果今后失业率高于6.5%，而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美联储将继续宽松货币政策。

日本为实现1%的通胀目标和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央行也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分别于2012年2月、4月、9月和10月先后四次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至91万亿日元。

美日欧竞相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将继续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货币战争，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热钱大规模异动，炒作金融产品与大宗商品；引发各国股市、汇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波动，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

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集体减速，但仍将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较快，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2012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和不确定因素通过贸易和金融这两个渠道，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脆弱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2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显示，亚洲经济增速将从2011年的7.2%下降至2012年的6.1%（而2012年4月，亚行的预期是6.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2012年亚洲经济将增长5.4%；拉美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11年4.3%降至2012年的3.2%；2012年非洲整体经济形势较好（南非除外），IMF的保守估计为5.4%。

2012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下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市场领军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12年第二、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7.6%和7.4%，预计全年增长率为7.7%；印度经济也持续下滑，2012年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和6.9%，IMF在2012年10月将印度2012年全年的增长率从6.1%下调至4.9%。巴西的经济增速自2010年增长7.5%以来，已连续两年低于3%，2012年预计增速为1.6%，在金砖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根据18个新兴经济体的23项服务业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调查而制定的汇丰新兴市场指数（EMI）显示，2012年第三季度EMI从第二季度的53.2下滑至52.1，虽然高于50的荣枯分水岭，但扩张速度为一年来最低。调查还显示，新兴市场服务业未来一年的乐观指数，触及2005年以来最疲弱水准。

201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些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模式”将受到较大挫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以较为强劲的消费需求和非贸易部门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建筑业和商业部门的快速发展，逐步取代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周期，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消费、住房、教育和投资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将继续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三、全球经济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全球贸易高风险低增长

2012年被普遍认为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发展最为艰难的一年。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商品贸易额同比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同比跌幅超过50%。进入2012年，全球商品贸易延续了2011年第四季度的颓势继续下滑，到2012年第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出现同比负增长，分别为-1.3%和-1.6%。服务贸易方面，根据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数据显示，服务贸易同比增长也出现了与商品贸易类似的情况，2011年前三季度，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幅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进入2011年第四季度，世

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下跌至5%和3%，进入2012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皆未见起色。2012年的全球贸易走势已基本明朗，2012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世界贸易增长拖累凸显。WTO2012年9月公布的《全球贸易风险分析报告》，再次下调2012年全年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全球贸易增速预期，认为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不及前20年平均值的一半，全球贸易面临下行风险。2012年全年，世界经济低迷对贸易影响凸显基本已成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进口急剧减速，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也相应放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额仅微幅增长，二季度世界贸易量环比增长不足0.3%，预计该组织34个成员国2012年出口额增长3.8%，增速低于2011年。

2013年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加剧。各国对国际市场激烈争夺，贸易战、汇率战越演越烈。WTO预计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4.5%，仍低于过去20年5.4%的平均增长水平。其中，发达国家出口增速升至3.3%，进口增长3.4%；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将增长5.7%，进口增长6.1%。IMF的预测是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3.6%，应略低于2012年全年增长，也略低于2011年增长。据WTO发布的第七次贸易限制措施监督报告，2011年10月以来，各成员国采取了近200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将持续影响全球进口。主要手段是贸易救济调查、提高关税、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和海关监控。其中，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从2011年11月中旬至2012年6月，颁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多达124项。中国深受贸易保护之害，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55起，增长38%，涉案金额243亿美元，增长近8倍。虽然在若干G20峰会上各方都重申将致力于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贸易壁垒，并将原定于2013年年底到期的反贸易保护主义协议延迟至2014年，但贸易保护仍将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四、全球经济进入持续而长期的深入调整期， 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入调整期，由于发达国家结构调整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的常态。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应该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可能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发展中国家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世界经济新格局和全球治理新模式建立，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将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将逐步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承认新兴经济体崛起是一种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趋势。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据有关研究部门测算，2012年中

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1/3，整个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3/4。经济实力是权力分配和格局变化的基础，对权力分配和格局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世界正在再次经历着一场实力转换和权力再分配的激烈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加强，这必然会加速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革，一些经济问题往往会被推向政治化乃至军事化，抑或说政治问题或军事问题往往伴随着经济利益的争夺。

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些经济体仍然占据着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发达国家在全球研发投入、科技发展格局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德国和日本仍将是全球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和“重回制造业时代”等口号，而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的打击下，英国等国制定了发展先进制造业主要策略和行动纲要，这将突破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方式，有些制造业尤其高端制造业，将出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的现象，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新趋势和新特征，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产业格局和科技创新格局在短期内还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从短期看，尽管新兴经济体已在经济总量和贸易额等指标上占据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份额，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及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拥有先进技术、丰富资金资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新兴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等方面，与发达经济体仍不可同日而语，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

2013年，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尽管世界经济形势严峻，但形成全球共识和采取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可能性却大大降低。建立科学有序的全球治理模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围绕确立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延伸和扩展。尽管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并开始有一些话语权。但相当长时期内八国集团（G8）仍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G8邀请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强调G20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目的是为了化解新兴大国崛起的冲击，确保在现有规则基础上改革，从而维护发达国家既得利益。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催生了G8，它名义上是一个非正式国际组织，实际是当今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其成员构成反映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力量结构，他们力图在全球治理中担任集体单边霸权角色。

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各国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变，G8全球治理能力开始下降。G20峰会开始走向历史前台，在G20框架下，更多强调各国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体现了全球治理从G8主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转变。在未来国际关系中，可能会出现G20框架内若干国家集团权力相对分散的形式，发展中国家将与发达国家共同讨论、解决全球问题。目

前，G20已有从金融、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和安全事务延伸的趋势。但也要看到，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并使之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五、有效应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在机遇和挑战中平稳健康发展

展望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但从长期来看，新的世界经济格局逐步调整和重新构建，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总体来看，中国经济运行处在寻求短期和长期新平衡的过程中。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我们应从战略上着眼，把应对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政策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同时增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以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新趋势带来的挑战，争取和创造新的机遇。

（一）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态势产生较大影响

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美日欧等经济体继续受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经济低迷困境和政策刺激乏力困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尤其是美欧等重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下滑，将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去年前三季度，中欧双边贸易总值4109.9亿美元，同比下降2.7%；同期，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2487.6亿美元，同比下降1.8%；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3554.2亿美元，同比增长9.1%。同时，全球经济放缓也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加大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经济复苏以来，中国不断遭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并被征收惩罚性的保护关税，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较大冲击。而近年来，一些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也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了贸易保护限制，如巴西为保护本国工业限制进口部分产品，阿根廷也准备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等，不仅使中国扩大出口面临挑战，也将对中国贸易多元化战略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可以预见，中国外贸环境仍会持续面临挑战。此外，受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缩水风险增大。

（二）中国宏观政策应更加具有战略性，注重在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之间求得平衡

由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和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进一步放缓的趋势，但目前仍可承受；而中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急需做出调整。因此，中国宏观政策的取向，应注重在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政策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战略中寻求平衡，注重激发改革体制机制产生新的“红利”，形成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

2013年,世界经济仍将处在危机后的调整期,各主要发达国家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全球迈入货币宽松时代,但对实体经济刺激作用有限,中国短期经济仍会有所波动。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波动短期的周期性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由于长时间繁荣导致经济杠杆率过高而无法持续方面的因素,吸取经验教训,谨慎防范经济中的杠杆率过高,坚定不移地去杠杆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审慎的货币政策,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合理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和投向,从源头上控制经济杠杆率过快上升,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从长期来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当前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主要是国内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是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限,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我们必须重视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以改革和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动力为重点,着力深化推进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通过制度变革来促进经济飞跃与发展。

(三) 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2013年,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并不明朗,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应该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加强国家之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要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

1. 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争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更大机遇和话语权。区域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加强区域合作是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方式,也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据WTO统计,目前全世界登记并仍然生效的区域贸易安排达207个,其中85%是自由贸易区。近些年来,中国参与构建自由贸易区14个,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倡议者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积极参与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动,但中国尚没有一套清晰和立足于长远发展的区域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优先安排顺序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总体战略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此,中国应继续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建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战略:加速两岸四地的合作与融合的进程,建立大中国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以亚洲为重点,积极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

世界经济最大失衡是南北不平衡。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应是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缩小南北差距。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通过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积极推进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在平衡规制的国际环境中争取更大权益。2013年，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到世界银行、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建设中，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

要通过多层次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合理反映中国、亚洲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声音和诉求，为中国乃至地区经济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动在G20框架下建立全球大宗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要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继续共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并充分发挥国际多边机构在促进亚欧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要共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参与国际贸易金融准则修订，应继续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机构改革，推动以公平择优为原则选择国际金融机构管理层；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继续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且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总之，2013年世界经济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对中国来说，有挑战，有机遇，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化机遇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健康发展，是中国、也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

参考文献：

1. 陈文玲，2011，《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全球化》第2期。
2. 陈文玲，2011，《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大的国家权益》，《全球化》第4期。
3. 陈文玲，2012，《2011年国际经济形势与2012年展望》，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世情报告》，中国社科出版社。
4. 陈文玲、颜少君，2010，《中国未来30年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特征》，中国编译出版社版。
5. 陈文玲，2012，《现代流通革命性变革》，《中国流通经济》第12期。
6. 梁艳芬，《2012-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资料来源：http://www.caitec.org.cn/c/cn/news/2012-11/09/news_3593.html。
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2.
8. OECD, Economic Outlook 92, November 2012.
9. [美]丹尼尔·阿尔特曼著，陈杰、王玮玮译，2012，《全球经济12大趋势》，中信出版社。

责任编辑：晨乔

· 世界经济 ·

世界经济：2012年基本态势与 2013年面临的风险

谷源洋

摘要：2012年美国的经济持续弱势复苏，欧洲经济由停滞转向阶段性衰退，日本经济复苏步伐急速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弱；2013年世界经济面临着发达国家因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多种衍生新风险、全球CPI升高、美国因能源革命和金融优势带来的干预他国内政能力的增强以及可能出现“财政悬崖”等诸多风险和新引爆点。

关键词：世界经济 美国经济 欧洲经济 新兴经济体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减弱，其增幅为3%左右^①，低于上年的3.9%；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步下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与5.3%，弱于上年的1.6%和6.2%；受欧债危机投资、贸易传导影响以及全球经济减速拖累，全球企业并购交易规模收缩，世界贸易额仅增长2.5%，低于上年的5.7%，贸易与投资保护升温；世界经济远未出现二十国集团所期待的“强劲、均衡、可持续”增长的局面，全球治理和政策协调难度增大。

一、美国经济“锯齿”型波动，持续“弱势复苏”

美国本轮经济周期已经步入第五个年头，然而，美国经济尚不稳定，GDP增速、

① IMF10月的预测值为3.3%。

PMI指数、消费指数、美元指数、就业率等数据上下振荡，呈现“锯齿”型波动，经济依然在复苏底部徘徊。

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1%，远低于上年四季度的4.1%，受消费、投资乏力以及欧债危机传导影响，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降至1.3%。美联储对其经济表现感到失望和忧虑，因而于2012年6月将全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9%—2.4%，较4月的预测值减少了0.5个百分点，并在9月13日出台了投资者期待已久的第三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3），将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为担保的证券。与前两次“量化宽松”不同，QE1与QE2是为了给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而QE3是为了压低购房贷款利率，鼓励人们买房，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试图通过“无期限”购买方式将失业率降至6.5%或以下，实现所谓“全民就业”目标。

由于多种因素的提振，美国经济“硬性数据”强于“情绪指数”，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调升至2.7%，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左右，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1. 奥巴马政府推行“促增长、创就业”政策。鉴于美国经济在复苏底部徘徊，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着力点一直放在“促增长，创就业”方面。为此，美联储出台了系列刺激措施：在结束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美联储于2011年9月开始实施“扭曲操作”（OT）计划，出售4000亿美元短期国债购买长期国债。2012年6月首轮“扭曲操作”到期时，美联储又将“扭曲操作”期限延长至年底，出售267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购买长期国债，继续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刺激经济复苏和降低失业率；美联储于2012年4月将0—0.25%的“超低利率”政策延长至2014年年底，9月又把“超低利率”推迟到2015年中期。

2. 房地产市场出现复苏利好“苗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是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导因。自2007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一根“软肋”，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信贷趋紧；住房需求受到抑制；房屋止赎率高企。因此，2006年7月至2012年1月，美国房价下降了33%^①。然而，自2011年秋季以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逐渐下降，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屡创新低，刺激了房屋购买欲望，房地产市场在“寻底”过程中住房需求上升，出租房空置率下降。美国房地产巨头房利美预计2012年住房销量将达到496.8万套，比上年增长8.8%，独栋住宅开工量为51.1万套，比上年增长18.6%。房地产市场“利好”转化为就业机会，成为经济复苏中的一个相对“亮点”，支撑着经济持续“弱势复苏”，但尚不能轻易地说房地产市场已稳定触底反弹，购房需求结构以及信贷条件等多重因素决定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必将经历较长时间的爬坡过程。

3. 企业流动性充裕，盈利能力增强。2011年美国大型公司已走出危机，生产能力

①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7月12日。

增强，利润增多，每位员工平均创造的收入为42万美元，超出2007年的37.8万美元。大公司持有的现金储备比2007年多出了1.2万亿美元，加上中小企业拥有的储备，美国企业现持有约2万亿美元的现金流。充裕的投资资金为“制造业复苏”创造了条件，使制造业特别是军工产业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2012年3月以来基本稳定在50上下，缓解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企业利润增加和PMI指数回升，主要是由于奥巴马政府推行“超低利率”、减税计划及“再工业化”政策；对海外企业回国投资提供奖励措施；国内能源价格走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增强。然而，受政府削减开支及减税计划即将到期等因素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受到抑制，制造业活动指数一度趋缓^①。PMI指数时升时降，显示着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不稳定性。

4. 能源自给率提高，油气供给及价格压力趋缓。2012年国际原油价格急剧变化，涨跌互见，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变动趋势与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变动大体保持同步。油价在美国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关美国民生和经济复苏。汽油价格高企是共和党打击民主党的一张“王牌”。由于3月份美国进口原油价格环比增加4.3%，导致国内汽油价格大涨，4月初每加仑汽油突破4美元大关，掣肘美国经济复苏，并影响对伊朗石油业制裁计划。为此，美英联手宣布释放石油战略储备；沙特等国则扩大原油供给；再加上主要经济体经济增幅下行；美元指数上升等因素，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回落，但下半年国际油价再次出现反弹。由于美国大力开发页岩气，国内汽油和柴油供应及价格压力不大，但受干旱影响，粮食价格上涨，加上QE3出台，2012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将略超出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区。

5. 消费需求明显回升。美国经济处于“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居民消费支出状况直接关系到美国经济盛衰。负债融资是美国消费增长的支撑因素，2002—2006年期间，家庭债务以年均10%的速度增加。让美国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是不太现实的想法，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并未真正放弃对透支消费的金融支持，美国居民也没有改变“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从危机前的3%左右，一度升至危机中的7%，2012年7月又降回到3.9%，为刺激消费复苏提供了助力，提高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2年美国消费者信贷增长较为强劲，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约2.4%，高于上年的1.6%，但仍低于3.2%的长期平均水平。

经济问题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党争”的主战场。除了“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外，罗姆尼在选举年集中打击奥巴马的两个“软肋”：一是不足3%的经济增长率难以推动就业状况好转。由于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实质复苏”，尽管奥巴马宣称已创造近500万个就业岗位，但2012年底美国失业率依然高于奥巴马刚执政时的7.2%。二

^① 2012年6月出现了近三年来制造业活动指数首次下降。

是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赤字及债务规模居高不下，共和党批评奥巴马是“债务总统”，使美国成为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减赤缩债”是美国国会两党争论已久的问题，主要分歧点在于“减赤缩债”的规模、范围与方法，但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和收缩债务规模是两党的共同目标。美国国会预算局认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到2011年为止，赤字所占GDP比重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由于工资上涨为政府增加了税收及新增开支增长速度较慢，2012年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约为1.089万亿美元，虽比2011财年的1.297万亿美元减少了约2700亿美元，但财政赤字已连续第四年超过1万亿美元，“减赤缩债”依然是美国今后有待解决的难题。

基于美国两党关于经济理念和政策的纷争尚未消除，美国经济未能实现全产能运行，闲置资产达到25年来的最高水平，因而从房地产泡沫破裂到实质复苏必将是一个较为慢长的、痛苦的和艰难爬坡的过程，美国经济由企业库存投资驱动向个人消费开支驱动的结构转变尚需一定的时日。但对美国创新能力和恢复能量以及化解终端问题的“政治弹性”不应予以低估。

二、欧洲经济疲备不堪，由停滞转向阶段性衰退

欧盟、欧洲央行、IMF“三架马车”为解决希腊等主权债务危机，近三年来先后出台多项短期性和长期性措施，包括2012年3月欧盟峰会25个成员国通过的“财政契约”。这些措施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程序性问题，遇到了一些沟沟坎坎，但毕竟有助于推动欧债向缓解方向发展，而不是离这一目标“渐行渐远”。

2012年围绕欧债险情和债务危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变化：

1. 出现了“紧缩”与“增长”两种政策取向之争。财政紧缩政策必然造成经济滑坡，2012年欧元区经济收缩了0.4%左右^①，远不如2011年的1.5%。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升高，社会福利削减，人民生活水准下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下拉作用，使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约1个百分点。IMF总裁拉加德多次警告说主要发达国家不要过于紧缩，没有经济增长，就难以削减财政赤字。

法国左翼代表奥朗德应合了拉加德的观点，反对紧缩型的“财政契约”，突出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则认为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都已超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首要任务必须是实行紧缩政策，“节衣缩食”过苦日子，把赤字和债务逐渐降下来。因此，“紧缩”和“增长”两种政策取向“谁为优先”的争论走向公开化。

奥朗德为“促增长”开列出带有争议性的三剂“药方”：

第一剂“药方”是增加政府公共开支，承诺在5年内政府开支增加200亿欧元。其

① 欧盟委员会秋季预测报告：2012年欧盟经济萎缩0.25%，欧元区萎缩0.4%。

实这是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亦即政府支出增加可以弥补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有形之手”可以烫平经济周期，拉动经济复苏和增长。然而，问题是在“紧缩”和“增长”两难中搞出一个“平衡支架”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刺激经济需要有资金，促进消费需要有钱，如果把握不好“火温”，法国现有的赤字难减，现有的债务难缩。

第二剂“药方”是向富人征税，对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富人征收75%的重税，对银行和石油公司等征收特别税，并推行享受型社会福利政策，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得舒服和体面。从历史上看，欧洲一贯秉承赤字发展经济的思想，长期维持不堪重负的高社会福利政策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奥朗德增加对富人和公司征税之举使法国资本利得税税率从34.5%提高到62.2%，远高于德国的26.4%和英国的28%。重税引发投资者出逃，据法国猎头公司的朗博松估计，约有3—4万法国金融界专业人士现已生活在伦敦^①。

第三剂“药方”是主张发行欧元区债券，以此筹集发展资金和帮助债务国融资。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德国等信用评级为3A国家，债券收益率很低，发行欧元区债券将迫使德国等增加融资成本，并助长赤字国继续大手大脚花钱之风，放缓债务国进行财政改革的步伐。因此，德国对发行欧元区债券持谨慎态度，强调欧盟条约禁止欧洲央行担任终极“金库”的角色，只有在强化欧元区各成员政治和财政纪律的基础上，欧元区才会去考虑和讨论发行欧元区债券问题。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欧盟委员会则支持奥朗德的观点。然而，发行欧元区债券不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而是集体性的决策，弥合两个“阵营”关于欧元区债券的分歧难度很大。

尽管在经济理念和政策上存在分歧，各持己见，但德法关系是欧元区的核心，两国不会放弃早已构筑的“两国轴心”关系。德法经过“磨合”之后，欧盟已于2012年6月末推出1200亿欧元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德法并决定组建政府间双边工作组，以协调应对欧债问题的政策。更具示范意义的行动是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主要推动者和欧元区重要成员，奥朗德宣称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紧缩计划，不让子孙们背负起法国的巨额债务，为此出台了30年来力度最大的财政紧缩计划，紧缩规模超过330亿欧元，并宣布将财政赤字占GDP之比，从2012年的4.5%降至2013年的3%以内，但许多人认为奥朗德的承诺是难以实现的宿愿。

2012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由于房地产“泡沫”问题，导致银行流动性不足，国债收益率走高。为了缓解银行业压力，降低融资成本，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有意从欧盟和欧洲央行获得1000亿欧元的援助，但欧盟和欧洲央行开出的援助条件依然是首先必须提出申请，其次是必须实行紧缩，进行财政改革。因此，西班牙和意大利未正式申请援助，而是通过各自发债进行融资。意大利总理蒙蒂强调要努力实行财政紧缩、削减财

^① 路透社巴黎2012年8月20日电。

政赤字，为偿还19726亿欧元欠债^①，政府决定征收房产税、改革劳动市场和养老金系统，并将拍卖具有历史价值的属国家所有的不动产。西班牙政府也采取了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承诺到年底将财政赤字降至5.3%的水平。西、意政府实施的紧缩行动，为日后向“三架马车”申请援助做了铺垫。上述情况表明，尽管欧元区出现“紧缩”与“增长”两个阵营，但财政紧缩主基调并没有改变。

2. 再次掀起希腊“脱欧”的热议。在2012年5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等三个党派在一系列经济政策上存有明显分歧，因而三次联合组阁均告失败，决定再次举行议会选举，希腊“脱欧”呼声再次高涨起来。希腊前财长帕帕康斯坦丁努认为议会选举是在“困难之路”和“灾难之路”之间做出的选择。

希腊“脱欧”将带来高昂的代价：一是希腊货币将严重贬值；二是希腊银行业将出现大范围挤兑危机以及资金外逃风潮；三是希腊对债务违约，将使国家信誉扫地，难以获得国际社会提供的资金支持；四是希腊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进口成本增加，推动通货膨胀上场，而通过增加税收，又将引起经济下滑，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脱欧”的后果可能比留在欧元区更为严重。因此，新民主党胜出之后即宣布希腊仍坚守欧元区，作为回应和支持，欧盟、欧洲央行和IMF重新启动对希腊的救助计划。

自希腊债务危机以来，欧盟、欧洲央行和IMF已为希腊提供了总计2400亿欧元的援助，其代价是希腊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升至历史新高，融资缺口依然巨大，希腊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的风险并未消除。希腊政府并不希望局势朝着脱离欧元区的方向发展，财长斯图纳拉斯说“我们必须活下去，必须留在欧元伞下。这是我们的惟一选择，以摆脱前所未有的穷困”。总理萨马拉斯甚至表示为了偿还债务，可能会出售或出租部分岛屿，只是要求把“减赤”与“缩债”达标的目标向后延长，希望债权人多给希腊两年宽限期，来完成预定的财政紧缩目标。在此种形势下，如果不能给希腊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那么最终不能排除事态朝着“脱欧”方向发展。因此，拉加德呼吁应该给希腊两年时间来完成财政目标。对欧元区成员而言，欧元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障碍”。希腊“脱欧”不是欧元区希望看到的结果，并将给欧元区带来冲击，但冲击带来的影响难以对其他成员产生退出的“吸引力”，进而产生连锁式反应。由于默克尔多次表示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并支持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采取的紧缩政策，因而希腊“脱欧”的可能性已经下降。

3. 出现了一体化被推动和受削弱的两组因素。欧洲货币联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标志，欧元区在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中一直处于引领的顶尖地位。然而，自希腊等出现债务危机以来，人们在探讨危机之根源时，却涉及到了一体化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

① 截止2012年6月。

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欧元区成员没有遵守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占GDP之比的“趋同标准”要求；欧元区北欧成员与南欧成员对解决债务问题利益不同、观点分歧，等等。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欧元区尚不够完善，需要通过加强财政纪律与财政改革予以解决。

欧盟和欧元区推出的多种政策与措施，其目的在于纠正欧元区的先天不足，推动一体化再向前发展，其中包括建立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防火墙”（EFSF和ESM），加大援助资金运用灵活性，切断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建立欧洲银行联盟，加强金融统一监管；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步伐；削减高社会福利负担，重振经济竞争力；德国宪法法院裁决德国出资欧洲稳定机制（ESM）不违宪；特别是欧洲央行先于美联储QE3宣布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帮助困难的欧洲国家应付短期性偿债能力，等等。

上述在危机中推出的一体化措施，已促使重债国国债收益率下挫。然而，各有关方对业已出台的一体化措施仍存有歧见，有些措施短期内难以成为现实，面对着较多的风险，但毕竟为未来一体化指出了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逆一体化”的倾向：欧洲涌现出反德国、反欧盟的倾向；欧元区出现欧洲分裂、南北欧互执偏见的倾向^①；唱衰或做空欧洲的倾向；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相互抵制的倾向^②。这四种倾向抑制了一体化的发展，成为一体化的障碍，但推进一体化因素仍强于其阻碍因素。欧元区摆脱债务险情和走出债务危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然而，出现严重失控的概率不大。

三、日本震后重建动力不足，温和复苏急速放缓

受美国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及日元升值影响，2008年日本GDP增长率为负0.6%。由于日本政府加强了刺激经济对策力度，以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量，2009年实现了经济零增长，2010年经济增速升至1.1%，步入恢复时期。然而，2011年3月，日本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和海啸重创日本经济，供给链断裂造成许多地区生产停滞。由于灾后重建提振了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购买环保性汽车补贴计划带动了私人消费支出温和增长；日元升值态势一度得以缓解，推动出口反弹回升，促其利好经济数据增多。

日本财务省2012年4月对其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呈现缓慢复苏迹象”，日本央行将2012年经济增长率从2%调升至2.3%。然而，在重建过程中由于电力供应不足，企

① 法国国民教育部前部长阿莱格雷提出成立两个欧元区的建议；德法等11国外长通过的《欧洲未来》倡议。

② 英国和捷克没有签署《欧洲财政契约》。

业电力成本剧增，日元强势，外需疲软，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需求不振以及通货紧缩等多重不利因素导致经济增速急剧放缓。日本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将资产购买和贷款计划从早先的70万亿日元提高到91万亿日元，但仍难以扭转经济颓势。特别是野田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形成“政冷与经冷并存”局面，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可见的“苦果”。因此，继第二季度之后，第三季度经济再度大幅收缩，没有躲过技术性衰退，预计2012年GDP增速为1%左右。

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不仅是由于持续增长的公共债务、通货紧缩、僵化的工作制度以及受欧债危机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长期墨守成规，政局动荡不已，自民党和民主党争权夺利，缺乏创新和转型的意志和能力。日本经济早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顶峰跌落下来，曾经盛名全球的索尼、松下和夏普大公司已陷入全面亏损，日本要想摆脱“失去二十年”的阴霾或许是难以实现的愿望，难以消除“停滞国家”的形象。

四、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慢，反弹回升力度不强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2012年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同世界经济下行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经济形势不再表现为通常所说的“过热”，经济增速降至5.4%，面临“增长恐慌”。特别是金砖国家“结构性短板”显现，经济同步下滑。初步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7%、俄罗斯为3.6%、印度为4.9%、巴西为1.5%，对世界经济起了下拉作用。

新兴经济体面对的主要风险为：一是发达经济体债台高筑，财政紧缩，经济疲软，就业压力难以明显缓解，进口需求进一步减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试图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因而贸易摩擦和货币摩擦升温，市场保护进入高发期。二是新兴经济体同发达国家利差缩小，发达国家为创造就业机会，实施优惠政策，鼓励海外企业回国创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巨额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美欧日以常规和非常规方式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力度，资金又重新回流新兴经济体，国际资金的大进大出诱发金融市场动荡。三是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但部分国家CPI依然较高，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面临着“滞胀”压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释放的流动性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限制了新兴经济体采取进一步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可能。

基于上述因素，有人认为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难以为继。汇丰集团公布的“新兴市场指数”为52%左右，落后于2009年底至2010年初经济复苏初期水平，说明新兴经济体增长有些乏力。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预测显示，2011年和2012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分别为6.2%和5.4%。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既能控制通胀而同时又能避免经济持续下滑。由于新兴经济体居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对外投资潜力大、人口红利高、工业化提速、消费欲望和创新能力趋强、拥有较为健康的

资产负债表，因此，新兴经济体仍以高于发达国家三倍左右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世界财富的积累做出了贡献。渣打银行发布的《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报告认为尽管出现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依然继续增长。10年前全球经济总量约为32万亿美元，自2008年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又增长了14%，截至2011年底全球经济总量达到约70万亿美元。这种危机后的增长部分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大部增长来自新兴世界的发展。因此，世界经济“两速发展”或“南高北低”格局没有改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世界经济依然面临多重风险冲击，复苏步伐受到威胁

IMF和世行2012年年会发表的声明认为，世界经济整体减速，存在“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仍处于挑战性时刻，面临“新引爆点”的威胁：

1. 发达国家“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带来多种衍生新风险。发达国家以常规和非常规方式实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措施，包括美联储的QE和OT以及欧洲央行的OMT。大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虽然没有像美日欧那样维持“超低利率”，但也纷纷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发达经济体维持“超低利率”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初衷，旨在增加经济体内的流动性，激励企业投资，提振消费欲望，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然而，低廉的借贷成本及充裕的流动性并没有真正带动企业对设备投资的增加，也没有创造明显的就业岗位。失业已成为发达经济体深不可测的“黑洞”。

长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等的主权债务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新发债务的利息成本较低，减弱了政府进行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的意愿，财政可持续问题的解决被延缓，影响长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在全球经济和地区经济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仅靠扩大“量化宽松”规模，企业也很难轻易扩张，必须伴随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否则难以改变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形势，并可能衍生出更多的新难题，包括过多的流动性将抬高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形成新的资产泡沫、造成新的货币摩擦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央行需要对发达国家流动性引发的“热钱”大进大出保持高度警惕。

2. 油价和粮价维持高价位，提升全球CPI压力。2012年存在着驱使油价下跌和支撑油价上涨的两组因素左右油价走势，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中东地区政局如何发展，伊朗是否会同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美元走势是升值抑或贬值？由于对这两大不确定因素的认知存在差异，因而国际社会对2012年国际油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预判，第一种预判是国际油价温和波动甚至可能略有下降。英国共识公司预测，受全球需求疲弱影响，2012年国际原油价格将出现微幅回落，总体低于上年平均每桶102美元价格水平。第二种预判是国际油价将大幅上扬。国际能源署认为“非洲和波斯湾地区的动乱可能导致油价飙升”。由于年内伊朗没有越过美国所说的两大“底线”，即发

展核武器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其他影响全球油价的因素还有全球经济疲软，工业生产不振，原油需求偏弱等。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表示，“全球任何地方目前都不存在石油短缺问题”。然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尚未消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伊朗关系持续恶化，从2012年7月1日起欧洲全面禁止进口伊朗石油，美国加大对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行金融制裁力度，美欧日同步扩大“量化宽松”容量，这些因素都将或多或少带来油价上涨的压力，预计全年平均每桶油价在100美元上下波动。

2008年爆发了世界粮食危机，饥饿和粮价上涨造成许多国家的社会暴动，意味着社会常态的破坏。时隔两年之久，2012年美国发生了“世纪旱灾”，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粮食也减产，其影响波及到“从餐桌上的食物，到汽车里的用油”，全球农产品价格再度走高，人们担心重现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引发粮价飙升，造成社会大动荡。由于目前全球大米、小麦和玉米库存量远高于2008年，缓冲了粮食减产的压力，抑制了粮价全面持续上涨。但年内较高的粮价，特别是乳制品和肉类价格上涨推高全球通胀压力，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放松货币政策的难度。世界粮食危机爆发频率加快，高粮价常态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大于发达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有10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给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到2015年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带来了挑战。粮食供给和安全始终是全球性的大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因而把粮食问题看重些总比看轻些更为理智。

3. 美国“能源革命”加“金融优势”，增强了干预他国内政的能。2012年美国开发页岩气取得了新的进展，缓解了国内汽油和柴油供应压力，天然气价格从2008年中期的每千立方英尺14美元降至2012年7月的2.9美元^①。低廉的能源价格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驱动力，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减轻了企业生产成本，增添了企业竞争优势。美国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美国所需石油的50%将来自国内生产，82%的进口石油将由邻国提供，2035年，中东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将几乎停止^②。

页岩气“革命”将抑制原油市场价格，有利于能源消费国，但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将使美国逐渐摆脱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增强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性与主动性；提升美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影响力，并改变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对产油国和消费国关系造成复杂影响与变化；增加美国以油气和金融为制裁工具和手段的干预能力，导致被干预国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崩溃。中国等一些国家对此不能不加以提防，需要尽早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中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储量丰富，似应依据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资金能力进行有序开发，逐步减少对国外能源依存度，提高能源自给水平，以确保国家

① 德国《世界报》，2012年7月22日。

② 俄罗斯《专家》周刊，2012年7月20日。

整体安全。

4. 美国“财政悬崖”威胁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2012年2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了“财政悬崖”（财政危局）的概念，所谓“财政悬崖”系指如果国会不修改相关法律，布什执政时期的减税政策将于2012年年底到期，如果减税政策不延长，纳税人所缴税款将增加；根据两党关于债务上限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减赤“超级委员会”未能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将于2013年1月启动自动减赤机制，10年内削减政府开支1.2万亿美元。因此，美国财政面临两难选择，如果继续延期现有减税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远不及政府开支，造成财政不可持续；假如实行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其经济复苏就会受到拖累。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财长盖特纳担心采取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措施，将带来6000亿美元以上的财政缺口，促使企业更加谨慎地投资和雇佣员工，经济重陷停滞或衰退。IMF亦警告如果白宫和国会达不成新的财政协议，2013财年美国将出现大幅削减开支与增税并存的“财政悬崖”，进而导致美国经济萎缩。

全球市场对于美国“财政悬崖”充满忧虑，但“财政悬崖”对美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及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力，尚未作出足够的反映。最终结果无非是“悬崖勒马”，或是“坠入悬崖”。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财政悬崖”愈益逼近，奥巴马全面拉响了“破崖”警报。从当前形势分析，无论民主党抑或共和党都不愿意看到由于自己的“死坚持”影响到美国经济的脆弱复苏，从而背上骂名，受到选民谴责，影响中期选举。因此，两党经过反复博弈，达成临时性让步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即国会通过减税政策延期、降低征税总额度以及财政削减打折等方式部分化解危机，让美国在“财政陡坡”前止步，避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再次遭受打击。

上述四个“新引爆点”排除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2013年世界经济走势。初步预测2013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疲软状态，日本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将加大“景气刺激”力度，但其经济表现不会有明显的起色；欧元区经济收缩幅度虽然趋窄，但仍将继续轻度衰退。然而，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更快的增长，以“下行风险”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可能发生微弱的向好变化。

责任编辑：刘英奎

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中 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裴长洪

摘要：2012年，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欧元区在经济衰退中挣扎，日本经济增速下滑，多数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经济显现“弱增长”格局，从而导致我国外贸大幅回落、外资受到影响。2013年，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欧债危机深化的可能性减弱，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有望止跌回升，世界经济情况将略好于2012年。为此，我们应抓住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培育和形成我国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 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一、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弱增长”格局

2012年上半年，由于欧债危机反复和蔓延，严重影响了欧元区的经济，对其他经济体的外需造成较大冲击，全球经济出现明显减速。面对严峻的形势，2012年三季度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积极，纷纷采用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和避免政治选举带来的经济运行不稳定。其中，欧洲央行推出OMT(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即为欧洲版QE；美国推出QE3，加上之前的“扭曲操作”，每月释放的流动性达到850亿美元左右；日本央行再次扩大资产购买计划10万亿日元，购买资产总额增至55万亿日元。尽管这些措施可能推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但不会根本改变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当然，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全球经济复苏预期，缓解欧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鉴于此，IMF于2012年10月份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将2012年全球增长率预测值调低至3.3%，为2009年衰退以来最低水平；同时预计2013年的增长仍将乏力，预测增长率仅为3.6%。

（一）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

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长分别为2%、1.3%和2.7%。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加快，得益于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消费者和联邦政府开支增加以及住房市

场的改善。第三季度美国民众个人消费支出增长2.0%，增幅高于第二季度的1.5%。耐用品支出增长较强劲，增幅达8.5%。第三季度联邦政府总支出增长9.6%，第二季度为下降0.2%。自2010年1月到2012年10月，美国工业生产每月均实现同比正增长，2012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3.9%，远远超过GDP增速，对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美国劳工部数据，11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增加14.6万人，失业率降至7.7%，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2012年9月份美国建筑许可证发放量环比增长11%，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算为89.4万套，同样创2008年7月以来新高。最新的新房开工和建筑许可数据表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初步复苏正在逐渐积蓄力量。

但美国经济运行中的私人非住宅投资、农业、出口形势仍然较差。第三季度商业投资疲软，企业不愿增加开支。第三季度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3%，第二季度为增长3.6%。中西部地区的干旱也令经济受到冲击，使得农业库存减少大约290亿美元，总体GDP增幅下降。第三季度出口额出现三年半以来的首次下滑，表明海外需求疲软对出口造成负面冲击。进口也有所下降，但降幅低于出口下降速度。不确定的因素是，美国经济面临“财政悬崖”风险。美国大选后，两党最终将就延长减税政策并降低减赤力度达成一致，但其政治博弈将导致这一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对美国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再度下滑，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决定加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IMF认为，美国经济在今明两年将继续2%左右的稳定增长，但前提是国会在2012年年底通过新的预算方案。

（二）欧元区在经济衰退中挣扎

欧盟统计局公布，欧元区2012年第二季度GDP终值年率为下降0.9%，比初值下降0.5%，进一步加深了0.4个百分点。三季度GDP初值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0.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意味着欧元区正式进入4年来的第二次经济衰退。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12年整个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将下降0.4%，2013年将增长0.2%。2012年其17个成员国中有7个国家的经济将出现负增长，2013年经济出现萎缩的国家仅会减少至6个。意大利经济2012、2013两年将分别萎缩2.3%和0.7%；西班牙经济2012年将萎缩1.5%，2013年将萎缩1.3%；希腊经济萎缩的幅度将最大，2012、2013两年将分别萎缩6.0%和4.0%。

失业率再创新高。欧盟统计局2012年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失业率创历史新高，从8月的11.5%升至11.6%，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0.3%。9月欧元区的失业人数已升至历史性的1849万人，比8月增加了14.6万人。所有成员国中，奥地利以4.4%成为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其次是卢森堡（5.2%），德国和荷兰均为5.4%。西班牙则以25.8%的“成绩”，稳居高失业率国家的榜首。此外，欧盟27国9月失业率为10.6%。值得注意的是，欧元区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3.3%。南欧就业市场继续

恶化，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均超过25%。截至9月底，法国本土各类失业总人数已增至450万，包括海外省则高达470万，再创1991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欧洲重债国债务负担依然沉重。欧盟统计局2012年10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由一季度的88.2%猛增至90%，创下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新高。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为87.1%。其中，债务比率最高的国家依然是希腊，达150.3%，其次是意大利（126.1%），葡萄牙（117.5%）和爱尔兰（111.5%）。

（三）日本经济上升势头减弱

2012年第二季度，受外需继续萎缩影响，日本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GDP环比折年率由一季度的5.5%降至1.4%。日本第三季度实际GDP较上一季度下降0.9%，按年率计算下降3.5%，这是三个季度以来，日本经济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日本财务省10月22日数据显示，受对华出口减少等影响，9月份日本出现5586亿日元（70亿美元）贸易逆差，为连续三个月贸易逆差，三季度比上季度出口减少5%。11月8日，日本东京商工调查所发表的企业倒闭数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日本全国倒闭企业数为1035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预计全年经济增速难以实现2.2%的目标。

2013年全球经济环境并不足以日本外需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同时，日本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相继爆发领土争端，对其出口也将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在三大需求都不会出现明显起色的情况下，2013年日本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不可避免。

（四）多数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

进入2012年第三季度，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减慢。印度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从二季度的5.5%放慢至5.3%，创三年新低。俄罗斯前三季度GDP同比仅增长3.8%，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9%，对外贸易增长3.5%，零售贸易同比增长6.3%，均低于往年水平；巴西第三季度GDP环比仅增长0.6%，同比仅增长0.9%，第三季度工业下降0.9%。

为此，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巴西政府主动干预汇市，并连续7次降息，还出台了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俄罗斯新政府预留了400亿美元的发展资金；印度政府也表示将通过扩大港口、公路和电厂等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政策的刺激效果将可能逐步显现，金砖国家的经济有望趋稳，但全年经济与去年相比将明显减速。

二、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直接影响

（一）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回落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12年9月发表的全球贸易风险分析报告中称，受欧债危机拖累，将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此前（4月份）做出的3.7%下调至2.5%；将2013

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此前做出的5.6%下调至4.5%。WTO总干事拉米说,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不及前20年平均值的一半,贸易量的变动低于全球经济增长步伐,全球贸易面临下行风险。尽管美国经济增速慢于预期,日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但全球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在欧洲。WTO预计,2012年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将从此前的2%下降至1.5%,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将从此前的5.6%下降至3.5%;2013年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可达到3.3%,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可达到5.7%。

由于外需不振,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放慢。在9月、10月出口增速曾一度达到9.9%和11.6%后,11月大幅回落至2.9%。累计前11个月进出口总值仅增长5.8%,距离当年10%的目标相差甚远。其中,出口仅增长7.3%,进口仅增长4.1%。外需不足最明显地表现在11月份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长的大幅度回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8.1%降至-18.0%,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从10月份的9.0%降至-2.6%,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速从10月份的44.8%降至19.3%,对日本出口同比增速从10月份的1.1%降至-3.8%。

(二) 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趋势转变对中国利用外资产生一定影响

201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向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外流,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虽然2012年年初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入一度出现反弹,但从3月下旬起再度逆转,尤其是“金砖国家”资本外流趋势更加明显。二季度,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到20%;6月末,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比3月份贬值10%以上,比一年前贬值约30%;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第二季度也贬值11%左右,资本外流压力增大。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2012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总量收缩了44%。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从国际收支来看,2012年中国依然保持国际资本净流入状态,但是不仅流入速度放缓,而且还出现了二季度银行代客结售汇的逆差,外汇占款一度下降。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曾达到3.305万亿美元,二季度降至3.24万亿美元,三季度回升至3.29万亿美元。这种变化虽然对中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毕竟是1994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季度性逆差现象。这种变化也使人民币由“单边升值”转变为“双向波动”,2012年前9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贬值0.77%,但对其他国家货币总体升值,仍是全球最强势的货币之一,不会出现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相互影响的不稳定预期。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测算2012年上半年全球直接投资同比下降8.4%,并预计全年仅能大体与上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持平。在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减弱的形势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下降。2012年前10个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21家,同比下降10.4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7.36亿美元,同比下降3.45%。这是自2011年11月以来,除2012年5月份,连续11个月的负增长。

尽管世界经济贸易的微弱增长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

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中国的应对能力和其他国内有利因素，可以抵消或者减弱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速度仍然可以超过6%，远高于世界贸易2.5%的增长水平，也高于新兴经济体3.5%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由于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跌多涨少的现象，进口贸易量增价跌，中国贸易的价格条件有明显改善，出现了在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反而上升的趋势。前11个月贸易顺差累计已达1995.4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达到2200亿美元左右，金额大大超过上年，这将使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上年的负贡献转变为正贡献。

从各个贸易结构观察，也有积极的因素在积累。（1）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仍然呈现增长态势。2012年前9个月，中国与南非贸易增长37.1%，对其出口增长10.8%；与俄罗斯贸易增长14.2%，对其出口增长14.5%；前10个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3238.9亿美元，增长9.4%。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比重不断提升，东盟持续保持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南非等若干新兴市场国家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有所提高。（2）机电和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前10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9573.8亿美元，增长8.5%，高出同期中国外贸出口总体增速0.7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出口总值的57.2%。鞋类382.4亿美元，增长10.6%；家具393.8亿美元，增长31.9%；塑料制品259.4亿美元，增长39.7%。（3）中西部部分省市区快速增长。前10个月，重庆、安徽、河南、四川和江西等中西部省市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40%、67.9%、54.1%、40.2%和32.7%。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中国在2012年上半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在2012年前6个月吸收了59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略低于上年同期的609亿美元。美国在2012年上半年吸引了574亿美元投资，较上年同期减少39%。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前景仍然被跨国公司看好。

三、在2013年世界经济格局中趋利避害、顺势而为

（一）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预测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预测，2013年世界经济情况将略好于2012年，其理由是：

首先，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银行业盈利改善，实体经济景气上升。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发布的最新季度报告显示，2012年全美7246家银行及储蓄机构二季度共计实现利润34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7%，美国银行业已连续12个季度实现盈利同比增长。与此同时，二季度美国“问题银行”数量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降。截至6月底该公司统计的“问题银行”数量从3月底的772家降至732家，为2009年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问题银行”总资产规模从2920亿美元下降至2820亿美元。美国共

有50家银行倒闭，这一数字少于去年同期的90家。

2012年10月1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报告显示，9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1.5，分行业来看，在18个制造业中，当月有11个行业实现扩张，包括服装和初级金属等传统行业。同时，以3D打印和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也迅猛发展。

其次，欧债危机深化的可能性减弱。由于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宣布将在二级市场无上限购买重债国短期国债，使债务问题继续向其他国家蔓延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一定程度增强了各经济主体的信心，降低了不确定性。因此与2012年相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可能有所减弱。

再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仍然有望止跌回升。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内在动力看，由于多数经济体仍处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周期，在技术上又可发挥后发优势，人口众多而且年轻，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这是新兴市场国家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原因。该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而激活，从而继续推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政策层面看，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政策尚有较大放松空间。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基准利率仍保持8%及以上的水平，下调余地尚存；财政赤字水平较低，也存在政策放松的空间。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看，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向市场经济继续转型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结构变化，不仅可以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增长的动力，而且都需要进口先进的技术和工业设备，从而带动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

2. 2013年世界经济依旧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无法摆脱低速增长状态。（1）欧洲和日本经济仍将低迷。目前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政策治标不治本，多年累积的矛盾和财政赤字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化解，实体经济不振加上不灵活的用工制度将继续影响欧洲国家的就业水平。日本社会人口老化等问题使经济缺乏内生动力，中日关系不睦也将影响日本经济。预计2013年日本经济将出现负增长。（2）全球性新经济短期内尚无出现的可能。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虽然喷薄欲出，但距离大规模产业化并引领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之路尚遥。从国际合作来看，发达国家不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技术设备，资金缺乏导致对外援助下降，贸易壁垒却在不断加强，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也在降低。（3）受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绊脚石。根据WTO最新统计，在2011年5月至2011年10月，各国政府共出台了15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到G20货物进口额的0.5%、全球进口额的0.6%。而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的7个月时间里，各国政府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增加到182项，影响到G20货物进口额的1.1%、全球进口额的0.9%。（4）各国刺激政策继续释放流动性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加大。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洲央行购买国债的政策都将进一步导致流动性泛滥和本币贬值，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巨大压力，同时通过传导效应加大普通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二）中国应抓住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多数国际组织预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将略好于2012年。从总体形势上看，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这一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为此，我们应抓住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首先，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目前中国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仍很明显，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占GDP比重49%，但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8.3%，仍低于2006年的28.8%。从投入结构看，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靠大量物质消耗支撑。因此，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还要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实施创新驱动也是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综合各类研究就会发现，其基本结论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核心，那就是创新，这是惟一的出路。简单地说，创新包括推进科技前沿和采取已有的知识进入生产过程。要保证每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保证每个人都有参与到核心创新过程中的可能，要保证对创新的金融支持，使得草根企业能够利用创新进入到生产前沿。从已有的研究看，创新应该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包括保证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催生创新的产业和地区集聚，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等。因此，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其次，要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依据十八大报告的精神，主攻方向是：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从需求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偏高，尚未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的良性循环。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3.8%，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约16.1%。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6%。与以往相比，消费增幅与投资增幅的差距呈现改观现象，但仍然低于投资。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是投资带动型的。这将导致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和闲置，降低投资效率，因此需要逐渐加以调整。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比重偏低。2011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8%，与上年持平；第三产业比重为43.1%，同比降低0.1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经济体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方向发

展。目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60%，发达国家在75%以上。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表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一些地区可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在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十八大报告很明确，要强化需求导向，发展先进制造业，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加强正确引导，不是单纯为提高服务业比重而调结构，而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协调性已有明显改善，还需继续改善。从人均生产总值看，最高的五个地区(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浙江)与最低的五个地区(安徽、西藏、甘肃、云南、贵州)的比例明显下降，从2005年的4.89:1降至2010年的3.83:1。从生产总值比重看，2010年中西部占全国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达到38.4%，东部下降了2.6个百分点。但差距仍然是明显的，还需要继续改善。

继续推进城镇化。如果“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率延续规划预期的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到2015年可达到55%，到2020年将接近60%。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这就意味着今后20年，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镇，这也是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仍将保持较快发展的主要判断和基本共识。

但我们要走的是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即以人为本，把提高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发展成果由城乡居民共享的城镇化道路，竭力避免出现一些国家曾经或仍然存在的各种“城市病”。特别是要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决不能出现一些国家曾经或仍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现象。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如果在全国城镇总人口中扣除外出打工的这15863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应为53216万人，城镇化率应为39.5%，若按户籍人口计算则仅为35%左右，统计城镇化率比实际城镇化率要“虚高”11.8-16.3个百分点。很多农民工虽然生活、工作在城镇，但并没有在城镇落户，也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因此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实现新型的城镇化，还要解决城镇化中的结构问题。即实行正确的人口政策导向，着力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地区结构和空间结构，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城镇化的结构性问题出现趋势性好转，使中国城镇化走上结构合理、品质提升、宜业宜居、幸福安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再次，要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由于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趋紧、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因此，要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与巩固农业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要坚持三化同步，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统筹城乡，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实现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三者相辅相成，必须同步推进。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十八大报告提出，农村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最后，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从最低工资看，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60元、1280元、1320元、1080元，比2005年分别提高100%、85.5%、91.3%、125%。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10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2.9美元。从土地价格看，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其中，商业服务、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比2005年上涨174%、267%、32.5%。

（三）培育和形成中国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培育和形成中国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着手：（1）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做好品牌，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提高出口产品的品牌竞争力。（2）采取精致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3）培育新的商业模式，以生产性服务为龙头，跨地区、跨行业，把大量中小企业连接为完整的供应链，形成整体对外竞争的新优势。（4）发展电子商务，利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寻找新客户，降低交易成本。（5）打造新型的国际商务平台，在原有国内市场基础上，引进国际商务的技术手段、运营模式和广告宣传，形成更多的义乌国际商品交易模式。（6）企业走出去建立国际营销渠道，通过兼并国外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在国外复制商品市场，寻找代理商，建立各种形式的分销渠道。（7）在沿海地区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制造企业。政府要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8）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关键。对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允许企业进入和退出，并藉此机制扩大有效率企业的规模，提高其比重，淘汰无效率企业，比直接代替企业进行产业或技术选择，要有效得多。

责任编辑：刘英奎

· 理论前沿 ·

谈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李京文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科学延续了蓬勃发展的趋势，表现为继承、融合和寻求突破这几种态势。当前，管理科学学科中的热点主要有企业管理的实证研究、关于供应链协调的研究、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以及对网络组织的研究，并呈现多种新的研究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中国管理科学工作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我国国情和各地区情，深化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的交叉、融合，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共同努力，再创辉煌。

关键词：管理科学 研究方法 创新 发展

作者简介：李京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一、管理科学学科研究现状与热点和趋势

管理科学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工程技术与现代数学方法研究社会和经济组织管理中的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它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定量和模型化的分析。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及其经济组织所具有的复杂性是自然界中其他研究对象所不具有的，例如经济社会组织与自然界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动态和复杂关联性，以及人所特有的巨大的个体差异性、目的性、自主性、智能性，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可观测或者观测中会产生扭曲和部分非理性。这些特性使得在管理中应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些困难既是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前进的阻力，也是本学科研究者不断探索、创新的动力。这里我们根据近年国内外管理科学中的一些文献资料对本学科的发展状况、研究热点以及今后发展趋势作简要介绍。

（一）学科发展状况

在20世纪，世界经历了第一、二次产业革命后，管理科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对各

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科学延续了蓬勃发展的趋势，表现为继承、融合和寻求突破这几种态势。

1. 继承。即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提高。首先，表现在运筹学和系统科学，作为管理科学学科最传统的研究方法还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同时，新的最优化模型和决策模型也不断出现，如元启发式算法、超启发式算法、进化算法等的出现，而这些方法之间以及与经典最优化方法之间在不断互相借鉴、融合、完善，求解的速度和解的质量都在提高，同时应用更加广泛，对管理系统复杂性的研究更加深入。其次，生产和运作管理领域仍然是本学科研究的重点，研究的系统性和成熟度进一步提高。除了企业自身的运营管理之外，对于企业间的关系，尤其是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更加重视。运作管理的模型和方法向服务型企业，如物流、金融、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创意等企业渗透。再次，在工程管理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新的工程建设模式不断涌现，工程管理的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日益丰富，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与各类工程项目的结合也更加紧密，工程管理趋于行业化、差异化，项目集群管理和多项目管理已成为工程管理研究热点之一。再者，技术和创新管理已成为本学科主流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则更加深入，发现了有关创新的一些新的定量规律，开发出不少新的技术分析方法。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方兴未艾。随着无线互联网、物联网和“云时代”的到来，信息的采集、获取、传输、存储技术越来越成熟，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的研究受到了更大挑战。作为回应，本学科发展出更多的数据、文本挖掘、知识发现方法，对专利、学术论文、专著、Web数据挖掘、新闻、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和分析，更好地为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和科学决策服务。

2. 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领域中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互相借鉴、渗透。例如，利用信息技术和统计方法对新技术的相关数据加以分析和研究。又如，不同优化算法和决策方法之间的借鉴和综合。二是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模式、方法、工具，扩大管理科学武器库。定性方面，引进了社会学中质的研究方法；定量方面，更多地采用各种更为复杂的多元统计方法、随机过程模型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心理学实验和统计方法和经济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方法、人工智能算法等，研究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

3. 寻求突破。一个重要方向是将管理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传统上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领域中，如领导学、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这些领域目前定量研究方法还比较少，主要是依赖实证方法和各种博弈模型，而且运用还不够成熟，处于探索的阶段。

（二）学科的研究热点

当前管理科学学科中的研究热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管理的实证研究。通常从理论开始，提出企业战略、企业经营或技术创新

行为以及企业效益等如何受各类因素的影响的假设，并通过企业问卷调查或行业数据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的趋势是：发现和研究新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地采用系统、复杂的统计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面板数据分析、多层模型等），分析的严谨性和水平在逐渐提高。

2. 关于供应链协调的研究。主要运用各种博弈模型，如斯塔伯格博弈、演化博弈、合作博弈、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等来研究企业间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以及对非合作行为的研究。

3.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随着“大数据”（big data）时代的来临，海量的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激增，人们分析和处理信息的速度已难以跟上积累数据的速度。因此，开发更加完善的海量数据分析工具和知识发现方法是近年来学科研究的一个重点。

4. 对网络组织的研究。网络视角是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一个比较新的视角，供应网络、知识网络、技术创新网络、技术联盟、战略联盟、社交网络、网络虚拟社区等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领域。

（三）新的研究趋势

1. 对新商业模式的研究。新商业模式的出现以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引起了管理科学学科的关注，本学科侧重用定量模型研究各种新的商业模式，如云模式、网络社区、网络游戏、文化创意企业、格子铺经营模式等的行为规律和管理手段。

2. 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探索。绿色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等是21世纪初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但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停留在理念、概念探讨阶段，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多基于定量分析的管理规律研究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研究。

3. 对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由于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有许多深刻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因此管理科学的研究也开始应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行为和认知理论以及心理需求理论等来研究组织的管理问题。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优化和决策理论是很好的补充。

4. 研究对象不断细化。如网络嵌入性、渠道冲突、开放式创新、原始创新、行为合理化、灰色营销等等。概念和对象的细致明确有利于更准确的度量和定量研究。

5. 运用的研究方法不断细化。如区间直觉模糊集、定价-购买博弈模型、各种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预测性回归(predictive regression)等，这些研究方法往往是针对某类具体问题的适用方法。细化方法的发展表明管理科学在不同应用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6. 全球面临的挑战和社会问题正在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焦点。全球安全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流行病防治、社会公平、资源有效利用条件下的社会福利增长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解决。从事这一领域的创新活动不仅来自公共

机构，而且私营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其中，如何平衡企业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需求等正在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

7. 全球化与数字社会使得个体、企业、政府间的合作（网络关系）既十分必要，又具有了条件。因此要在企业间、企业与政府机构间建立合伙、合作网络和共生关系。这就向公共机构提出了挑战，公共部门应具有新的思维方式和能力。

总的讲，管理科学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门重要学科。无论宏观经济的预测、规划与路线的制定和实施，还是微观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管理科学的指导与调控。

（四）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1. 管理现象的测量方法和手段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众所周知，定量分析的一大障碍是管理现象的不完全可观测性。而心理学、行为科学、组织和管理理论为管理测量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新的信息技术和测量技术为管理测量提供了新的方法。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研究成就，进一步形成对管理现象的测量方法和手段，是今后管理科学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

2. 质的研究方法与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将更紧密地结合。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是近年来本学科从国外社会学领域借鉴来的比较成熟和严谨的定性研究方法，其中如扎根理论、深度访谈、案例和多案例研究等在本学科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并且研究形式越来越国际化、规范化，成果质量在提高，今后应进一步扩大应用。正确、规范和严肃地使用这些研究方法可以为管理科学学科提供质量更高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框架和新假定，对管理科学扩大研究领域和深度研究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3. 学科交叉与融合将更加广泛。管理科学发展趋势及其与数学、系统科学、统计学、经济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互相交叉、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是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对管理科学的渗透会愈加显著。

4. 模型将更加追求实证化和实用化。以管理博弈为例，目前许多管理研究中的博弈模型还比较符号化、抽象化，对现实的简化处理较多。今后的趋势，一是加强博弈模型的案例和实证研究，二是增加博弈模型的定量化和实际应用。

5. 智能化的模型和技术将得到更大发展，并向实际应用迈进。在智能模型方面，多智能体模型较好地体现了组织和管理的多元性、多目标性和交互关系，是很有潜力的管理方法论，但目前该方法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智能技术和算法方面，由于人类所积累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激增，深度信息分析和知识发现单靠人脑已经不够了，信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挖掘显得越发重要。因此，如何赋予计算机更加“聪明”的技术，以帮助人类进行知识发现和深度加工应该是信息管理研究领域

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国内外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要加以发现、引进与应用。最近我在科研中发现一种处理大量数据的新技术——索菲系统，它是一种动态决策创新系统，运用数据处理技术与融合智能认知等多种科学知识，对组织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分析、据以进行协同决策，进而提高绩效的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决策工具。类似这一类工具在提高管理科学上将能起较大的作用。

二、中国管理科学工作者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管理科学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还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和国内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挑战和历史重任，中国的管理科学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为此，我认为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包括学科领导、研究教学人员和实践操作人员，应统一认识，为建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创新发展，再创辉煌。具体讲，应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于管理有二重性，管理科学是一门有阶级性的科学，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必须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学的基础上，引用和推广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科学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对待“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上，可模仿先贤们推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面向现实，综合创新”的口号。我们要认清当前民族复兴的大局需要、管理科学研究的形势和面临的问题，紧紧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创新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量。

2. 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和各地区的区情，一切以国情为依据，分析解决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3. 深化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的交叉、融合。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几年，我们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已经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管理科学研究与教学包括老中青专家在内的队伍，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上下共同努力，一定会逐步完成这个任务。

责任编辑：刘英奎

加强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中国 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

范黎波 施屹舟 郑伟

摘要：后危机时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实力明显处于上升期。为保证经济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金砖国家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都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中国若能及时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加大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力度，不仅是对“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支撑，更能有效化解因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于集中而导致的投资风险问题。本文将从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入手，分析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就中国进一步拓展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 金砖国家 直接投资

作者简介：范黎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施屹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管理学硕士；

郑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显著提升。截至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852.1亿美元，较2003年的332.2亿美元增长10.6倍；中国海外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境外企业已经有1.8万多家，在外人员约120万人。然而，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区域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遍布世界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亚洲地区占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0%以上，仅香港一个地区就占存量的六成，占亚洲投资存量的90%以上；拉丁美洲位居第二，而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中，90%左右又集中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过于集中，极易引发投资风险，不利于实现对外投资多元化的目标。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金砖国家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更加积极和宽容的态度，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

因此，中国如何因势利导，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加大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实现海外投资区域多元化，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一、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中国对金砖国际累计实现直接投资89.6亿美元，较2003年的1.6亿美元增长56倍，在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也由0.48%提高到2.32%，增长近5倍；2003—2011年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72.5%，虽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9年出现负增长，但仍远高于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年均38.3%的增速（见表1）。

从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情况来看，2011年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存量达10.8亿美元，较2003年的0.5亿美元增长近2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51.8%，较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高出近14个百分点。巴西目前是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金砖国家中惟一的拉美国家。巴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根据巴中商会2010年公布的中国投资分类看，中国对巴西主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类产品，其中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占45%，矿业占20%，农业20%，钢铁10%。但随着两国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投资目标也正逐渐趋于多样化。除能源领域的投资合作外，2010年国家电网斥资17亿美元收购了巴西境内7条输电资产100%的股权；宝钢和武钢也分别在巴西兴建了钢铁厂；机械制造业的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在巴西设立了分公司；诸多中国民营企业如格力电器、奇瑞汽车也纷纷在巴西建立了生产基地。

表1 2003—2011年中国对外指直接投资存量及中国对金砖国家投资存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	同比增长	中国对金砖国家直 接投资存量	同比增长	占比
2003	332.2		1.6		0.48
2004	444.8	33.9	3.8	137.5	0.85
2005	572.1	28.6	6.7	76.3	1.17
2006	750.3	31.1	12.5	86.6	1.67
2007	1179.1	57.2	24.3	94.4	2.06
2008	1839.7	56.0	53.3	119.3	2.90
2009	2457.6	49.2	51.1	-4.5	2.08
2010	3172.1	29.1	83.4	63.2	2.63
2011	3852.1	21.4	89.6	7.4	2.32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11）》、商务部网站数据库。

从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情况来看，近几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发展较快。

良好的国家关系为发展投资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截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对俄直接投资 27.9亿美元，较2003年的0.62亿美元增长44倍，年均增长率达77.03%，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也由0.19%上升至0.88%。目前，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微电子、通讯、家用电器组装、能源及木材加工领域，同时投资水平在不断优化。如中国对俄林业投资正在越来越多地从采伐向深加工发展；中国企业在铁矿、有色金属、石油开发等资源、能源类投资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包括中国石油收购俄罗斯Rosneft石油公司7.58%的股权、中国石化收购OAO Udmurtneft石油公司49%的股权等；中国企业参与俄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莫斯科投资建设中国商务中心、参与萨哈林州南萨哈林市城市综合设施项目建设；中国企业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建设汽车组装厂、在圣彼得堡建设浮法玻璃厂，以及中国企业对俄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渔产品捕捞及深加工等行业进行投资等。

从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情况来看，截至2011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量为5.76亿美元，较2003年的96万美元增长近500倍，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57.27%。虽然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较对其他金砖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并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负增长，但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速很快，体现出两国企业良好的合作前景。目前，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并未全面展开，投资主体主要为民营企业，投资的领域也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华为等少数几家公司在印度进行了科技及电信领域的投资。但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电器机械设备及器材、化工、制药、电力、电信等领域都制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前往发展，这对全面拓展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从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情况来看，截至2011年，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达42.13亿美元，较2003年的0.45亿美元增长近95倍，年均增长率达79.62%。中国对南非的直接投资位列金砖国家之首，同时南非也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国。目前，中国已在南非设立企业超过160家，中国企业主要分布在约翰内斯堡地区和各省工业园区，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服装、纺织、家电、机械、食品、建材、矿产开发以及金融、贸易、运输、信息通讯等。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并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中钢集团斥资2.25亿美元向SAMANCOR公司购买多项资产，并组建成立合资公司，各自占有50%的股份；中国最大的风电企业龙源电力集团、中非基金与南非两家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参与南非三个风电场共计1590兆瓦的风电项目投标等。同时，华为、中兴、江淮汽车等公司通过多年探索也已打入南非主流消费市场。

二、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金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问题也接踵而至。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点:

首先,投资规模仍相对较小。在“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大幅提升。截至2011年,中国已实现对外直接投资3852.1亿美元,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强国,上升到世界第五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仍过于集中,对金砖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增速较快,但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也仅为2.32%。投资规模较之贸易水平明显滞后,不利于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深入发展。

其次,投资主体及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从投资主体角度来看,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主体虽然已呈现多元化趋势,民营企业投资开始提速,但国有企业仍占绝对优势地位。投资主体集中在国有企业,一方面易引发政治猜忌,对外投资壁垒增加;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投资所占比重很小,不易发挥民营企业自身小、快、灵的优势。从投资的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对金砖国家投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中国企业的对金砖国家投资合作主要集中在煤、铁、有色金属、石油等能源、资源类产业,以及中国已经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农业领域的投资仍然较少。

第三,中资企业管理水平不高,违规经营时有发生。中国企业在大型投资管理、大型投资资本运作方面都缺乏经验,既缺乏整体的企业模式运营经验,又缺乏掌握这些经验的人才。中国企业现有的海外投资,多数不是由于企业国际化经营所需,而是中国式企业在国外的翻版。这导致了海外投资企业在直接面对国际市场时,却按本土化的模式进行管理。企业产权关系模糊,财务管理不规范,经营机制未能与当地市场的运行规则和国际经贸惯例接轨,存在管理上“水土不服”、对市场反应滞后等现象。另外,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环境、政府效能、税收政策、劳工保护、工会谈判、国有化风险、外资政策、文化背景、消费特点等各方面都缺乏细致的了解,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漏洞。

违规经营也是中国企业对金砖国家进行投资时存在的普遍问题,多个企业遭遇当地劳工部门调查、工人罢工等情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2009年南非纽卡斯尔的华人制衣厂被指控拒绝支付合法薪酬而面临巨额罚单,同时遭到当地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南非方面的反对者认为,中国企业一方面受本国优厚待遇,对当地市场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在劳工待遇上存在不公,大量中国投资并没有为本地人带来实惠。因此,中国企业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社会,同时改进经营管理模式,按照当地法律合规经营成为未来中国企业扩大对金砖国家投资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四,政府引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同时大力扶持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在提供法律保护、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以及税收、融资、信息和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功能还不健全。这主要体现在:对外

投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不明确，导致企业盲目投资；对海外经营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对企业海外投资缺乏必要的保护制度，使得企业无法抵御投资国较大政治风险等。

此外，各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复杂多变，能源、资源类产品的引资政策趋于严格成为阻碍中国资本进入其国内市场的又一瓶颈。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金砖国家政府对待外商直接投资都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受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引资政策又普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对投向能源资源类产品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趋严。例如：巴政府正在考虑对采矿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设限，包括设置国内供应最低限额以及基于“投资者情况”来筛查交易。重庆在巴西购地遭遇临时追加审批，凸显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其《土地法》修改转折点就在重庆购地的敏感时期；俄罗斯有关部门于2009年6月29日下令关闭位于莫斯科东部已存在20年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没收中国货物总价值约20亿美元等。

三、拓展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正逐渐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是中国维护核心利益、拓展经济外交、推动多元化外贸战略的重要依托。如何有重点的开拓和培育金砖国家市场，加大对金砖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外经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拓展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合作，应找准优势互补点，拓展互利共赢的合作领域，提高投资合作层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在发展方式、地域及生产禀赋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在对金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还存在诸多问题。后危机时代，处理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需要智慧和技巧，这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规避因对外投资区域过于集中而带来的投资风险，扩大战略空间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以世界杯、奥运会为契机，全面拓展对巴西的直接投资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不断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外资流入的政策，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受到政府政策的推动，流入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逐年增长。据2011《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巴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84.62亿美元，同比增长54%，世界排名也从第十五位上升到第五位。巴西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巴西政府积极的引资态度都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巴西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巴西将于2014年举办世界杯、2016年举办奥运会，场馆建设、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大量需求，中国应抓住机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巴西相关领域的建设工作，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2）中巴在水电开发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未来的10年内，巴西将投资近1200亿美元用于新建发电站和输电线路，到2019年电

力装机容量较2009年增加60%以上，输电线路将增加38%以上。目前巴西水电资源只有30%得到开发，在未来的能源开发计划上仍将保持优先水电的发展策略。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为世界首位，在水电建设方面有着较多的经验，未来中国和巴西在水电开发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3）中国应在现有与巴西能源、资源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石油贸易、石油勘探开发、融资、服务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开展资源型产品的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改善投资结构，增强商务、商检、海关等有关贸易部门间的合作交流，改善其市场准入条件，加强投资便利化。

（二）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加大对俄罗斯全面投资

俄罗斯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具有多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地缘优势为中国加大对俄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中国应抓住俄罗斯“入世”的良好契机。根据其入世承诺，俄罗斯将对外国投资企业全面履行国民待遇原则，中国出口企业今后可在俄设立分销公司，使中国产品对俄出口更加便利，出口成本大幅度降低，这对双边经贸往来的发展大有裨益。

从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合作角度来看，中国企业一直希望打入俄罗斯的石油勘探、煤炭、核能等方面的市场，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合作前景向好。在石油方面，2009年两国签署了中方向俄提供250亿美元长期贷款换油协议：中方提供固定利率6%的贷款，俄方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从2011—2030年，俄方通过管道每年向中方供油1500万吨，总计3亿吨石油。中俄原油管道计划已于2010年建成投产，这标志着双方在石油领域已进入长期战略合作的新阶段。在煤炭方面，中国企业已开始向俄煤炭工业投资逾10亿美元，俄已向中国供应煤炭逾百万吨。在核能方面，中俄两国就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造价达成一致，田湾核电站已成为中俄间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

从金融领域投资角度来看，商机无限，但风险较大。俄罗斯虽然对银行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其金融领域的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国有控股的银行仍占主导地位，在经营管理中计划经济的痕迹较重，投资风险也较大。今后中国在对俄罗斯金融领域进行投资时应继续发挥央行主导作用，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推动双边金融合作；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为开辟俄方市场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鼓励商业银行努力增加金融品种，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探索以俄罗斯市场为目标的新担保方式，提高我国银行开辟俄罗斯市场的积极性；着重发展两国银行间互信，不断改善金融环境。

（三）巩固传统投资方式，扩大对印度高科技产业投资

中国与印度同属亚洲的发展中大国，发展路径较为相似。两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这也直接导致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但印度市场对中国投资者来说，仍具有广阔的潜力。印度现阶段的情况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各方面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很大，基

建、电信等市场都存在巨大合作空间。而且印度的人口基数很大，具有很大的消费潜力。

未来发展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印度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引导中国企业投资向印度软件、医药、节能环保等高端领域转移，在竞争较大的领域考虑错位投资，促进建立优势互补的生产分工体系，减少两国的产业重合。（2）大力推动对印度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印度的发展正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亟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在基建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加之印度政府采取优惠措施，吸引中国建筑企业前往印度投资，将极大刺激中国企业的投资兴趣和力度。（3）政治互信是对印度进行投资合作的基础。近年来，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印度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仍有一些限制，例如有些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竞标被以安全为理由遭到限制。中国政府对待中印经贸关系应审时度势，积极调整，把握主动，发掘优势互补，扩大利益共同点，寻求共同发展；中印两国应加强沟通、求同存异，寻求共同发展的互信基础；通过政府、媒体、民间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逐步构筑双方相互了解信任的新局面，为扩大两国投资合作铺平道路。

（四）以能源、资源为依托，提升对南非直接投资层次

南非作为中国在非洲大陆最大的投资国，其市场化程度很高，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限制较少，同时南非非常希望中国企业对其制造业、铁路、电网及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特别是2012年3月双方签署《北京宣言》之后，标志着中南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入实质性阶段，也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南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拓展对南非直接投资的重点在于：（1）依托南非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矿产资源合作。南非矿产资源富集，品味很高，开采技术先进，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钢、五矿、武钢等中国大型能矿企业，应在积极寻求矿权合作的同时，还以并购、参股等多种形式，深度参与南非矿产资源投资。（2）华为、中兴、中国电信等中资企业应更好发挥现有技术优势，拓展高科技通讯领域的投资合作。（3）注重拓展两国银企合作。南非非常重视金融资源的可用度，特别是南非发展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合作。中国金融企业应借鉴工商银行的成功投资经验，大力开拓南非金融市场。（4）积极开拓南非汽车市场。南非汽车工业发达，市场消费潜力巨大，中国汽车厂商应紧抓市场机遇，立足自身优势，全面开拓南非市场。（5）南非现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投入，中国建筑企业应依照南非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对南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6）发挥家电品牌优势，提高中国产品整体美誉度。格力、海尔等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家电企业应积极在南非设立生产基地，健全营销渠道，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大力提升售后服务，树立中国品牌的良好形象。

责任编辑：晨乔

· 国际贸易 ·

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状况 与未来发展分析

杜振华 赵宏涛

摘要：通信服务贸易是目前国际服务贸易中发展较快的部分。论文通过对1997-2011年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状况的总结，指出了通信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竞争力较弱等主要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薄弱和国内丰厚利润使企业无暇顾及国外市场等。提出了促进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通信服务贸易 进口 出口 服务贸易总额

作者简介：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宏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学硕士。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定义，通信服务指为信息、信息产品、信息设备操作、信息储存和设备软件功能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邮政服务、电信服务、视听服务、其他电信服务等。通信服务贸易是指以通信服务为交易对象的贸易活动。从世界范围来看，通信服务贸易与金融、运输和旅游等行业相比，其数额相对较小，但由于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为自身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同时也直接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旅游、国际金融和国际运输等业务的开展，因此，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研究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解决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及服务贸易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及特点

我国通信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展十分迅速。本文通过分析1997-2011年15年来我国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变

化，找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为今后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发展的思路。15年来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 通信服务贸易呈跌宕起伏发展之势，波动较大。从通信服务贸易总额来看，15年来，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发展基本呈上升势头（如图1），但并不排除个别年份出现的波动。其中，2000年和2008年出现的两个波峰最为突出，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分别为15.9亿美元和30.8亿美元。四个波谷1997年、2001年、2004年和2009与2010年，这四个波谷年份的通信服务贸易额均在上升中出现下降。特别是2009与20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年达到高峰30.8亿美元后，下降为24.1亿美元和23.6亿美元。2011年虽有提升，但仍没有恢复到2008年水平。从进出口来看，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出口最高额度的2011年为17.0亿美元，是最低出口额度1997年和2001年2.7亿美元的6.3倍。进口最高额度2008年为15.1亿美元，是最低进口额度1998年2.1亿美元的7.2倍（如图2）。由于进出口波动较大，使得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呈波动性增长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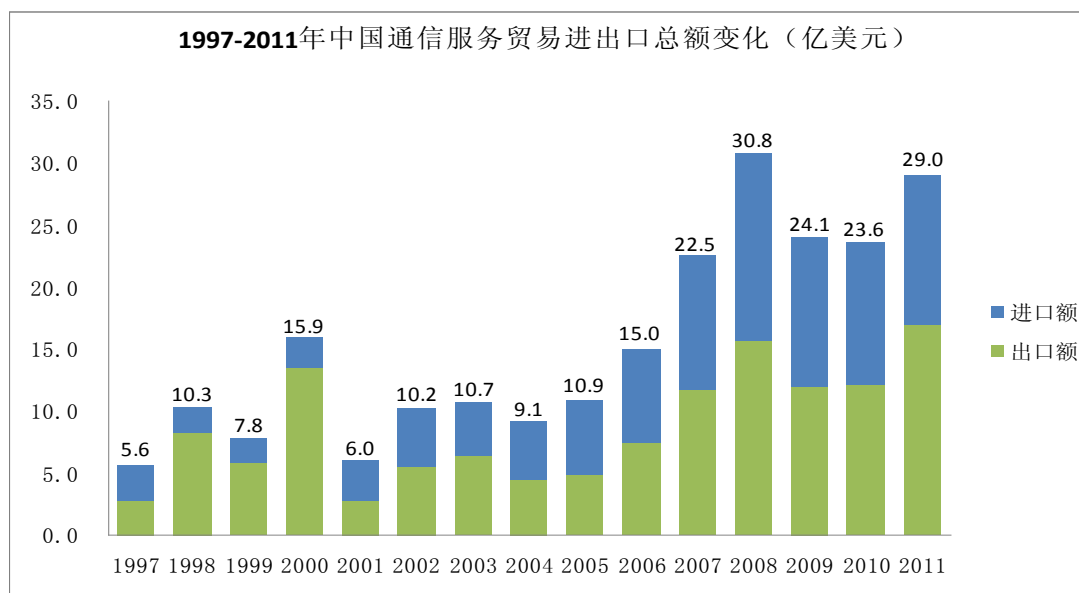


图1 1997-2011年中国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及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2. 贸易顺差与逆差并存，进出口大体呈平衡态势。15年来，通信服务顺差年份为10年，逆差年份为5年。除2000年顺差额稍大为11亿美元外，其他大多数年份顺差与逆差额几乎都在2亿美元以下，进出口基本呈平衡发展态势。这与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呈现逆差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我国服务贸易自1997年以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11年服务贸易逆差已扩大至549.2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5倍。（如图3）。

从国际范围来看，服务贸易大国美国在通信服务贸易方面也具有较快的发展势头，2000-2010年中，通信服务贸易由2000年逆差18亿美元到逆差大幅减少，直至

2010年实现通信服务贸易盈余21.7亿美元（如图4）。法国和英国的通信服务贸易在此期间一直处于贸易盈余状态，法国盈余额度不断攀升，最高达到2006年的16.2亿美元，2007-2010年开始下降。英国虽然也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盈余额度相对于法国要小，最大盈余是2008年的9.9亿美元，之后，开始下降。德国通信服务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额在14-20.8亿美元之间波动。由此可见，我国通信服务贸易除了通信服务贸易规模比美、英、德、法小之外，进出口贸易较均衡发展是最大的特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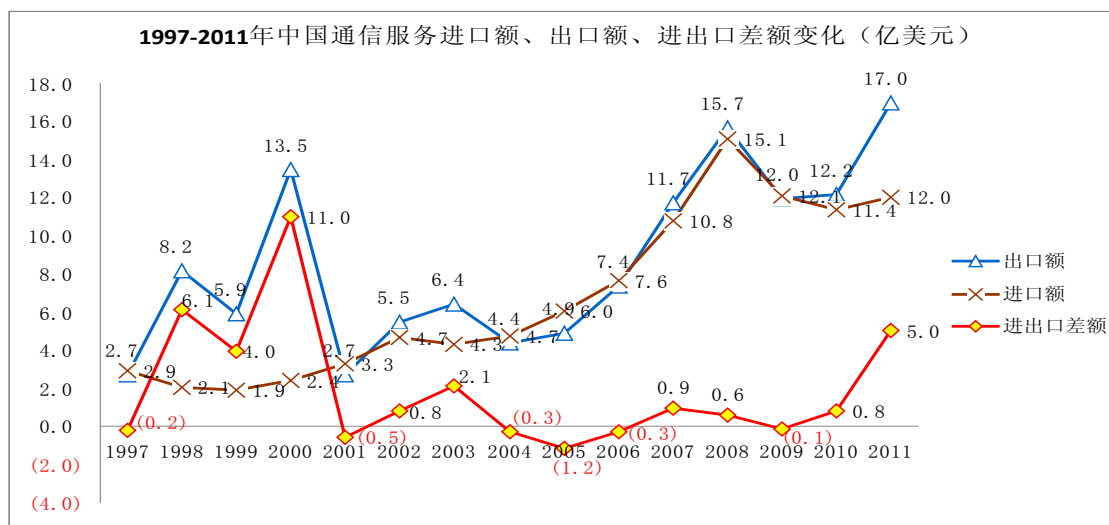


图2 1997-2010年中国通信服务进出口情况

注：中国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0》，2011年中国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其他国家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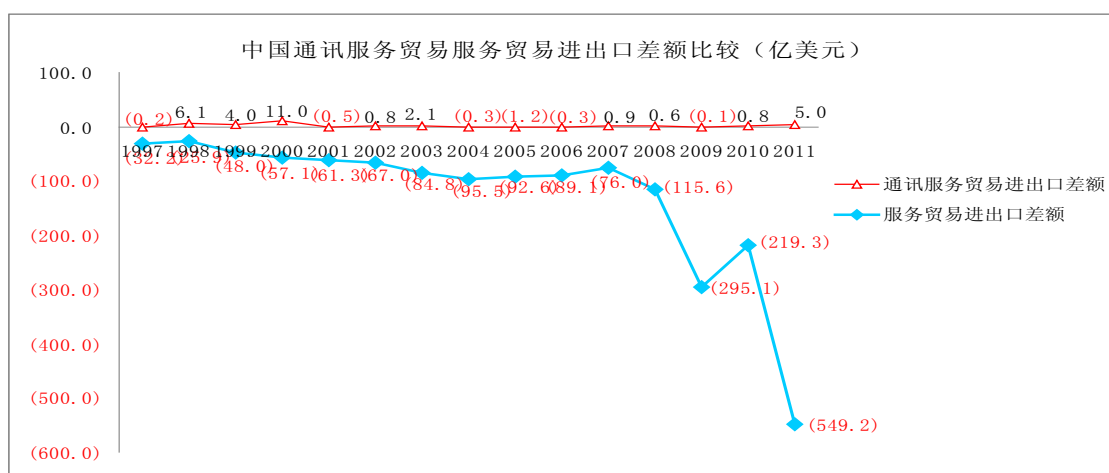


图3 1997-2011年中国通信服务进出口差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变化比较

数据来源：同图2“注”。

3. 增长速度变动幅度较大，但逐渐企稳。由图5可以看到，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增

长率波动幅度均大于同期的总体服务贸易增长率，可谓上天入地。最高增长率为2000年比上年增长103.8%，最低增长率为2001年比上年减少62.3%。若从出口增长率的变化来看更是如此：最高出口增长率1998年比上年增长203.7%，最低增长率2001年比上年同期减少80.0%。进口状况稍好一些，但最高增长率2002年比上年增长为42.4%，最低增长率1998年比上年减少27.6%。而服务贸易的增长率在此期间相对比较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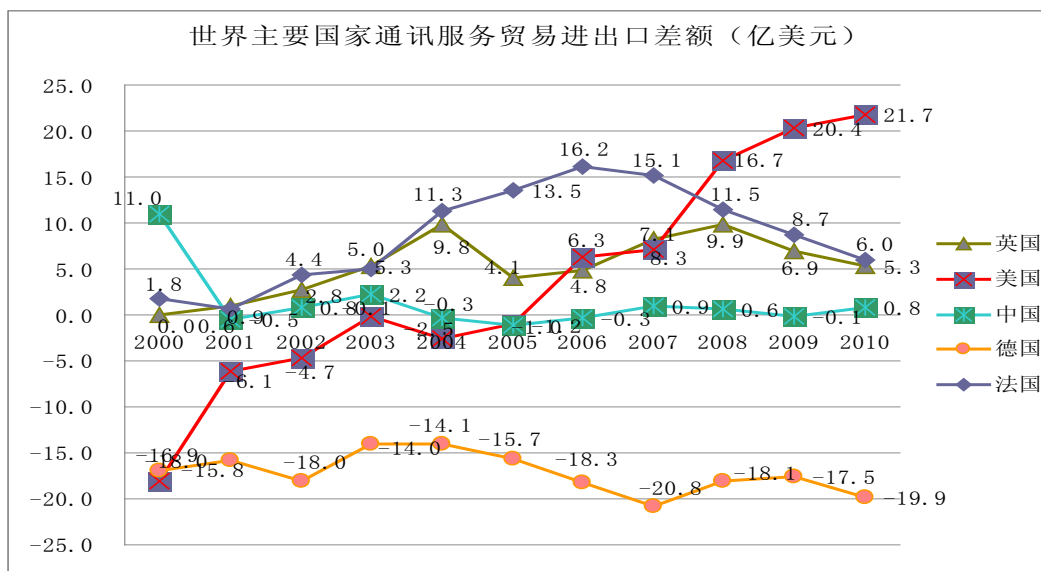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10年主要国家通信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

数据来源：同图2“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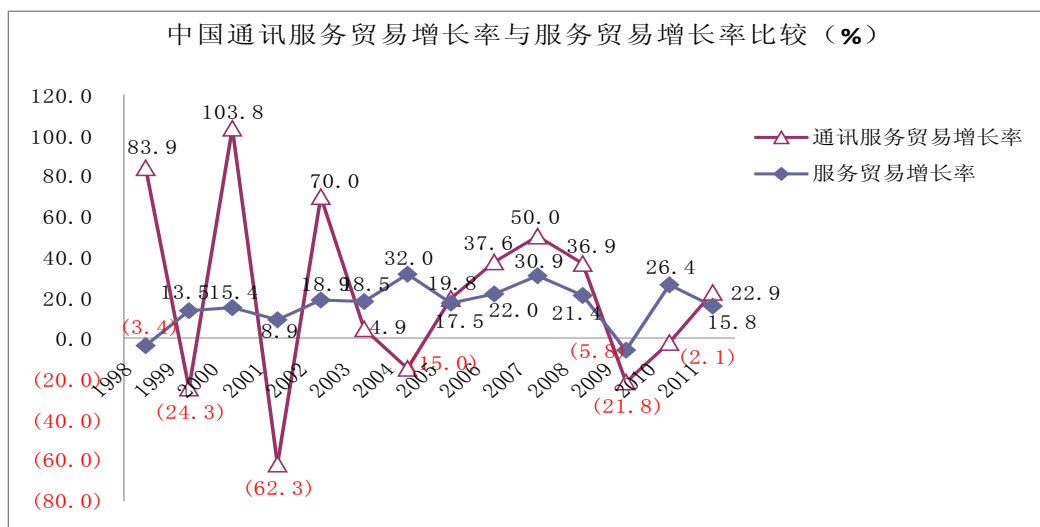


图5 1997-2011年中国通信服务贸易增长率与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率变化比较

数据来源：同图2“注”。

二、我国通信服务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比例较小。15年中，即使是出口高峰年份的2000年，通信服务贸易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也只有4.5%，2011年这一比重更是只有0.9%。进口最高的几个年份1997年、2002年和2008年，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的比例更少一些，只有1.0%（如表1）。

表1 中国通信服务进出口额及变化情况

年份	进口 (亿美元)	比上年增 长(%)	占服务贸易 进口比例(%)	出口 (亿美元)	比上年增 长(%)	占服务贸易 出口比例(%)	进出口差额 (亿美元)
1997	2.9		1.0	2.7		1.1	-0.2
1998	2.1	-27.6	0.8	8.2	203.7	3.4	6.1
1999	1.9	-1.0	0.6	5.9	-28.0	2.3	4.0
2000	2.4	26.3	0.7	13.5	128.8	4.5	11.0
2001	3.3	37.5	0.8	2.7	-80.0	0.8	-0.5
2002	4.7	42.4	1.0	5.5	103.7	1.4	0.8
2003	4.3	-8.5	0.8	6.4	16.4	1.4	2.1
2004	4.7	27.6	0.7	4.4	-31.3	0.7	-0.3
2005	6.0	27.7	0.7	4.9	11.4	0.7	-1.2
2006	7.6	26.7	0.8	7.4	51.0	0.8	-0.3
2007	10.8	42.1	0.8	11.7	58.1	1.0	0.9
2008	15.1	39.8	1.0	15.7	34.1	1.1	0.6
2009	12.1	-19.9	0.8	12.0	-23.6	0.9	-0.1
2010	11.4	-5.7	0.6	12.2	1.7	0.7	0.8
2011	12	5.3	0.5	17	39.3	0.9	5.0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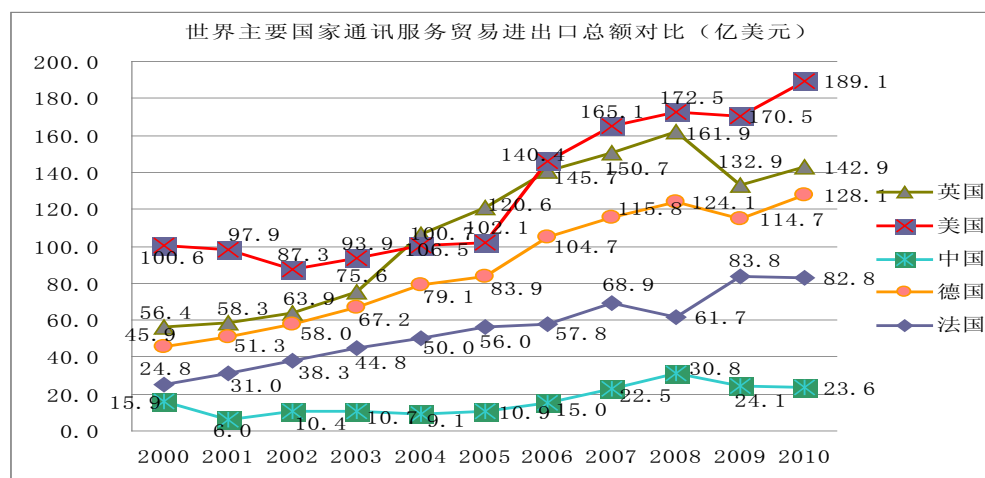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10年主要国家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对比

注：(1) 2000-2001年美国数据来源：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站《2000-2005

年美国BOP分项目统计》(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index.shtml?method=view&id=25983)。(2)2000-2001年英国数据来源: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站《2000-2005年英国BOP分项目统计》。(3)其他数据均根据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站统计数据库(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c/index.shtml?method=tjsj)和OECD数据库整理而得。

2. 通信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图6为英、美、德、法、中五国2000-2010年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发展变化比较图,在此期间,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世界排位从2000年的第12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5位。但是,从通信服务贸易来看,2008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85个国家中,美国在通信服务贸易出口额中占有12.0%,其他英国、德国、法国分别占10.9%、6.7%和7%,而中国只占2.0%。在进口额中,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占11.9%、11.6%、10.9%和3.8%,而我国仅为2.3%。从绝对指标来看,2010年通信服务贸易最大国家美国进出口总额189.1亿美元,是中国23.6亿美元的8倍。同时,还可以看到,美、英、德、法的通信服务贸易总额在2000-2010年中,始终高于中国,这说明中国要在通信服务贸易领域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肩的程度,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3. 通信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服务贸易竞争力大小一般用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Power Index,即TC指数)来衡量,它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常用于测定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在±1之间。指数值越接近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指数值越接近于1则竞争力越大,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指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等于-1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从整体上来看,15年来,我国通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要高于我国的服务贸易,TC指数除2001年和2005年两年略低于整体服务贸易竞争力外,其他12个年份的竞争力均高于我国总体服务贸易竞争力。2011年通信服务贸易TC指数上升到0.172,而服务贸易却降为-0.131,这说明我国通信服务贸易与整体服务贸易相比,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力(如表2)。

表2 1997-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与通信服务贸易竞争力TC指数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总体	-0.07	-0.05	-0.09	-0.08	-0.08	-0.08	-0.08	-0.07
通信	-0.03	0.6	0.51	0.7	-0.17	0.08	0.2	-0.03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体	-0.05	-0.05	-0.03	-0.04	-0.103	-0.06	-0.131
通信	-0.1	-0.02	0.04	0.02	-0.005	0.03	0.172

注:笔者根据商务部统计数字计算得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在2000-2010年间,我国2000年通信服务贸易竞争力达到最高

峰, TC值为0.7, 远远高于同期美、英、德、法的-0.789、0、-0.368和0.073。但随后几年下降, 且一直处于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美国在2003年之前TC指数一直低于中国, 但2004年之后开始超过中国, 2009年之后开始超过法国, 如日中天。英国除2000年TC指数为0外, 其他年份均为正值, 竞争力2008年以前高于美、德和中国, 但低于法国。2008年后低于美国和法国。德国的通信服务贸易TC指数一直是负值, 说明一直处于竞争劣势, 竞争力总体上屈居中国之下。相比之下, 5个国家中, 法国的竞争力较为强大, TC指数一直为正值, 且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势头, 但2008年开始大幅下降, 其竞争优势地位2009年被美国所取代, 2010年TC指数达到0.15(如表3)。通过比较可以看到, 我国通信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是具有潜力和比较优势的。

表3 2000-2010年中美英德法通信服务贸易竞争力TC指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美国	-0.789	-0.062	-0.054	-0.001	-0.025	-0.010	0.043	0.043	0.097	0.120	0.150
英国	0	0.0154	0.044	0.070	0.092	0.034	0.034	0.055	0.061	0.052	0.037
德国	-0.368	-0.308	-0.310	-0.208	-0.178	-0.187	-0.175	-0.180	-0.146	-0.153	-0.155
法国	0.073	0.019	0.115	0.112	0.226	0.241	0.280	0.219	0.186	0.105	0.072
中国	0.7	-0.17	0.08	0.2	-0.03	-0.1	-0.02	0.04	0.02	-0.005	0.034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0》数据计算得出; 2011年中国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其他国家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

三、通信服务贸易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导致我国通信服务贸易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

1. 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薄弱。通信服务是与货物贸易、投资和旅游密切相关的服务部门。欧美国家由于上世纪50年代就已进入信息社会, 其服务贸易十分发达, 作为服务贸易组成部分的通信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在规模上远远高于我国, 其服务贸易发展的长期积淀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5.8%, 而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为6.8%、19.5%、15.7%和15.0%。^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是近些年的事, 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偏低,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 我国的通信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高, 竞争能力较弱, 也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低有关。

2. 技术标准的路径依赖效应。通信服务中的技术标准会使其使用者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从而使技术变迁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一般来说, 技术的采用往往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年鉴》和数据文件。

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在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上，发端于欧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凭借其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通信运营商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欧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继续在通信市场上强化了这种流行趋势，从而实现了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因而由技术标准所产生的一系列衍生服务的通信服务贸易领域，欧美自然而然地处于优势地位。而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要想打破这种由垄断技术延伸到垄断通信服务贸易市场的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奏效。

3. 安全因素所造成的贸易壁垒问题。一般来说，通信服务贸易除了商业贸易的利益外，还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利益等作为政策目标。由于通信服务的信息传递模式涉及国家主权、垄断经营和国家公用通信网、私人秘密等敏感性问题，因此各国普遍存在各种限制，如技术标准、网络进入、价格与设备的供应、数据处理及复制、储存、使用和传送、补贴、税收与外汇控制和政府产业控制政策等限制或歧视性措施。而这些措施不仅阻碍了通信服务贸易本身的发展，而且因为信息流动又是金融、旅游、运输、仓储、建筑、会计、审计、法律等服务者提供服务的先决条件，故其同时制约着其他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

4. 国内丰厚利润的存在使企业无暇顾及国外市场。在我国电信领域，由于国内市场处于三大寡头的垄断之下，它们依靠各自独特的资源优势及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在国际通信服务贸易领域的投入也就相对不足，“走出去”的步伐也就相对迟缓，使我国通信服务贸易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四、促进通信服务贸易健康发展的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包括通信服务企业在内的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生产贸易活动。为促进我国通信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 实现服务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雄厚的通信服务贸易发展基础。我国服务贸易是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服务贸易要改变落后状态，就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由粗放型、外延型转变到集约型、内涵型，使服务贸易的发展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而不是靠一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同时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在发挥优势，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时，要对那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加以适当的保护，使其尽快发展并渐进对外开放。服务发展了，服务贸易才能发展，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才有雄厚的基础作保障。而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2. 完善通信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近年来我国通信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但通信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还承担了电信与邮政普遍服务的义务。目前由于我国还缺乏与通信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法律，特别是《电信法》仍旧难产，那么，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国民待遇原则将使通信服务领域外商在我国商业存在只享受利益而不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目前在邮政服务领域许多国外快递公司已经通过这种不公平竞争把中国邮政最赚钱的部分吞噬殆尽。而在我国电信服务市场上，许多外国通信公司尽管还未进入基础电信领域，但已经大量涌入了增值业务领域，分享国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利润而不承担任何社会成本。因此，加快通信立法，建立我国通信市场公平有效的市场运行规则和通信业务监管体制，对于我国通信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3. 加大我国通信技术标准的推广，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我国虽然在移动通信领域已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但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很难打破欧美的垄断。随着我国自主研发的TD-LTE技术成功入选第四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为我国提供了通信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契机，我国要将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延续到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加快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为中国标准最终引领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打下基础，进而广泛应用于世界移动通信市场。这样，基于通信服务贸易的安全壁垒才能逐步打破，才能使我国的通信服务贸易健康发展。

4. 进一步放宽通信服务市场的准入。改变通信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通信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的资质条件，鼓励非国有经济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通信服务贸易中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综合司，《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春季）。
2. 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0》。
3.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08，《2007年中国通讯行业的服务贸易》。

责任编辑：晨乔

我国服务经济发展趋势和战略*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摘要：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服务经济仍处于培育阶段尚未成为主导力量，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障碍、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服务业改革错综复杂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制约服务经济发展。我国具有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未来10-20年是其关键时期，服务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把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主要城市群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集聚区，同时加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规范建设。为此，需要从创新规划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健全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等方面加强政策保障。

关键词：服务经济 服务业 发展趋势 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杨玉英，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服务经济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在工业化中后期开始出现并在后工业化时代日益成熟的以服务业为主导、并使国民经济整体日益服务化的高级社会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突出表现为以拥有知识、技术、信息的人力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服务业大发展是服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内涵，但服务经济不仅表现为服务业自身的高度发展，更突出表现在服务业与农业、工业的融合、协同、互动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的服务化，其本质特征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中间投

*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1年重点课题“我国服务经济发展趋势和战略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组组长：杨玉英研究员，课题组成员：邱灵、洪群联、郭怀英、姜长云、王佳元、黄卫挺、王立勇、吴伟伟。

入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

一、我国服务经济处于培育阶段尚未成为主导力量

1. 服务业呈快速发展趋势，支撑服务经济的产业基础仍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1978-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3.9%上升到43.4%，服务业就业比重从12.2%上升到35.7%。但是，支撑服务经济的产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按当年价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近10年来只提高了2.9个百分点，至今还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3.2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虽然已经超过工业和农业，但吸纳就业潜力仍未充分发挥，2011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34.8:29.5:35.7。

2. 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初现，服务业支撑、引领作用不足。我国一些制造业企业依托其核心产品，向上下游服务环节延伸产业链条，或发展与主业相关的服务业务，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服务化趋势。但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对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足。投入产出分析表明，2002年、2007年我国第二产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低于第三产业甚至是第一产业；2002-2007年生产性服务对三次产业的支撑作用逐步减弱。

3. 消费服务化趋势明显，服务消费水平还有待提高。2000-2011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分别由40.8%上升到43.4%，由29.7%上升到34.7%。但与发达国家现阶段服务消费比重高达50%甚至60%相比，我国服务消费水平还有待提高。此外，我国服务业领域市场化改革滞后，加之公共服务体系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医疗、教育、电信等服务消费有效供给不足、价格过高。服务消费支出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由价格因素所致，并不完全是实际的服务消费水平提高。

4. 服务贸易持续增长，总体竞争力不强。1997-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从525亿美元上升到4209亿美元，但占当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比重从14.14%降低到10.6%。运输、旅游和其他商务服务等传统项目仍是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金融、信息、咨询、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新兴服务有所提升，但占比偏低。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正在逐步优化，但国际竞争力较弱，与世界服务贸易比重（2009年为21%）差距较大。

5. 创新要素推动作用日益增强，要素流动和配置机制尚不健全。近年来，我国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较快，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对服务业发展的贡献作用日益显现。但现阶段我国

发展服务经济亟需的高素质人才仍然匮乏，知识、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还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重组，创新成果的开发利用机制不健全，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方式亟待改善。

6. 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逐渐优化，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近些年来，我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不断改善。但金融、电信、航空、铁路等垄断行业，以及教育、医疗、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亟待完善。

二、多重因素制约我国服务经济发展

1. 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路径依赖。一是热衷于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大项目和暴利的房地产开发，对长效性人力资本投入、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研发创新投入缺乏兴趣和热情，既不利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又因压低了消费率而制约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二是囿于西方传统工业化在中期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理论教条和实践模式，忽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和及时转向以精深加工化为主导，不利于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和产业分工深化，从而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三是长期以低水平加工贸易方式为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扩大出口，核心关键技术和高增值服务环节被外资和外商控制，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难免产生抑制作用。

2. 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障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隔体制至今尚未完全破除。城乡二元分隔体制曾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放开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后，又在城市内形成了农民工与城民工、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同城不同制”的新二元结构矛盾。这种双重二元分隔体制，既是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也明显弱化了城市化与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效应。

3.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导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分配格局日渐失衡，宏观分配中的居民阶级和微观分配中的劳动要素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目前已明显低于合理水平。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必然导致最终消费需求结构失衡。尽管我国居民收入也在持续较快增长，但在近10多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制约了消费性服务业发展。

4. 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我国R&D支出占GDP比重2011年才达到1.84%，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原提出在1999年就应达到4%，

推迟到2012年才能实现，即使如此，也还比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低1个百分点。对创新成果、创新要素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尚不健全，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偏低，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等高级要素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滞后且缺乏有机融合或对接。

5. 服务业改革错综复杂。服务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其难度之大甚至超过一、二产业。服务改革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科教文卫、社会管理等多方面体制改革，有的还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与民生直接相关，社会关注度和敏感度很高。突破制约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体制瓶颈，不仅需要更大的决心、魄力和胆识，还必须有更科学、周密的顶层设计，更强更有效地驾驭全局和统筹协调能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6. 服务业政策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促进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设计不够合理。例如，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格局，导致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源更注重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多征收营业税，由于不能抵扣其进项所包含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可能高于制造业。现行政绩考核办法不利于服务经济发展，GDP总量和增速实际上仍是评价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国家已出台的产业政策大多针对制造业领域，服务业领域的产业政策比较薄弱且未成体系。

三、我国迫切需要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强调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要大力发展生活性（即消费性）服务业，满足多样化需求，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必然推动社会经济形态高级化的体现。

2.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迫切需要。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不但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及其支撑和促进一、二产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节约资源、友好环境、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实际也提出了在工业化中后期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跨越式发展要求。信息化与服务化是相伴相生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也意味着要超越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推进经济服务化有机结合起来。

3. 构建国家竞争力新优势的迫切需要。发达国家已步入服务经济成熟发展阶段，构成国家竞争力的各种传统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被知识、技术、信息等服务要素改造更新和替代，竞争优势产业已由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仍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传统产业也主要依赖品牌影响力、商业模式创新、供应链管理等服务要素支撑。我国人口红利期临近结束，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日益消减，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我国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竞争力新优势。

4. 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观目标、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这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就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和各类新兴的消费性服务业，同时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切入，推进产业经济服务化，从而为社会、为市场提供高质量、更加安全、更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

四、我国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

1. 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具有加快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时代条件变化，普遍存在着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期缩短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这些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压缩式跨越发展机遇。日韩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欧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表现出同样的加速趋势。我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

2. 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路径，目前已建立独立、完整并有部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意味着我国工业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复西方国家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传统模式，至少无须再着重于扩大重化工数量规模和比重，应当也有条件及早确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务化为主导，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五、未来10-20年是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1. 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促进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服务化。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如按7%测算，经济总量将从2011年的47.3万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55.8万亿元、2020年的78.3万亿元，人均GDP将从2011年的35181元上升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超过10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具备支撑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收入水平。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与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动徘徊局面，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临界点，初步确立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再下一个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达到5%左右，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稳固确立服务经济在我国的主导地位。

2. 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为服务经济发育成长创造广阔平台和强大动力。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将从2011年的51.3%提高到2015年的54.0%、2020年的58.0%，未来10年将有1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破除双重二元结构体制已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内逐步实现。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对生产性、消费性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必然有力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在大中城市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3. 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载体实施，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届时，我国综合入学率、新增劳动力和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将全面超过目前中上收入国家水平（分别为76%、12年、10.5年和15%）；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将比美国高出80%。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及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1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我国将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和要素投入服务化，尤其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互动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

4. 体制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

转型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国将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包括服务业领域的各项改革。2020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我国正加快构建和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判断今后10-20年应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中间投入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将取得长足进展，2020年之后我国总体上将步入服务经济社会。

六、促进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

我国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需要以营造适应服务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体系和体制环境为保障。要着力引导需求结构、优化供给结构、提升要素投入结构和完善产业组织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聚集发展战略、分工深化战略、改革开放支撑战略和消费引导战略，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强化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引领、渗透作用，使新型工业化与推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力争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超过50%，初步确立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到2030年基本实现向服务经济转型，全面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为此，一方面，把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主要城市群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集聚区。大城市、特大城市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具有强大完善综合服务功能的区域性、全国性经济中心；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为重点，加强各具特色的服务经济网络节点建设，有序推进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加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规范建设。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制度、无形资产评估质押制度、诚信激励约束制度、服务行业和服务产品的质量技术标准、网上交易规则、服务消费投诉索赔制度等。

1. 落实国家“十二五”服务业专项规划，探索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实施国家规划的新机制。落实“十二五”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加快现代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努力探索、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实施国家规划的新机制。政府作为规划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要着力于加强战略导向和宏观管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运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保证公共政策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更好地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2. 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大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对发展服务经济的战略、规划、政策和试点试验情况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对国家已制定的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总结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创新和改革试点的经验和存在问题,进一步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完善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调整水、电、地等要素供给政策,优先支持创新创业和中小服务企业发展等。

3. 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引导三次产业融合互动发展。坚持民生优先原则,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社会领域和事业单位改革,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引导非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以政府采购服务、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具有品牌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推进制造业精深加工化和企业主辅业务分离,引导、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内部服务机构分立转型为面向市场的服务企业。

4. 深化改革,为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有力的体制保证。加大服务业领域改革攻坚力度,深化服务业国有大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加快服务业领域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服务价格改革;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加快分类建立、完善各行业服务行为、规范和服务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5. 完善激励机制,健全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增加各级财政经费投入,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兴办和加强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培养所需人才的学科专业及实训基地。通过加强培训、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内外引进等途径,尽快改变高端人才、领军人才、复合型人才、战略型人才和骨干教师严重短缺的状况。完善人才市场运行机制,促进各类、各层次人才优化配置、有序流动。

6. 扩大开放,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和质量。在维护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逐步扩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稳妥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鼓励外资跨国公司进入服务业高端领域。除少数高安全风险的服务行业外,要适当放宽对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有效利用跨国公司带动我国现代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同时,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服务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投资并购境外服务企业、参与境外服务项目国际招标等方式“走出去”。

责任编辑:晨乔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黄群慧 贺俊

摘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完了奠定产业基础和建成工业大国两个历史阶段。未来在向工业强国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能够在满足自身特殊的要素禀赋约束条件下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且要面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未曾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服务化”等新的经济和技术挑战。这些新的条件将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比较优势基础、产业结构调整模式、产业升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等与工业化相关的基本要素，从而赋予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路径和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在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继续稳步推进，未来十到二十年有望基本实现工业化。

关键词：工业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 制造业服务业 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贺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道路时期，该阶段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时期，该阶段实现了中国基本经济国情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总量跃为世界第二（陈佳贵、黄群慧，2012）。未来，由于内部要素条件、外部国际竞争环境和外生的技术因素的变化，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新的挑战 and 制约。充分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服务化”等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趋势创造的机遇，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及未来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具有十几

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基本都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1978—20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高达9.89%，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美国、日本、韩国等在工业化快速增长时期也没有如此高的发展速度；这是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这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巨大，在一个时点上，会有分别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地区存在于一个国家内，这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

经历辉煌历程的中国工业化是否一定有光明的前景呢？工业化史表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虽然按照“收敛假说”，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实现“赶超”，但现实中一个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在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出现曲折吗？在未来的10—20年，我们能够一帆风顺地走过工业化后期阶段、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吗？

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大方面“变量”：一是在发展环境方面，是否会出现足以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别重大的环境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性的战争，大规模军事对抗、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短期内难以应对的重大经济危机，重大的技术和产业变革等等。虽然曾经有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发生在2008年今天仍在继续发酵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有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但这些事件并未构成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质性重大影响，从而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二是在经济发展本身方面，是否会由于工业化战略选择失误而出现无法解决的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内生变量”。当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社会或者“未富先老”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区域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矛盾，直接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否会出现曲折，决定中国能否在未来10—20年顺利实现工业化。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大性和艰巨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中国工业化成就已经十分巨大，已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我们还在“过大关”，如果此关不过，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不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排除出现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等“外生变量”的可能，在“内外夹击”下有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基于上述认识，对于未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言，一是有近些年出现的所谓“第

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这两个“外生变量”值得关注；二是中国推行的新型工业化战略这个“内生变量”对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的前景需要分析。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是未来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技术性因素。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能理解为由3D打印、计算机模拟等个别新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现和应用引起的整个工业系统的突变，实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已经发生突破但仍处于演进中的工业系统变革。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突破性表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多维、立体”的新生产制造技术体系及技术经济范式。这个体系的底层是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结、新材料等“通用技术”，中层是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制造技术和工具，高层是应用了前述新的通用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大规模生产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生产系统。这个体系的有效运行形成了全球化生产、个性化制造、社会化制造等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性表现在这场变革还处于“梯度、渐次”推进过程中。例如，高效能运算、虚拟设计与制造是近期跨国公司加速推进、应用的先进制造技术，3D打印技术的发展处于由传统日用消费品、医疗器械向汽车、航空等新领域快速渗透的阶段，而可重构生产系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工业国家为迎接全球制造和个性制造、为解决大规模定制系统无法很好解决的产品成本和产品多样性、产品性能之间冲突所做的战略性技术准备，目前仍然处于科学研究和概念设计的阶段。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形成冲击和挑战。（1）进一步弱化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Wadhwa, 2012）。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根据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劳动成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到2015年前后，将达到60%左右。未来5-10年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将快速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DP的9%，而中国占到18%。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比较成本劣势会逐渐减弱。（2）可能对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制造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

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美国竞争力委员会，2011），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3）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的机制，虽然一般可以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提高劳动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更根本、更有效、对要素市场扭曲最小的方式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一般劳动者素质不能够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会造成员工的失业或者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环节中，劳动者收入改善的相对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

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存在上述挑战和冲击，但中国还有相应的“机会窗口”和“时间窗口”。从机会看，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先进制造技术终归是在工厂和制造环节的应用，中国庞大的制造基础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场所。从时间看，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进制造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先进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往往涉及到大量基础的技术成熟度和成本经济性的制约，同时先进制造技术转换为现实的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设备因素，更涉及到企业管理系统、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配套完善，中国还有时间通过战略调整和持续的现场学习，来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应对。

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因此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信心。这种紧迫感并不是类似于2007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需要的那种“应激反应”的紧迫感，而是长期发展战略应对的紧迫感；而信心则来自于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及时正确的战略调整。因此，只要有危机意识和战略认识，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优势，调动企业技术突破和应用的积极性，促进现场的持续改善，中国完全有可能将“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化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新动力。

三、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制造业服务化”有两种不同维度的界定：一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将其分为“作为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和“作为制造业产出的服务化”，前者即产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工业设计、信息存储和处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法律、金融等服务性要素在

制造和价值创造中的投入增加，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后者是指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围绕实物产品的附加服务，而且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成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定义制造业服务化的另一个维度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场所”或交易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可以将其划分为“企业内部的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外部的制造业服务化”，前者表现为企业内部服务职能的强化，后者主要表现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正不断推进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涌现。制造业服务化完全体现了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等内涵要求。大力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将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产生如下影响：

1. 开辟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路径。过去有关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的学术争论和政策辩论常常围绕“工业比重是否太高、服务业比重是否太低”展开。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发展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非此即彼式问题的狭隘性。生产性服务是以“企业内部的服务职能”还是“以独立的服务市场”存在，主要取决于制造业自身的服务水平以及对专业性服务需求的市场容量的大小。例如，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南部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的独立的汽车设计企业，这些企业共同构成了专业的工业设计产业；而中国大量的以生产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中，这种独立的以产业形态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却非常滞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层次低，对专业服务的需求量小；同时由于发展水平低，从制造中分立出来的专业服务公司的数量就少，很难发展成为足够规模的服务“产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必然遵循一条从“内部服务化”向“外部服务化”转型的过程，而不能单纯从统计意义上的产业比重的角度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同时由于制造外包导致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情形不同，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

2. 促发了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制造业服务化将促进产业组织范式由企业间竞争和供应链间竞争向生态系统间的竞争转变。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制造技术将提高小型化、分散化经营的经济性。例如，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开放软件社区的发展将大大促进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极端分散组织方式

的发展。又如，云计算使得企业可以将信息处理功能更多地外包给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企业，加之数据挖掘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服务模式创新，即便是地理上远离提供信息服务企业的小微企业也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获得更强的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黄群慧、贺俊，2013）。产业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背后，是产业组织形式的生态化。制造业的“软化”和服务化，制造技术的融合，将使得企业之间的“需求——供应”关系变得越来越开放，企业的同一个产品或服务可能供应完全不同的行业、而不仅是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链相互交织，形成开放的、多维的、复杂的网络结构。虽然通常情况下平台企业掌握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但平台自身的竞争力常常是脆弱的，而且往往是多个企业共同支撑一个平台，或者同一个产品涉及到多个平台（例如数字制造同时涉及到超级运算和超级宽带等平台），因此很难识别决定产业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资源的“位置”在哪里。制造业服务化使得一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以及本国企业在全局创新生态中的“位置”成为获得产业长期竞争力的关键。

3. 对支撑中国工业化的产业政策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服务形式的要素投入和服务型产品多是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相比于过去的实物产品，工业设计、系统软件等技术和产品更容易被剽窃、复制和模仿，因此，为了鼓励服务型产品的创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变得更加重要，过去中国主要服从于有利于国内企业技术引进和学习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和机制就必须适时进行调整。二是与前述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相适应，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必须由过去“培育大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向“促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发展”转变，因为服务型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常常体现为高度多元化的、具有更强创新活力的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身上。三是由于制造业服务化多是伴随着商务模式创新的技术创新，而与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相比，商务模式创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以“扶持”为主的产业政策思路就要逐渐向“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为主的政策思路转变，因为“扶持”性产业政策更适用于已经明确了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条件下对企业投资的促进和激励，而以加强对企业的服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经营环境完善则更有利于产业生态的多样化的探索，有利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形成。

四、新型工业化战略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总体战略部署，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基本内容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相比，上述内涵的新型工

业化战略的推进，必须支付更多的包括技术、环境、劳动力甚至资本在内的成本，低成本工业化时代将不复存在，工业化的整体成本必将逐步提高，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放缓，那么，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根据我们构造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我们计算了1995到2010年全国以及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大西北、大西南、中部六省、东北地区七大区域和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动态地分析了“九五”至“十一五”这十五年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新型工业化战略能够使得中国区域工业化进程更加协调，驱动工业化进程的因素更加均衡，总体上工业化速度不会有大幅度下降，同时工业化质量会不断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会稳步推进，未来10到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陈佳贵、黄群慧等，2012）。

1. 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原来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总体上中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东中西各个区域梯度推进，在东部发展速度趋缓的情况下，支撑了总体发展速度，呈现出区域发展日趋协调。1995-2005年间，中国工业化速度最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工业化速度最慢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06年以后，随着新型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的区域工业化水平呈现逐步收敛、协调推进的态势。“十一五”期间，四大经济板块中工业化速度从高到低依次是：中部、东北、西部、东部，与“十五”相比，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加快，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速度明显放慢。在七大经济区域中，“十一五”工业化速度从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六省、大西南、东三省、大西北、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与“十五”及以前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

2. 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驱动工业化的因素更加均衡。根据我们的研究，1995-2000年，对全国工业化水平指数贡献最大的指标因素是产业产值比，其次为城市化率和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而人均GDP指标的贡献率为零，说明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按人均GDP衡量，全国仍处于工业化前期，同时农业比重的下降速度很快，从而产业结构变化成为这一阶段工业化的主要动力；2000-2005年，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成为对工业化水平指数提升贡献最大的指标因素，人均GDP指标的贡献率上升很快，产业产值比的重要性下降到第三位，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加快。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人均GDP成为对工业化水平指数提升贡献最大的指标因素，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较快，效率性指标和结构性指标相对于规模性指标对提升工业化水平的贡献提高，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更为均衡，表明中国工业化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 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计算结果看，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未来10到20年可以实现工业化。我们计算结果表明，1995年中国处于工业化

初期的前半阶段，经过“九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十五”时期，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继续提高，到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2006年实施的新型工业化战略，保证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前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过“十一五”时期，到2010年，中国工业化处于但即将走完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水平。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按照“十一五”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推算，如果能够保持“十一五”的工业化速度，经过“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在2020年前后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有望达到100，即基本实现工业化，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相吻合。即使未来中国工业化速度比“十一五”时期下降一半，也将在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工业化。这表明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将继续稳步推进，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

参考文献：

1. American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2011, “Make”, A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Movement, <http://www.compete.org/publications/detail/2064/make/>.
2. Wadhwa, Vivek, 2012, Why it's China's turn to worry about manufacturing. Washington Post.
3. 陈佳贵、黄群慧，2012，《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陈佳贵、黄群慧等，2012，《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黄群慧、贺俊，2013，《“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调整》，《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小企业融资：国际比较、经验借鉴 及我国对策

景春梅

摘要：从中小企业融资情况的国际比较看，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面临更严峻的融资约束，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近年来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融资难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借鉴相关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按照新划型标准改进统计口径；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扩大小企业直接融资；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构建与融资相适应的征信体系和风险评估机制；扩大银行为小微企业服务的财税政策；控制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

关键词： 小企业融资 国际经验 金融政策

作者简介： 景春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融资难是世界各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这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具有积极参考价值。

一、中小企业融资国际比较

1. 从贷款的可得性看，低收入国家的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显著低于中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对129个国家的企业调查结果（见表1）显示，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面临更严峻的融资约束，低收入国家尤为显著。在中低收入国家，分别只有31.8%和16.7%的小型企业可获得贷款或授信，而在高收入国家，该比例达到47.8%。中型和大型企业获得贷款情况要明显好于小型企业，但获得贷款的企业比例在不同收

入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比较来看，在低收入国家，各类企业获得贷款的比例相差较大，小型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不到中型企业的一半，几乎只有大型企业的三分之一。而在中等和高收入国家，这种差距相对较小。从国别比较看，在新兴市场国家，巴西、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比例较高，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

表1 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比例 (%)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低收入国家	16.70	35.70	47.80
中收入国家	31.80	45.60	59.30
高收入国家	47.70	62.20	68.90
巴西	42.79	67.50	89.57
墨西哥	11.66	7.57	22.51
印度尼西亚	16.50	27.63	47.12
俄罗斯	17.20	25.27	64.24
南非	22.91	35.00	40.45
马来西亚	57.21	64.42	57.89

数据来源：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2006 - 2009)。

另据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IFC) 2010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09年底，新兴经济体正式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融资的比例为45%—55%，如果加上未注册登记的小型、微型企业，这一比例仅为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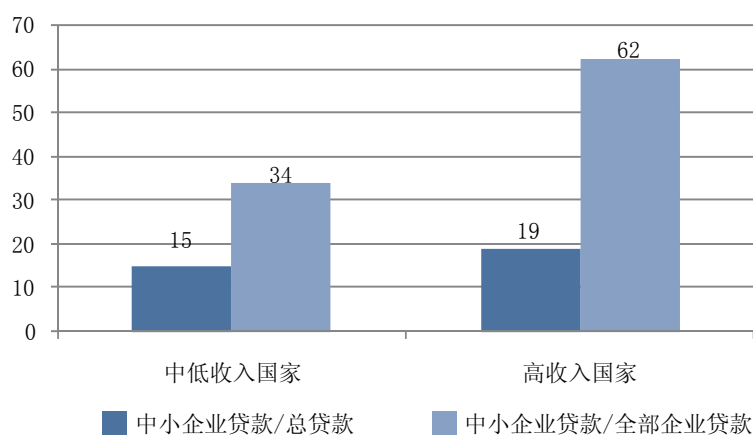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收入国家中小企业贷款占总贷款和企业贷款的比重

数据来源：World Bank Group / CGAP Financial Access 2010 Survey.

2. 从融资结构看，中低收入国家中小企业贷款占总贷款和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普遍较低，面临较多融资约束。世界银行2010年对全球142个国家的融资可得性的调查统计显示，从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看，高收入国家为19%，而中低收入国家为15%（见图1）；从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看，中低收入国

家为34%，而高收入国家高达62%。这表明，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银行贷款更多地发放给了大企业，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较难。

3. 从贷款占比看，内源融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中占比较高。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占比多在50%以上，部分国家甚至超过80%，内源融资成为各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贷款等债权融资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来源，但股权融资发展总体不足。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统计，在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14%可获得银行融资的支持，而大型企业该比例则高达25%。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股权融资比例较低。

二、中小企业融资国际经验

国际上已经形成多种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归纳起来有三类：一是股权融资渠道，包括业主投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者投资、发行股票等。二是债权融资渠道，包括私人借款、商业银行贷款、财务公司贷款、典当贷款、贸易贷款、发行债券等。三是其他融资渠道，包括中小投资机构、融资租赁、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等。由于自身局限，中小企业单靠本身的努力无法解决融资难题，所以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各种金融支持政策手段，力求建立多种渠道，为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便利。各国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支持政策和基本经验主要有：

1. 完善法律法规，创造良好融资环境。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时，各国都奉行立法先行，从法律上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给予支持。一些国家的中小企业基本法都对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做了专门规定，如美国《小企业法》（1953年），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和韩国《中小企业基本法》（1966）等。一些国家还制定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专门法，如美国颁布了《机会均等法》、《公平信贷机会法》，确保中小企业获得非歧视的贷款权力；日本则颁布了《中小企业信贷保护法》、《中小企业公库法》，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

2. 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一些国家（地区）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有的还向商业银行提供担保、利息补贴等，为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设有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德国设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德国复兴开发银行和德国平衡银行），州政策性银行；韩国设有中小企业银行等。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70年代设立了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台北国际商业银行、新竹国际商业银行、台中商业银行、台南中小企业银行、高雄中小企业银行、台东中小企业银

行等7家中小企业专业银行。台湾当局从法律上确立了这些中小企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并要求其“对中型企业放款不得低于放款总额30%，对小型企业放款不得低于40%”，即向中小企业贷款总的比率不低于70%。

3. 建立信用担保体系。由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较大，可抵押资产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世界各国（地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通行做法，在发达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BA）对小企业资金支持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供信用担保。凡申请担保并获批准的小企业，在逾期不能归还商业银行贷款时，管理局保证支付不低于90%的未偿部分（担保总额不超过75万美元，担保部分不超过贷款的90%）。日本采用了地方担保和政府再担保的两级信用担保体系，即地方信用担保协会对企业承保后，再由政府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对担保协会进行再担保，极大地增强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能力，目前日本约有50%的中小企业使用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也设立了由当局主导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简称“信保基金”），建立起风险共担的银保合作机制。当局不对贷款实行全额担保，银行机构需承担20%的风险损失，促使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测和评估，提高了担保贷款的安全性。同时，银行从信保基金每年获得的理赔金额高达捐助金额的4—5倍，且只需承担部分风险，因此参与积极性非常高。由于金融机构、信保基金、中小企业三方很好地实现了互利共赢，使得台湾信保基金成为世界上运作最为成功的信用担保制度之一。

4. 完善风险投资体系。高风险、且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更需要资本性的资金投入，即风险投资或创业资本，而非一般性的银行贷款。因此，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各国政府都鼓励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业务。由政府出资设立风险（创业）投资机构和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支持企业创新、创业，是各国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快速成长的普遍做法，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在硅谷设立了大量风险投资基金，并成立了硅谷银行，对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给予强力支持。但从国际经验看，政府资金的使用应以间接方式为好，即政府不宜直接办理对创新企业、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各项补贴，而是委托直接参与市场运作的政策性机构操作补助计划更为妥贴。

5. 提供到资本市场融资机会。大多发达国家均有针对中小企业上市的资本市场。美国资本市场包含八个层次，即全国性证交所、地方证交所、第三市场（上市股票的场外市场）、第四市场（大机构和投资家之间直接交易的市场）、纳斯达克全国市场、纳斯达克小型市场、小额股票挂牌市场和粉红单市场，其中后三个层次的市场专门为中小企业资本交易提供服务，入市标准逐级降低。美国最具成长性的企业中有90%以上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围绕发展软件产业创建了多

种风险投资基金，并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直接推动了印度软件业的腾飞。

6. 给予财税政策支持。财税政策支持是政府对中小企业最直接的资金援助方式，有利于中小企业资金的积累和成长。各国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等。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税收优惠包括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税收起征点、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等。政府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方式有贷款担保、贷款贴息、政府直接的优惠贷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小企业税收减免的力度很大，例如在我国香港特区近30万家公司中，约70%的中小企业无需缴纳所得税。还有很多国家将税收和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德国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对周转额不超过2.5万德国马克的小企业免征周转税；对在德国东部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总投资额15%—23%的财政补贴；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提供利息补贴，幅度一般为2%—3%，有效地支持了中小企业融资。

7. 赋予中小企业发展管理机构融资支持职能。健全的政府管理机构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少国家都设置了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并特别赋予其融资支持职能，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小企业发展，尤其是帮助解决小企业资金不足问题。SBA经国会批准，可直接以贷款、协调贷款、担保贷款、指定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或通过对小企业投资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多种形式给予小企业资金支持。此外，SBA职责中还明确规定，SBA要确保小企业在政府采购合同和国有财产转让中获得合理的比例。

三、我国近年小微企业融资扶持政策及其效果评价

2002年我国颁布《中小企业促进法》后，又相继出台了多项小企业金融扶持政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加大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力度。201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九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2012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意见（国发14号文）；同时，各部委相继推出“新36条”的42个实施细则，央行也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近几年的政策效果评述如下：

1. 加大银行信贷支持，“两个不低于”目标基本实现。银监会2010年提出“两个不低于”目标，即对于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10.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9.6%。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8%，比全部贷款平均增速高1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量高2,093亿元。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小企业贷款余额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之和）15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

的27.3%。

2. 改进和创新金融服务，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质量提高。目前专营机构的组织框架已基本成型，可以独立、专业地开展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截至2010年末，已有109家商业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专营机构，许多银行还推出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产品。

3. 完善金融企业组织结构，小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一是鼓励中小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县域、大的集镇设立分支机构。二是稳妥有序推动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机构覆盖率。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小贷公司数量和贷款余额与2010年相比几乎均实现翻番。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金融服务覆盖面明显扩大。

4. 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融资担保能力增强。通过对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给予业务补助、保费补助、营业税减免，极大地激励了其向中小企业提供低费率担保业务的积极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数量、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融资担保能力有所提高。

5.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债券融资获得发展。先后设立中小板、创业板和建立中关村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制度（即“新三板”）。积极探索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截止2010年底，中小企业通过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累计募集资金64.77亿元，2011年累计筹资已超过100亿元。

6. 加强金融服务配套体系建设，融资环境有所改善。设立征信服务平台，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进行政管理，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建立银、政、企沟通合作平台等，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我国当前小微企业融资仍然存在的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微企业面临经营成本升高、订单减少和资金链紧张等问题，直接导致资金困难。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振兴实体经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纾困，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由于一些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大多数小微企业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融资支持。当前小微企业融资仍然存在的问题有：

1. 统计口径不一，融资真实状况容易误判。我国中小企业统计口径不一致，银行按贷款规模分，统计局按经营规模分。虽然国家在2011年公布了新的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银行的基层依然是按照单笔贷款规模500万元（有的为1000万元）以下作为划分小企业贷款的标准，不能真实反映小企业融资状况。比如，大中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可能会出现500万元单笔贷款的情况，或者将数额较大的贷款拆分成若干笔500万元的小额贷款，这样就会出现将大企业贷款误判为小企业贷款，从而掩盖小企业真实融资状况。

2. 银行信贷覆盖面仍然较小。由于银行信贷对企业规模、技术力量、信用等级等有严格要求，加上小微企业在经营方式以及财务制度方面自身存在缺陷，能获得的银行贷款非常有限。以我国第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2011年公司贷款总额占全国银行公司贷款总额的12%，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数量只占全国小微企业总量的不足1%。这从一个重要角度反映我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依然较小。另据浙江工业大学跟踪调查，2012年2月末浙江小微企业期末借款余额为2271.5亿元，累计同比增长7.86%，但增幅仍低于中型企业（13%），更远远低于规上大企业（44.7%），3月份新增借款余额39亿，增幅回落至-14.7%，与中型和大型企业相比增幅更低。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仍然突出。

3. 融资来源多靠民间金融。据中信证券的一项研究，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大约相当于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至20%。全国中小企业超过三分之一的融资来源于民间金融，其中小微企业的比重更大。

4. 直接融资机会很少。我国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如凤毛麟角，目前在主板市场上市的企业有1000多家，大都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近1000家公司的情况总体呈现“大多、中少、小无”现状。

5. 融资成本高问题仍旧突出。调查显示，目前小微企业银行贷款利率均需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20%，此外还要承担2%—5%的担保费。加上评估费、账户管理费，甚至有的预先扣留利息，小微企业贷款总成本要高于正常贷款成本40%—50%。而通过民间借贷实际支付的利率则更高。

6. 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仍然不足。金融机构不愿到县乡一级、中西部地区开设物理网点。近年新推出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整体支持作用还未完全发挥，为社区内小微企业提供专门服务的金融机构还比较缺乏。

7. 融资担保体系不完善。我国担保机构在小微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一是融资担保公司均为商业化运作，缺乏政府主导，呈现“小、散、乱”的局面，甚至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二是银行合作门槛过高，难以建立平等的银保合作和风险共担机制；三是除再担保外，担保公司需承担100%坏账风险，导致许多担保公司运营困

难；四是担保费率高，小企业负担重。

五、加大我国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的具体情况，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 严格按照新的划型标准改进统计口径，摸清小微企业融资真实状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2011年，银行企业贷款统计中的小企业贷款比重已经占到27.3%，比前几年大幅度提高，数据显示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明显改观。而基层则反映小企业融资状况实际比过去更难，大量小企业只能通过地下金融机构去借高利贷。金融管理部门宏观数据与小企业普遍感受形成巨大反差，究其原因，是银行小企业贷款实际口径与统计局的小企业统计口径不协调。这种状况应当进一步摸清并加以改进。金融管理部门要切实执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推动监督各类银行机构严格按新标准统计各类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贷款情况，摸清小企业融资数量，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2. 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间接融资进行定向扶持。我国目前还没有独立的中小企业金融管理部门，也没有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近年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开始探索专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比如浙江的泰隆银行、台州银行、稠州银行等，而浦发、民生等股份制银行则在湖南尝试设立了专营小微企业的专业银行。但对于小微企业庞大的金融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还需要进一步鼓励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建议成立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中小企业银行，制定相应的贷款监督机制、税收优惠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对小微企业融资进行定向扶持。

3. 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合理流动。利用民间资本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要在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投资设立小型金融机构，主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与现有各类金融机构相互补充，培育形成商业性、合作性和政策性相结合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我国现有近3000个县级区域和4万多个乡镇区域，建议“十二五”期间全国平均每个县域发展3—4家，或者平均4个乡镇区域发展1家小金融机构。这样，“十二五”可发展1万家，“十三五”再发展1万家，到2020年，我国将有2万家小金融机构，平均每个县域7家，小企业融资难将得到根本解决，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无限活力将得到更大释放。

4. 扩大小企业直接融资，推动小企业集合债发行，加快三板市场发展。一是扩大小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在近年小企业集合债发行已有的进展基础之上，加大对经营效

益好、偿债能力强的小企业直接或集合发行企业债券的支持力度。二是扩大小企业股票融资渠道，尽快修改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公司上市标准要求，使其与新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相衔接，主要是适当降低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要求，并根据行业不同，明确提出公司从业人员数量要求。同时，大力发展三板市场和企业产权地方柜台交易，使其在上市企业数量上，逐步达到和超过中小企业和创业板的数量，以支持更多的优质小型企业上市。

5.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立银保合作长效机制。建议重新整合现有政策性担保机构，选择部分经济较发达、民间资本相对充裕、信用担保机构中政府出资较多的省市进行试点，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及其分支机构。基金构成以各级政府出资为主，各级政府应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鼓励金融机构、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构建政府资金为主体、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鼓励银行参与发起或参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担保机构合理确定风险分摊比例，建立银保合作、风险共担的长效运行机制。

6. 构建与融资相适应的征信体系和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能力。完善中小企业的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中小企业财务报表的审计制度，充分保证投资者权益。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征信系统，对守信用的企业给予鼓励、对不守信用的企业给予严厉惩罚。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促使小微企业内部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经营机制和财务制度，提高自身融资能力。

7. 扩大银行为小微企业服务的财税政策，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效率和水平。允许金融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重组和减免。对中小企业贷款借款人发生财务困难、无力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在确保重组和减免后能如期偿还剩余债务的条件下，允许金融机构对债务进行展期或延期、减免表外利息后，进一步减免本金和表内利息。放宽中小企业呆账核销条件，完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处置政策。

8. 控制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引导其扩大对当地小微企业服务。近年来，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现象比较普遍，这不但与成立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初衷相背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驻区域的金融市场秩序。鉴于小微企业对小型金融机构的迫切需求，建议限制地方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引导其立足当地，服务小微企业。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全球化人物 ·

从全球化视角谈中国崛起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

本刊记者 牛铁航

记者：中国在全球范围崛起时能否趋利避害，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学习它们的经验，同时避免它们的失误？

蒙代尔：正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建立某种福利制度，因为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会失去谋生的手段，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储蓄，社会总要出手照顾。但重要的是，此种福利一定不能超过一个基本的水平。从长远角度看，让人们完全依赖他人或政府将犯下大错。我想，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福利水平千万不能发展到欧洲国家那样，特别是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欧洲的问题恰恰出自那些濒临破产的国家，它们的政府为维持高福利试图通过大力举债来解救自己，其举债水平之高甚至大大超过其支付能力。而老百姓喜欢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一些政党又推波助澜，从而尝到债台高筑的苦果，最终导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欧洲所发生的债务危机。我认为，欧债危机向人们表明，欧洲的社会民主体制已经失败。

中国对此要千万小心，因为中国正向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发展，比如在医疗领域，中国需要改进它的医保体制，但一定不要学美国。在美国，医疗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达到了惊人的2万亿美元之巨！美国医疗体制的重点放在治病、手术和药物上面；中国以往的经验却是用中医，将重点放到健康与预防上。一个人，如果生活好了，身体健康，吃的合适又不过量，他就一定不会像美国人一样容易发胖；如果有了健康，也就不会用尽所谓的“奥巴马医保”（Obamacare），目前美国的医疗占GDP的17%，它会直冲到20%的惊人高度。加拿大只占GDP的10%左右，其体制虽然不能说十全十美，起码可以说达到了包罗万象的程度。而美国的医疗体制虽然在技术上相当先进，但实际上出现许多问题，如排队等待手术的时间过长、长期求大于供等现象，致使美国的医疗体制与加拿大和中国的医疗体制差别很大。中国应当继续发扬光大预防为主的重要价值观。我想说，中医中药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但一定是一条可取的思路。

记者：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得到飞速发展，您怎么看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有无制约发展的瓶颈？

蒙代尔：回顾邓小平曾在上世纪80年代设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用20年的时间增长4倍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保持年均增长7.2%的水平。当时人们曾嘲笑过此目标，并认为难以完成，但是事实上中国只用了16年，上述目标即已提前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一度超过8%，甚至9%以上，中国的经济由此起飞，中国的新技术也得到了加速发展。科技的加速发展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引进的大量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国人聪明智慧，他们有效地吸收消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毫无疑问，这一进步还将持续下去。

至于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我想当然地认为，在某些领域里缺乏专业劳动力应是一个瓶颈，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你们有资源和能力去培训这些人才。你们需要改进教育体制。城市人口中，有2亿工人需要接受培训，以使他们的技能提升到更高的制造水平上。因此，培训是发展教育、保证学习和使其掌握生产工具的重要过程。

150年前，既无火车又无汽车，每个人不得不学会骑马，而如今每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开车。今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学会用互联网和计算机。教育因此而向专业化发展。中国的教育需要采用远程教育的方式，将教育延伸到更多的学校和更远的地方。在边远的地方，在农村，没有高质量的教师，或许他们不愿意去边远地区，那你们就必须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以改进，比如在每间教室或者至少在一半的教室里安装视频设备，这样一堂40—50分钟的课程，学生就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或通过音频讨论学习内容。

教师的任务不再是教授基本知识，而是要与学生一道讨论，并实际应用。中国有多少所学校？几十万所不止吧。可是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校生起码要有2至3亿人，要确保这2至3亿学生每人都有教室可以上课，可以学数学、英语或法语、中文，如有视频设备，至少在一堂40分钟的课上时间里，有20分钟学生可以看到视频，其他时间留给老师，这对教师是很大的帮助，而且视频教育是帮助教师而不是代替教师，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而且教师也可以从中学到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中国需要在农村开展针对穷人的教育，要确保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确保他们为工业化发展配备好必要的技能。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软实力。任何一个国家，当其工业化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顶峰时，服务业将取而代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发展的，比如英国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很小，而服务业则很大。美国的制造业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但一降再降，到目前只有12%。中国也不例外，一定会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服务业也越来越壮大。但目前看，制造业还是中国所需的，因为它结合了技术、资本与机器，形成了产出。

记者：还有哪些瓶颈制约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蒙代尔：我想金融业也是另一个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因而制约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比如中国资本市场中的股票，与国际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就完全不能对等交换。在金融体系中，信息极为重要，但中国的信息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资信评级方面，中国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在西方，评级机构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次贷危机时曾犯过大错，但象穆迪和标准普尔这样的评级机构能够随时提供世界上15万至20万家公司的海量档案，你可以在其中找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信息。中国理应拥有一个自

己的良好的评级体系，一个信息接近自由的信息系统。

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在某些要素里出现稀缺。这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比如，在一些城市中的土地将日益缺少。土地这个要素成为制约经济的稀缺要素，结果是土地价格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城市的中央地带扶摇直上。然而，北京这个城市不同，它很幸运，因为它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下去，将周围地区直至沙漠囊括其间。它不停地盖房子，建巨型歌剧院，甚至一直将天津连接起来。

中国还缺水。南水北调不能以牺牲南方为代价，中国要治水，不仅随着城市的发展要满足城市的供水，而且同时不能降低大量的农业用水，灌溉用水。

互联网信息的开放度，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首先信息难以说关就关。在这个信息世界，人们有太多的途径获取信息，这对于工业发展是祸是福，我现在还不知道，有点像金融领域里常提到的“货币的可兑换”问题，没有它将制约经济发展，有了它会后患无穷。信息少了会压抑人民的自由，假设中国没有信息的自由，经济增长便被抑制，第一声创新之音将被泯灭，中国人民天生的智慧和求知若渴以及想有全球一流的大学、想拿诺贝尔奖的决心将受到压抑。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控制多少为好。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特别是政治问题，建立在成本效益基础上的决策机制应有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

记者：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产生了新一代领导人，他们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您如何从世界角度看今后的中国？

蒙代尔：当今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是世界级的强国。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需要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如何处理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一的美国的的关系。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旦一国要崛起，问题即随之而来，不是扩张太快、过分强大，就是威胁到已存的国际强权格局。例如法国大革命使法国变得过分强大，导致全欧洲都在制止拿破仑的脚步。德国步法国后尘，想执世界牛耳，结果带来两次世界大战。所以，过去的历史表明，一国崛起，又想改变权力格局的话，往往会引发世界大战。中国预先看到这一点，不愿意跟随拿破仑，也不愿意学德国（德国从1870年开始成功，直到1914年，但战争毁灭了它。虽然现在它又浴火重生，但不再是军事大国）。所以，大国有时虽然手握强权，但需要克制自己，不能诉诸武力。美国拥有庞大的武力，时不时还要对别国实施武力，这样不行。世界如此之小，一定不能动武。战后60年里，美苏争霸，好在虽各自手中握有原子弹，但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只发生了数次危机，如1964年的猪湾导弹危机等，这实属不易。各国都要克制，世界要找到制约各国动武的方式。中国经济上富裕不应导致战争，因为战争的成本巨大，而且在与日俱增。对于各国领导人，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这一点极为重要。

记者：您时常被人称为“欧元之父”，您认为，中国的人民币能成为国际货币吗？中国的经济如何站在世界舞台上？

蒙代尔：之所以称我为“欧元之父”，是因为我在1969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最优货币区和欧洲货币，当时还给欧洲单一货币起了一个名字，叫“欧罗巴”。30年后，欧洲真正统一了货币，同时我也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本人从来不自认为我是什么

“欧元之父”。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之父”，我的这个称谓不必经常挂齿。我是专门研究货币史的。历史上，一国货币走上世界货币之路十分漫长。英国1694年即创立中央银行，但百年之后英镑才真正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货币。之后又过了一百年，美国地位开始上升，可英国虽然已经不是最大经济体，但它的经济体系仍是最先进最成熟的。到了1870年美国赶超了，尽管如此，英国金融业的成熟程度依然优于美国。直到1914年，美国才真正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领袖，但是不是领袖的标志是它的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当上海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资本市场时，将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了日本的经济。下一步上海还要同美国的资本市场比拼，方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在这场拳击角斗中，中国的一只拳头是在身后，只能用另一只拳头打，因为中国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就像失去了一只手，而美元、日元任何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自由买卖和自由兑换。当然中国也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在香港。香港是世界级的成熟的资本市场，人们有理由想象，如果上海有朝一日取代香港，成为最大的资本市场，同时利用港币的可兑换性，能否为中国双拳出击作准备呢？中国的人民币也好，金融改革、金融深化也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可以真正在世界舞台上用双拳出击的方式同美国较量。目前人民币同美元接近钉住，类似固定汇率，这对中国有利。在此基础上逐渐放开管制，让人们可以在小额和经常性账户下自由兑换，资本项下继续进行管制，再一步步放开，最后就可以达到完全可兑换了。这其中，如何管理是件大事。

还有一个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税收。中国对私有经济的税收过高，又要同国有经济竞争；同私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有来自国家补贴的资本金，难得有几家破产。其实私有经济可以同时带来资金、技术和市场，能够实现双赢，何乐而不为呢？对待中国的合资伙伴也有限制过度的地方，不利于取得信息，如中国需要开发自主的评级体系，首先应该寻找国际合作者。中国要站立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步不是向美国学习，而是应先向自己学习，向台湾学习。果真如此，中国不仅可以大大深化两岸的开放度，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两岸的统一。还有香港，也是如此。当然台湾的人口比香港大的多，因而效果更明显。

还有一个韩国有许多可学之处，比如它是如何在电子业实现赶超的。中国本身有好的学习经验，比如现在中国生产的电视，比五年前、十年前要强多了，包括电视节目，虽然香港的电视节目多于大陆，但大有大的好处，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重点经营小的地区难以承担的主要节目并向众多人口传播，这就是经济学里的“乘数效应”。我也看彭博社、CNN、今日俄国、BBC等国际电视节目，我想中国在电视领域会给全球一个惊奇！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和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相比，其力量大过不止十倍，它的影响力在深度和广度上同时大大超越其他任何国家。人口数目越大，科学发展就越有力量。中国已经具备成为世界领袖的巨大潜力，还需要加上三件法宝：一是自由的信息；二是私人企业；三是电视节目。

责任编辑：李文政

· 智库言论 ·

美国的财政挑战与财政蠢举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劳拉·泰森

美国经济2013年将何去何处？随着经济逆风消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加快增长的前景似乎相当乐观。但也存在这样一个重大风险：大规模且无必要的财政紧缩可能会削弱需求、打击信心并使经济重陷衰退。美国经济政策正受到困惑、恐惧、意识形态和选举利益的困扰。

首先是困惑。美国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财政挑战：一是有可能危及美国2013年经济的增税和开支削减；二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赤字，这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更少的投资和一旦经济恢复增长及产出缺口消失就会减速的增长。

和财政悬崖不同，结构性赤字问题并非迫在眉睫。尽管美国联邦债务预计将不能长期持续的速度上升，正确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现在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而是随着经济复苏逐渐稳定债务对GDP的比率的可行计划。事实上，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表示，防止2013年出现严重的财政紧缩，将会推动经济增长、减少短期赤字并帮助解决长期的债务问题。

其次是恐惧。美国政府目前可以以史上最低利率借款。由于金融危机，国内外更多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增加了对美国国债

的需求。但如果这些投资者对美国解决其长期债务问题的能力或意愿失去信心，并开始担心出现违约（无论是直接表示还是通过快速通胀），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结果可能会是那些跟踪债券市场的人发动投机性的攻击，这会引发利率飙升，美元大幅贬值，或两种情况一起出现。

三年来，对这种迫在眉睫危机的再三警告在证据面前都站不住脚：美国国债市场仍为全球投资者的避险资产，包括对风险极为敏感的国外央行。当然，国会若无法提高2013年的债务上限，可能导致投资者的恐慌并增加债券市场受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只要国会不犯下这种十足的蠢举，而美联储又保持短期低利率，长期利率就不大可能显著上升——美联储已承诺这么做直到失业率降到6.5%。因此，国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制定一个明智的长期计划，以稳定债务水平同时不危及经济复苏。

第三是意识形态。一些国会议员不愿意投票支持任何增税，即使增税只是用来避免财政悬崖或稳定债务折衷方案的一部分。超过90%的众议院共和党人签了一份“不增税承诺”。其他成员则拥护较小规模政府，并支持原定于2013年生效的大幅度削减支出，即使这会引发经济衰退。对这些国会议员来说，忠于意识形态比经济逻辑更重要。最后还有选举利益。美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容易，但随着2013年的到来，事情或许有所改观。

摘编自《联合早报网》2013年1月14日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

在欧元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的阴影下，人们很容易会忽略全球经济的长期问题。但当我们着眼于解决燃眉之急时，这些长期问题却会继续恶化，不重视它们可能会让我们自食其果。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球变暖。尽管全球经济的差劲表现导致碳排放增速的相应放缓，但这也仅仅是短暂的缓解。要达到把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目标，意味着将来要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考虑到当前经济放缓，有人建议我们应该暂时搁置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但恰恰相反，改造全球经济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有助于恢复总需求和增长。

与此同时，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步伐，迫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快速实现结构性变革。变革会带来一些冲击，而市场通常无法很好地做出反应。

就像大萧条的其中一部分成因源于把经济从乡村小农经济向城市制造业经济转型的困难一样，引发当前经济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需要。我们必须创建新的企业，而相对于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尤其是中小企业），现代金融市场却更善于投机和剥削。此外，做这样的转变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个人通常难以负担相关支出。人们想获得的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而政府在这两个领域自然地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因为市场在这些领域中的固有

缺陷和出于对社会公平的考虑。

美国机会平等已成神话。如果不增加国内储蓄，并对全球货币安排实施更加根本性的改革，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就不会消失。然而，前者会加剧美国经济的放缓，而且这两种变革似乎都遥遥无期。中国正提高消费，但却不一定会购买更多来自美国的商品。事实上，中国更有可能增加对非贸易商品的消费——比如医疗和教育——这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的干扰，尤其会影响过去一直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商提供原料的国家。

最后，还有一个贫富差距上的全球性危机。问题不仅是高收入群在经济大饼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而中等收入群却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贫穷的现象在许多国家也日益严重。在美国，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当我们在处理今天的危机时，我们应当反省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会加剧长期问题。由赤字鹰派与倡导经济紧缩者所提出的方案，既会削弱目前的经济，也会破坏经济前景。反讽的是，今天全球经济疲弱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却还有另一个选择：投资于我们的未来，而投资的方式是能够协助我们同时解决全球暖化、全球收入差距与贫困，以及必须进行的结构性改革。

摘编自《联合早报网》2013年1月11日

安倍的货币政策幻觉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前董事长
斯蒂芬·罗奇

斯蒂芬·罗奇在题为“安倍晋三的货币政策幻觉”文章中指出，安倍还未正式获得首相任命就已发出干预日本央行独立性的强烈威胁信号，他声称，缩手缩脚的日本银行应该向其更积极的同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学习。安倍相信，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通过采取非常规和积极的量化宽松措施扭转了危局，而现在日本银行如法炮制的时候了。

但这种政策能起作用吗？尽管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实验性的货币政策被当作标准的操作流程进得到大范围推广，但其有效性依然值得怀疑。世界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触底后的近4年里，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明显不对称。大量流动性的注入的确在解冻信贷市场上取得成效并阻止了危机深度恶化——这在美联储2009-2010年度首轮量化宽松政策中得到了证明——然而随后的措施都未能催生任何常见的周期性复苏。

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由于私营及公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破坏，政策利率又几近为零，后泡沫经济已经陷入了典型的“流动性陷阱”。相对于进一步举债或刺激总需求，人们更加关心如何偿还危机之前积累的巨额债务。美国消费者的悲剧正是这种政策后果的典型例子，而欧洲央行也没有理由为其量化宽松政策的作为而感到满意，欧洲已经在4年中第二次回落到衰退状态。

不仅量化宽松政策重启那些饱受危机折磨且资产负债表受制的经济体的能力有限；它还冒着模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区别的重大风险。那些购买由财政当局发行的主权债务的央行逃脱了市场对借贷成本施加的约束，实际上资助了公共部门的挥霍行为。

不幸地是，日本似乎忘了自身所经历的许多教训——尤其是日本央行在2000年代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沮丧经历。但它同时也忘记了1990年代——也是第一个所谓“失落的10年”——再此期间当局尽其所能延长资不抵债的银行和许多非金融公司的寿命。这些行尸走肉般的公司靠着人为力量勉强继续运行，它们都抱着一种虚幻的希望——时间能够拯救一切。直到这个10年的末期，当银行开始重组而且企业也被鼓励重组时，日本才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和结构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进步。

这就是安倍想为日本寻求的“解决方案”吗？此时日本经济最不需要的就是结构改革的倒退。然而通过迫使日本央行追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错误步伐，这正是安倍和日本所面临的风险。

由世界主要的央行——即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贯彻的大规模流动性注入既不能在各自的实体经济里促进交易，也不能促进资产负债表修复和结构性变革。这就让大量多余的流动资金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流动。不管这些资金流到何处，下一个危机也无可避免地注定随之而来。

摘编自《世界报业辛迪加网》2012年12月28日

美国战略重心再度转向欧洲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月15日发表了斯蒂芬斯题为《美国战略重心再度转向欧洲》的评论，要点如下：

在美国人“移情别恋”数年之后，欧洲人总算等来了值得欢呼的消息。以前，小布什总统的“分而治之”政策（想想新老欧洲之说），被奥巴马“把美国重塑为太平洋大国”的政策所取代。奥巴马提出美国把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令美国的老盟友欧洲抽泣，“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好了，欧洲在美国白宫又将找到强大的朋友了。

对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奥巴马提名的人选分别是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欧洲人应该非常乐于与这两位政治人物打交道，大西洋主义融入了他们那一代人血液之中。他们的世界观都打上了“联盟对于打赢冷战非常重要”的烙印。

他们是北约和欧盟的坚定支持者。哈格尔曾任智库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主席，该理事会是一家设在华盛顿、致力于维持欧美关系的智囊机构。他们也都是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的有力支持者。

作为荣获过战争奖章的老兵，克里和哈格尔都是“先谈判，迫不得已才开枪”外交政策思路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联

盟关系能够使美国实力倍增，而不是形成制约。他们绝非立场软弱。相反，他们明白，即便超级大国也要在决定开战之前认真思考战争将如何收场。对于这样的常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向我们提供了暴力血腥、代价昂贵的证据。

一些共和党同僚批评哈格尔在伊朗问题上过于软弱。共和党新保守派誓言将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期间展开有力抨击。这些新保守派进一步批评哈格尔反以色列。据说克里非常希望重启会谈。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内塔尼亚胡继续掌权的话。

欧洲人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所谓的欧盟与伊朗的3+3谈判可以成为美国和伊朗双边谈判的保护伞。欧盟可以同意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敦促其参与到真正的谈判中来。欧洲各国政府也有能力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层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让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美国战略中心转向欧洲，这其中蕴藏着更大的机遇。欧洲人可以借此机会，打破关于欧元危机令人窒息的自怨自艾，并重新设想他们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从阿富汗撤军为重新推动北约保持其作为全球最强大军事同盟的地位提供了空间。欧洲为何不能与美国一道将重心转向亚洲呢？

美国政府的走马换将给欧洲带来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摘编自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月15日

中国必须直面失业的挑战

Altura Partner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Simon Commander

资深经济学家 王研

五年以来，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危机带来了大量的失业。尽管发达国家人们的工作和收入受到不确定性的威胁，但并无一人预言这些国家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时期的那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动荡。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那时人们失业之后不得不依赖投亲靠友，家庭支持，或靠救济存活。现在，一套失业保险和社会资助体系为失业人群提供一定收入，在最好的情况下，支持他们直到找到新的工作。

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经受了严重的危机，但中国经济也经历了相当痛苦的减速。2008年底，外需不足导致沿海地区许多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失掉工作或不得不削减工作时间，几近3000万农民工失掉工作不得不回到家乡或投亲靠友。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风险和民族矛盾令各级政府警醒。尽管中国政府已承诺要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但现在只有约37%的城镇职工拥有失业保险，而且覆盖面还在下降。已覆盖的职工一般都在较大的正规企业工作，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三资企业或上市企业。

该怎样设计新的体制和过渡模式呢？参考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经验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关键。

不像其他新兴市场，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社会保险的原则，特别是失业保险的原则，已被普遍接受，且保险已

经开始覆盖——即便是部分的，覆盖很窄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个明智而可行的方式来推广它，使之更为公平公正可持续且不会引入令人慵懒的激励。

另外，要想设定一个好的激励体制，需要进行试点工作，以便决策层能够确切了解失业保险的福利水平和时间长度要如何设定才不会减少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及财政的可行性。

哪种失业保险制度适于中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其参数应基于各省市和全国的数据分析来设定。首先，最重要的是扩展覆盖面，全面覆盖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不管雇主是民营还是国有，企业是大还是小。第二是将保险福利的设计与管理简单化。第三是保险福利的时间长度应改为9-12个月，而不是目前的24个月。第四，当设计失业保险融资体系时，融资的“水池”必须足够大，以确保可持续性。第五，各省的体系应尽快协调起来，至少保证从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具有跨省市的可携性。

其中一个最难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大量农民工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针对农民工和非正规部门的新的失业保险计划，开始应以从业人员自己的供款为主，以政府的匹配性补贴为辅。一段时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逐步减少，由于雇主的供款意愿和能力增强，最终会完全替代政府的补贴。

摘编自《华尔街日报》2013年1月16日

责任编辑：李文政

ABSTRACTS

(1) 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Wealth and It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Xu Xianchun·005·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wealth and it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n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wealth and it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proposes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keep a stable growth of national wealth and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it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2) China's Position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in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CCIEE Research Group·016·

In the short ter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ould be diversified while the US dollar still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e medium term, a comparatively balanced system would be founded comprising US dollar, euro and RMB (or Asian dollar); for the long term, a world currency should be created which is independent from national currencies and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nchor .

At current stage,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 favorable to China as long as it's stable. China doesn't have the capacity to propose a totally new system and should recently

play as a balancer in order to obtain advantages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reform would certainly be advanced slowly and gradually. To include the RMB in the basket of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could be the first break. The internalization of RMB should be adap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aking a modest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as one of the sub centers of the global system, it should make some progress in Asia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key areas of which include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Chiangmai Initiat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unds.

(3) What GDP Growth Rate Will China Achieve in the Next Decade?

Cai Fang and Lu Yang·027·

As a result of the shrinkage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t ages between 15 and 59, all factors which have driven the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over 30 years tend to diminish after 2010. This paper estimates annual growth rate of potential output to be 7.2 percent in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6.1 percent in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maintain future sustainable growth requires economic reform in related areas to enhance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is paper simulates two scenarios in which both increase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potential GDP growth rate. It also draw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4) Onlook And Analysis Of 2012-2013 World Economy

Chen Wenling·038

In 2012,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hort term Eurozone debt impact, European economy has been in crisis, US economy shrinking, Japanese in a long economic recession, while the growth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China's , are slowing down, thus the world economy ended in diversified complexities, and still struggles in difficult recovery. Looking ahead to 2013, world economy will endure a low growth, demand of the main economies will remain weak. Meanwhile,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n will undergo a volatile change,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ttern of new global governance will be a long process.

(5) World Economy: Basic State in 2012 and Risks in 2013

Gu Yuanyang·048·

In 2012, US economic recovery has been continuingly weak, Europe has moved from stagnation towards periodic recession, the pace of Japanese economic recovery rapidly decreased, while the growth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slowed down, obviously worl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weak. In 2013, major risks and explosive points facing the growth of world economy are as follows: multiple derivative new risks caused by the extreme low interest rate and continuous qualitative easing, rising CPI, US strengthened interfering ability into other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 due to energy revolution and financial superiority.

(6) Grasping Opportunities and Keeping Up with Changing Trends in the Low Growth

Pei Changhong·059·

In 2012, the recovery trend of US economy has continued, Eurozone is struggling in economic recession, Japanese growth moved downside, while the pa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decreased, the world economy has shown a pattern of weak growth, and as a result our foreign trade has fallen back on a large scale, and FDI also decreased. In 2013, US financial market is moving towards stabiliz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a deepening Eurozone crisis is small, while emerging economies will possibly move from receding to rising again. In all, in 2013 the outlook of the world economy is a little better than the last .So we must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adjusting ourselves to the changing trend, making efforts to cultivate and establish our superiorit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 thus to ensur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is rapidly changing world.

(7)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Li Jingwen·068·

Since the start of the 21 century, the management science has continuingly been vibrant, and demonstrated some trends of inheritance, converging and seeking to break through. At present, the “hot spots” of the discipline of management science mainly consists of studie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experience, co-ordination of supply chain, data analysis, know-

how discovery and networks organizing, and these have demonstrated multiple study trends and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Chinese academics of management science should firmly adhere to Marxist position, points of view and methodology, to analyze our country's conditionality at bo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to deepen the discipline crossing and converging with mathema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tc, so as to make joint efforts in forging new brilliance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a management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8) Enforce Direct Investment in BRICs: A Great Support of China's "Go Global" Strategy

Fan Libo, Shi Yizhou and Zheng Wei·073·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conomy a long-term,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s of the BRIC countries have all shown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status of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RIC countries,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nvestment process and finally gives political suggestions on expanding further China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RIC countries.

(9) Analyses on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Du Zhenhua and Zhao Hongtao·080·

Communication service trade is one part of the more quickly internationalized service trad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statues from 1997 to 2011. Points out main problems, for exampl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trade competitive Weakness. Major reasons ar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trade development industrial base weakness and to busy too more profits in domestic to attend overseas market, and so on. The paper brings forward to promote suggestions on communication services trade development.

(10)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trategy of Service Economy in China

Research Group·089·

China has entered in the mid-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general, but service industry,

keeping at the stage of fostering, is not the core leadership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and possible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economy to service economy in China, and it will be a critical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economy in the next 10-20 years. So it is crucial to regard the big cities, and the ma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the centered distri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s well as enhance the basic institution and stand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service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indispensable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 plan, the support system of industry policy, and so on.

(11)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Huang Qunhui and He Jun·097·

On its way that leads to the goal of building a globally important industrial country in quality,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only need to stick to its factor endowment and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but also has to face fresh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that today's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d never experienced. Among others, there are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These factors would be likely affect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ndition, the mod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mode of industrial upgrade and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refore bring more meanings to China's new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us require changes in the strategy, path and policy of this new pattern.

(12) Small Enterprise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periences and Policies

Jing Chunmei·105·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situation of SMEs shows, SMEs face more sever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an larg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 low-incom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ntly, the financing environment of SMEs in China have shown some improvement, but the problem of financing has not been solved fundamental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e suggest to further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improve statistical coverage with new standard; establish special polic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o on.

(13) On China's Rise from a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Robert Mundell·114·

Robert Mundell, Nobel Economic Prize winner, has been interviewed in Beijing by Globalization reporter on the forthcoming China decade led by the newly elected Chinese leaders at the 18th CPC Congress. By comparing his vast experience and his theory on Optimum Currency Area in Europe, esp. during recent crisis the “Father of Euro” touched on China’s future welfare system, bottlenecks that could inhibit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systems of education, capital market and information China needs in her taking-off period in terms of historic aspect. He finally concluded that China has a big potential and “multiplier effect” given the huge population an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merits and setbacks, to possibly avoid their mistakes and well fulfill her great objective to become new world leader.

Editor: Li Wenzheng